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田中角荣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中日邦交正常化文件录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田中首相 宴会上的祝酒词

(1972年9月25日)

尊敬的田中角荣首相阁下：

各位日本贵宾们：

朋友们，同志们：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以及其他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最近几年来，每年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超过其他国家朋友，中国同日本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额也高过其他国家。这就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致意，并衷心祝愿日本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就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谈。我们期望，我们的会谈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最后，我提议：

为田中首相阁下的健康，
为大平外相阁下、二阶堂官房长官阁下的健康，
为其他日本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
为中日友好，干杯！

田中首相在周恩来总理欢迎
宴会上的祝酒词

(1972年9月25日)

尊敬的周恩来总理阁下
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

这次，我能够应周恩来总理阁下的邀请，以日本国总理大臣的身份，踏上我国邻邦中国的国土，感到非常高兴。今天又举行如此盛大的晚喜欢迎我们，我心中感到非常温暖，对于有关方面各位先生的关照，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两千年丰富多彩的交往的历史。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沉沦在过去的暗淡的死胡同里。我认为，现在日中两国的领导人为了明天进行会谈是重要的。为了明天进行会谈，也就是为了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这一共同的目标，进行坦率而有诚意的会谈。我这次前来此地，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愿望，同伟大的中国及其国民之间能够建立起友好睦邻关系，两国能够一面互相尊重对方同其友好国家的关系，一面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

不言而喻，日中之间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我认为，尽管如此，日中双方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交流，尊重相互的立场，进行合作，是可能的。

为要把日中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实现邦交正常化是绝对必要的。当然，双方有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殊情况。但是我相信，哪怕双方的立场和意见存在着一些小异，日中双方根据求大同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克服意见分歧，达成协议是可能的。我愿意完成这一重任，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

最后，我借主人的酒提议：同周恩来总理阁下以及各位先生一起举杯，
为毛泽东主席阁下的幸福健康，
为周恩来总理阁下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顺利，
为日中两国国民的永久的友好和亚洲的和平、繁荣，
干杯！

田中首相在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

(1972年9月28日)

周恩来总理阁下

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

今天晚上，我有机会举行这个表达我们感谢心情的宴会，承蒙周恩来总理阁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以及有关方面各位先生出席，感到十分高兴。

我对周恩来总理阁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以及有关方面各位先生对我和太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官房长官以及全体随行人员、新闻界人员所给予的热情款待和充满诚意的关照，再一次表示深切的谢意。

而且，昨天我有机会同毛泽东主席阁下会见，就日中两国关系的未来以及各项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这次会谈使我深受感动。

我是为了完成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严肃的任务前来访问中国的。来到贵国以后、同周恩来总理阁下以及贵国有关方面各位先生亲切会见，并在始终友好的气氛中多次极其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其结果，我深信邦交正常化这一大事业，现在是能够实现的。

日中两国领导人像这次这样友好地促膝会谈，是经过长久的岁月和艰苦的道路才实现的。我对为了打开日中两国进行对话的道路作出贡献的两国各方面人士，表示谢意。邦交正常化是走向明天的第一步，我愿意在巨大的历史潮流中朝着新的前景前进。今后日中之间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相信只要两国本着互谅和相互信赖的精神予以处理，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我深信，两国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两国国民多年来所期望的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不仅会在两国历史上掀开新的篇章，而且也是对亚洲以至世界和平的贡献。

我深切希望，以这一次我们访问中国为开端，更加促进各方面相互之间的交流，使友好的纽带把我们两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最后，我提议，同在座的各位先生一起举杯，

为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阁下和周恩来总理阁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为日中两国国民的永久友好、为亚洲和世界和平，

干杯！

周恩来总理在田中首相举行的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

(1972年9月28日)

尊敬的田中角荣首相阁下，

各位日本贵宾们，

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晚上，田中首相阁下举行宴会，盛情款待我们。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中国同事们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首相阁下和各位日本贵宾，表示深切的谢意。

田中首相这次来我国访问，时间很短，但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田中首相会见了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一小时认真、友好的谈话。

我们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就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坦率和友好的讨论。本着互相谅解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我们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我们即将结束两国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的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将打开两国关系中的新篇章，并将对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热烈祝贺我们会谈的圆满成功，并高度评价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为建立中日邦交作出的重要贡献。

我们取得的成就应当归功于我们两国人民。我相信，他们会一定为我们的成就而感到非常高兴。

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我愿代表中国人民，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中日两国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双方富有成果的会谈证明，只要双方都具有信心，两国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得到解决的。

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定能不断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代地友好下去。

现在，我提议：

为田中首相阁下的健康，

为大平外相阁下、二阶堂官房长官阁下的健康，

为全体日本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干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 联合声明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9月25日至9月30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于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本国
国务院总理	内阁总理大臣
周恩来（签字）	田中角荣（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本国
外交部长	外务大臣
姬鹏飞（签字）	大平正芳（签字）

1972年9月29日于北京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北京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作为日中

邦交正常化的结果，
日蒋条约宣告结束

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今天在这里指出，由于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从今天开始两国间建立外交关系，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是今天上午在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这些话的。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主持了有中外记者参加的这次记者招待会。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说：“经过历时四天的日中两国首脑富有成果的会谈，今天发表了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声明，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他说：“日中双方对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已经在联合声明前言中表明了。我们相信，结束不幸地长期存在于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在两国间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谈到联合声明本文时说：“正如第一条所表明的，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作为其具体表现，从今天开始两国间建立外交关系。关于这一点，请参照第四条。

“其次，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当然前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一点，日本政府的意思已在第二条作了表述。

“另外，日本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已经在第三条表明了。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有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说：“关于在第五条中表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赔偿问题，如果想到过去日中之间不幸的战争的结果，中国人民所受损害之巨大，我们认为对此应予坦率而正当的评价。”

他说，“邦交正常化的意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日中两国，互相尊重彼此的立场，建立起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种日中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列入了第六条，第八条所述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也同样反映了两国政府向前看的态度。”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最后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编者注：即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记者招待会上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 1972 年 9 月 29 日讯）

小引

田中角荣在战后日本政坛留下了巨大足迹。他那传奇式的经历，他的庶民性和行动能力，给人们留下了至深印象。人们在论及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时，每每提及他，称他为“庶民宰相”、“带电脑的推土机”、“不死鸟”。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72年评论说：“田中系农民之子，是日本政界为数不多的未进过大学的政治家。”这的确抓住了田中的一大特点。自明治时代以来，“官尊民卑”一直主宰着日本政治和社会，回溯日本历史，首相和大臣的椅子几乎都是被国立大学和官僚出身者占据（战前还有帝国陆军大学和帝国海军大学出身的军人）。田中从庶民百姓中脱颖而出，打破了日本政坛的传统，他的出现不能不格外引人注目。

“大臣这个职务，你若是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只要你奋发努力，大抵是可以当上的，但首相、总裁可不是仅仅凭努力就能当上的……”这是田中当选为首相和自民党总裁之前三四年里常说的一句话。

的确，今天的日本，对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来说，当一个大臣，不是什么困难之举，因为内阁几乎每年都要改组一次，而大臣职务的分配是按自民党内的派系进行的，各派系内部又以论资排辈为原则，所以，除非是属于只有几个人的小派系的议员，随着当选次数的增加，几乎都能自动地成为大臣。这就是日本评论界将自民党的派系称为“大臣传送带装置”的缘由。例如，吉田茂首相在执政7年零1个月的时间里，共“制造”了78位大臣，佐藤任首相7年零6个月里，有103人获得了当大臣的机会。但从自民党成立到田中出任首相之前，问鼎总裁、首相宝座并能如愿以偿的却凤毛麟角。其间出马竞选旨有石桥湛山、岸信介、石井光次郎、松林谦三、池田勇人、大野伴睦、藤山爱一郎、佐藤荣作、前尾繁三郎、三木武夫等10人；虽未公开出马，但也野心勃勃地奋斗了一番的有重光葵、绪方竹虎、河野一郎、川岛正次郎、广川弘禅、犬养健等6人，但只有石桥、岸、池田和佐藤4人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余者大部分都抱憾终生，悄然辞世了。

那么，田中为什么能够攀上权力顶峰呢？他作为一个没有学历的贫民之子，是怎样走上政坛，又是怎样逐渐进入权力核心，最终入主首相官邸的呢？他从政数十载、执政两年5个月，给自民党政权乃至日本的政治生活产生过什么影响？在战后日本史上留下了什么记录？这是本书写作过程中力求作出回答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本书的重点是通过评述田中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沉浮不迭的政治生涯、各个时期的政策主张以及昭著内外的政坛实绩，来阐明作为政治家的田中角荣的面貌。

田中作为日本著名政治家，对战后日本的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起了十分明显的作用，他的传记是日本战后史的重要注脚。笔者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传记，能对日本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轨迹有个大致的了解，并从田中治理经济思想和改革中得到一些启示。虽然国情不同，但笔者认为，日本发展经济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正在腾飞的中国来说，不无借鉴作用。而田中的一些经济思想和实践，如重视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建设行政一元化，提出国土开发的综合性概念，注意正确处理地方发展和国家综合发展的关系，用立法保证和促进电力、交通、住宅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田中叱咤政坛风云数十载，随着战后日本史的推移，逐步展露其智慧、手腕和才能，在光怪陆离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夙夜在公，或活跃于台前，或策划于幕后；或扮演配角，左辅右弼，或居位主帅，一柱擎天，是一位对战后日本的内政外交、对自民党政权的延续和人事更替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笔者作为一个远离日本政治生活圈的异邦人，给这样一位政治家作传，着实有些贸然妄为。若非前驻日使馆参赞、前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前驻印度大使李连庆前辈的鼓励和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李宁、陈巧丽同志的催促，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60年代以来，笔者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所幸的是，正当田中在日本政坛极为活跃的时期，笔者作为新闻记者被派驻日本5年，其间不仅对田中身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有较多的实地考察，而且还有机会采访田中的街头竞选演说、记者招待会、选举田中为自民党总裁的自民党大会、田中的组阁仪式。1972年9月，田中来华访问前夕，笔者从东京飞返北京，采访了田中一行在华期间的活动。中日建交前后，笔者又多次采访田中会见中国驻日人员及代表团的的活动。当时留下的记忆和记录，大大充实了本书的内容。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专阅了一些日本及第三国的著述，为表示对这些作者的敬意和谢忱，本书后面附列了他们的著作名称。在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早坂茂三先生新著的《政治家田中角荣》，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颇有参考价值的材料。早权先生作为田中的秘书跟随田中多年，对田中的政治生涯的了解，远非他人可比。近年来，早坂先生作为日本政治评论家活跃于世，他的论评著述，在日本国内外颇有影响，他的严谨的治学作风，为人称道。本书的写作，受到他的启发很多，我衷心地感谢他。

最后，笔者要在这里指出，田中在日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他登上首相宝座时，舆论调查的结果，支持率为62%，不支持率为10%，创自民党历届内阁最高记录。但是，仅仅在2年3个月之后，即他辞职前夕，支持率便跌为12%，不支持率上升为69%，也创造了最高记录。吃了洛克希德案官司后，有人认为他“十恶不赦”，但崇拜他的仍大有人在，许多民众仍认为他是个“富有魅力的政治家”。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冈野加穗留指出，“田中角荣问题绝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的政治本质问题”，他认为，一是“日本的选举制度的问题”，二是“日本政党在分配政府、党及其他公职的官职、地位时，起着何等结构性作用的问题”，三是“还有日本的政治家纠集小团体和徒党强诉的一面”。

历史现象是纷坛复杂的，历史人物同样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笔者认为，要用复杂的眼光看待复杂的人物，既把握事实的总和，又抓住人物的本质和主流，联系历史实际，联系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加以考察与判断。对田中这样一位日本政治家作全面评价，也不是拙著所能为的。如果读者能通过本书对田中其人有个大致的了解，笔者便乐甚幸甚了。

田中角荣

苦斗

从一介平民成为政坛一雄，田中走过了崎岖的道路。无论从家庭出身还是成长环境来说，他都不是幸运的。

牛马商之子

“不少人看到现在的我，认为我是飞黄腾达的典型，而我自己却觉得并非如此。所谓飞黄腾达，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而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了千难万险。”当舆论开始认为田中有资格成为自民党总裁和日本国首相时，田中曾经这样说过。

的确，田中从一介平民之子成为政坛一雄，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他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都不是幸运的。可以说他是在平均水平以下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的。

他在《我的履历书》中写道：“大正7年5月4日，我出生于新潟县刈羽郡二田村……我的村庄位于沿海岸线的不高的山脉和从柏崎一直绵延至长冈的山脉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和平的村庄。我家是四五百年以前开辟二田村坡田的十八户之一，从那时起，一直生活在那里……”

田中的祖父田中舍吉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寺院木匠，同时也经营土木建筑业。祖母阿米是地主的女儿，传说当年是村里三大美人之一，后来因患气喘病，没有下过田。

父亲田中角次是个牛马商。他生来就喜欢马，从爱马变成了“马贩子”，看到马就买，卖了马便喝酒，为人豪放大方，像一个百万富翁。年轻时代的角次，踌躇满志，梦想着在北海道建立一个牧场。角荣三四岁时，父亲买进五十来匹马，又不惜花费4.5万日元从荷兰引进三头良种乳牛。为此，父亲卖掉了自家的山林，并约请附近的人参加投资。当时，一袋大米仅为六七日元，父亲此举，无异于一场大赌博。

不幸果然降临了。三头牛虽用排子车从横滨港运回了家，但有两头牛因长时间乘船疲劳和中暑，患霍乱病死。剩下的一头诊治无效，也死了。三头牛的死，为田中家的财产敲响了丧钟。从此，家庭经济一蹶不振。

母亲梅是一个能干的女性。由于丈夫在外做生意，到了插秧和收获季节，农活全靠她一个人去干。操劳家务，打柴，哄孩子，自然更是她的事情。一位了解田中角荣幼年情况的小学教师回忆说：“尽管如此，梅毫无怨言，也并不感到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夫妇关系很好。所以，大家都说，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角荣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由于哥哥生下来不久夭折，他就成了长子。父亲曾想给田中取名为“角太郎”，却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因为邻居家养的一条狗叫“角太郎”。这样，后来就取名为“角荣”。

田中上小学六年级时，家业已彻底败落。其父角次把一线希望寄托在三匹跑马身上，指望赛马取胜获奖而一攫千金。不幸的是，在一次赛马中，父亲的马跑到中途受了伤。无奈之际，父亲给母亲打来一封电报：汇五六十元钱来。急难之中，母亲想到了一个做木材商的亲戚近藤。母亲对角荣说：“借

钱是难以开口的事，你就不要去了。”角荣却说：“我是长子，为了这个家，我必须去。”于是，他一口气跑到近藤家，借到钱就乘火车找父亲去了。

他坐在车上，望着窗外，想着命运不济的父亲，满怀辛酸之感。忽然间，他看到了正在水田里弯腰插秧的母亲，便不由地把头伸出车窗外，大声呼喊“妈妈”。这喊声伴着列车隆隆的声响，传到了母亲的耳边。角荣对着回过头来的母亲，使劲地挥手，母亲也挥手回答。

火车向前飞奔，角荣看着变得越来越小的母亲的身影，一阵辛酸涌上心头——今天，自己拿50元钱送给在事业上砸了锅的父亲，而这笔钱等于母亲种田收入的好几倍呀！他一边想着背运的父亲，一边想着辛苦插秧的母亲，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下车后，他直奔赛马场，把钱交给父亲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虽然怨恨不争气的父亲，但更不忍看父亲的愁脸。

这件事令田中终生难忘。人生的苦涩和阴暗深深铭刻在这位善感的少年心中。“我要好好努力、劳动，活着不给任何人增添麻烦……”

人生初搏

对田中角荣来说，母亲是个伟大的存在。角荣2岁时，患白喉发高烧，一时生命垂危。后来，身体一直虚弱，还留下了口吃的后遗症，常被孩子们讥笑，他心里感到十分痛苦。

田中小学五年级时，一次上课，坐在田中前面的一个孩子恶作剧，引得大家发笑。先生误以为是田中，瞪着眼睛把他斥责了一通。田中站起来申辩，可是因口吃，面孔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先生看到紧紧闭着嘴的角荣，越发生气，田中忍无可忍，竟拿起砚台摔在地下。

那一天，母亲让他买三个灯泡带回家，可因在学校里发生了这件事，他心情沉重，回家的路上，竟把灯泡统统摔碎了。

矫正口吃，是角荣首次的人生搏斗。母亲梅，就是角荣人生的第一个教师。角荣后来回忆道：“母亲教给我很多东西。小时候我口吃，母亲对我说，‘口吃不要紧，只要努力，一定会矫正的。你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究竟怎样才好，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在母亲的教诲下，角荣领悟到，要矫正口吃，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像唱歌一样，按音节讲话。决心既定，角荣从容地练习起来，果然大见成效。他在学校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演出，按着节拍用各种音调说唱，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后来，角荣把练唱日本的传统曲艺浪花曲作为矫正口吃的方法。

由于角荣爱好浪花曲，在他39岁当了岸信介内阁的邮政大臣后，竟把浪花曲大师玉川胜太郎请进大臣办公室，田中当场唱了一段《天保水胖传》，请玉川大师指教。田中还曾接受一家广播电台的请求，在广播里演唱了这一段。因此，被人称为“浪花曲大臣”。在田中的性格中，这是形成他的平民性的渊源之一。

田中读完高小之后，由于家道中落，没有升学。虽然父母没有要他立即干活，但田中很了解家境，体谅父母的辛苦，无论如何也无心再上学了。

天保，日本年号（1830—1840）。《天保水讲传》原来是模仿《水浒传》的日本小说，后演变为各种说唱的素材。

他在村里的援农土木事务所找到一份工作，日薪5角。后来又回到柏崎的土木工程派遣所当雇工，从而迈上了社会。柏崎是一个荒凉的小镇，和风景优美的佐渡岛遥遥相对。镇子中央有一幢古老洋房，土木工程派遣所就设在里商，田中在这里工作了六七个月，直到去东京之前。

闯东京谋生

1934年3月27日，对16岁的田中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天，他满怀希望，只身离开家乡新潟县奔向东京。

临行前，母亲送给他几句金玉良言：一不要酗酒，二不要买马，三不要吹牛皮。母亲还教导说：“人需要休息，但是，应该先休息后工作呢，还是先工作后休息呢？二者之中，还是先工作后休息好；如果不做坏事，在东京就呆不下去的话，那就宁肯快快回乡；借钱给人，可以忘记对方的姓名，但人家借钱给你，绝不能忘记。”

田中原本打算投奔大河内正敏子爵，在大河内公馆里一边帮做家务，一边读书。但由于吃了女佣人的闭门羹，便改变主意，到井上工业公司东京分公司当学徒。田中白天工作，晚上去一家私立中央工学校学习。

当时，井上公司承包着三项建设工程。田中骑着自行车来往于三个工地之间，下午5时一下班，便匆匆忙忙地跳上自行车奔向学校。

中央工学校分设机械制图、土木建筑等学科，教学内容除工业英语比较难之外，数学等都很容易。只是由于白天劳累一天，田中一坐到课桌前就昏昏欲睡。于是，田中想出一个办法，他把掌心轻轻放在小刀和锥子上，一打瞌睡，就会因被刺痛而惊醒。

晚9时放学后，田中还得赶回公司，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当时电话不普及，为了把第二天的人联系好，有时得骑自行车四处奔波。当他在紧张繁忙中迎来子夜时，仍然不能就寝，他还得在狭窄的小巷里，就着自来水洗衣服。

坚定的意志，顽强的精神，田中作为政治家的这种特质是日本人公认的，岂不知这些特质正是他经过如此艰苦的锻炼形成的。

田中在井上公司虽然很辛苦，但待遇菲薄，月薪只有5元钱，除去每月3.5元学费、测量实验费和买书的钱外，所剩无几了。

“东京真不是一个好呆的地方啊！我如果不用功读书，就只好过现在这样的苦日子了。”田中想到此，更加坚定了拼命用功读书的决心。

后来，他离开井上公司，从招聘广告上获悉保险问题学者小山哲四郎需要一名助手，便毛遂自荐，住进他家。小山编辑出版期刊《保险评论》，田中当了见习记者。

田中卖劲地学习起来，凡是有关人寿保险、损害保险以及当时特有的征兵保险等理论、历史知识以及本行业的人物、实际业务等，他都贪婪地吸收。由于他擅长数学，当时他真打算成为一个保险数学家。

可是，不久田中就因母亲生病辞去工作，回故乡探亲了。返回东京后，他到经营高级玻璃制品的高砂商会供职。他的任务是上午做发货准备，下午把货绑在自行车货架上，送到买主手里。

田中不慎捅了漏子。一天傍晚，他接到一家百货店要四五个紫色雕花果盘的订货，便急匆匆驮着货出门了。因急着上夜校，自行车骑得飞快，结果，

拐弯时摔倒在地，玻璃果盘摔得粉碎。

处事果断的田中立即折回，重新挑好人家订购的果盘送去了。可是，打碎的果盘的价钱相当于他四五个月的工资，该怎么办呢？在去学校的路上，他反复思忖，终于决定用工资来赔偿。

下课后，田中坦率地向老板五味原松太郎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并表示愿用工资分期偿还。

田中的诚实使老板夫妇感到满意，不仅表示不扣他一分钱，还安慰了他一番，使他感激涕零。

昼读夜工

田中自幼喜爱碧绿的大海，当一名巡洋舰的舰长是他少年时代的梦想。为了投考海军学校，他辞去了商会的工作，把过去的的生活颠倒过来：白天学习，晚上工作。

他的一位朋友承包了一家旧铁工厂，厂里的全部制图均由田中一人承担，收入比以前宽裕。

为投考海军学校，角荣进过好几所学校和讲习班。他逐页硬背《简明英和词典》和日文词典《广辞林》，等到全部背熟，词典已面目全非了。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不养成“忘记了再查”的坏习惯。他说：“对于这些基本的东西，如果不去记它，那以后的学习也就不扎实了。”

强记法成了田中良好而独特的学习方法，使从小记忆力超群的田中更显得非凡。后来，他听报告或读书，都一定要作笔记，可是记完后又把它毁掉。原来，他记笔记的过程就是记忆的过程，既然已经记住，笔记本自然也就不需要了。

田中的记忆力之好，在日本政治家家中是少有的。金井先生证实：有一次，他和田中一起去参加浪花曲大会，听了长达四小时的表演。第二天开始，田中一连几天中午站在教室的讲坛上给同学表演，唱的几乎一点不差。

田中当大藏大臣时，不管在野党议员提出什么质询，他都可以清清楚楚地拿出具体的数字回答。

有一次，评论家户川猪佐武向田中讨教起他惊人记忆力的秘密，田中笑着说：“没什么，看到一个美女时，不仅记住她的脸蛋，连她的名字也立刻记住了。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我并不是有意去记的，结果倒记住了，事情就是这样……可是，老实说，我是不喜欢那种马马虎虎的记忆方法的。我总是想，现在不记住，以后说不定就再也碰不到了。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把它记住。人们往往瞧不起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我却不这样认为，这是学习的前提。”

19 岁任经理

海军入学考试前夕，田中又接到母亲病倒的通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迫使田中对自己的前途作出重大抉择。

“不错，海军是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前途，可现在干脆死了这条心吧，这是我的命运不济。我应当分担薄命的母亲身上的重负，多少能让母亲的日子过得好一些，这才是自己作为长子应尽的责任。”田中想。

当天夜里，田中为抛弃少年时代的梦想，在床上痛哭了一场。

田中放弃了参加海军的志愿之后不久，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选择土木建筑业为职业，这为他立身出世奠定了基础。

田中先到私营的中村建筑事务所工作，在那里，因工作关系，有幸结识了他久仰的大河内正敏子爵。大河内当时是理化研究所所长，又是理化工业公司的董事长。初来东京时，田中就打算投奔他，只因他家女佣入挡驾，没有遂愿。现在，田中认识了大河内，便离开中村建筑事务所，自立门户，独立经营共荣建筑事务所，承包理化研究所及所属各公司的工程，生意兴隆，收入也相当好。在一般人眼里，他算是发迹了。

应征入伍

1938年春，田中满20岁，接受征兵检查。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年满20岁的男性就要接受征兵检查，且须于半年后应召入伍。这是国民的义务。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所谓入伍，几乎是不经训练就被送往中国大陆战场，投入实战。

1938年底，田中接到入伍通知书，被编在盛冈骑兵第三旅团第二十四联队第一中队。翌年3月，他随部队在广岛集中，后又横渡日本海，经朝鲜半岛开到松江省附近驻屯。5月，日苏军队在诺蒙坎交战。不过，田中并未直接参加战斗，只是担任后勤工作。1940年11月底，田中患纤维性肺炎，突然跌倒，立即被抬上担架，送到野战医院。诊断的结果，还有右胸部干性肋膜炎并发症。辗转多日，1941年春，田中回到大阪，住医院疗养一个月，总算恢复了健康。

这时，他接到姐姐从新潟来的信，得知二妹患病。田中想到不久前疾病已夺去了大妹妹的生命，越发坐立不安，便向上级请了两天一夜的假，穿着伤病军人的白衣服，风风火火地赶回家。

田中探望了病重的妹妹，回到大阪，当夜就发了高烧。两三天后，他就被部队用待快列车送到仙台医院的宫城野原分院，被安排在重病人专用的单人病房里。田中这时的体温是摄氏41度，此后的两个星期里，病情不见好转，一直未脱离危险。军医带着卫生兵来到他身边，把他的皮夹子里的钞票号码、手表号码等等都记录下来，对他说：“你想吃什么就吃点吧。”这等于宣判田中的“死刑”。可是，几天之后，田中的病开始好转，终于奇迹般地痊愈了。

这段经历，使田中更懂得生命的宝贵和人生的价值。他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来在40岁之前还可以做些大事吧。”胸中燃起了为未来而奋斗的火焰。

建立家庭

1941年10月5日，田中复员回到故乡二田村，但在事业心的催促下，在家里只呆了三个晚上，就回东京了。他租了一间屋子开设事务所，承接建筑设计、机器安装基础计算和建筑施工等业务。其后，田中不仅与理化研究

松江省系指伪满洲国时的吉林省。

所恢复了业务关系，而且又接受了这家研究所属下公司委托的工作。因此事务的业务又忙得不可开交。

田中的房东是土木建筑商烦本木平的遗孀。老太太年近花甲。同她的独生女花子和外孙女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10年前，花子曾一度赘婿，并生了一个女孩，后来因性格不和离了婚。

田中住在花子家里，受到诸多关照，感到十分满意。花子虽然没有迷人的容貌，但待人和善，手脚勤快。她看到田中独身生活，邋邋遢遢，总是热心地照顾他。天长日久，田中的心渐渐地被花子吸引住了。

再说，花子也是田中因失恋感到极度空虚时，闯入他的生活的。田中自幼结下一门娃娃亲，对方是他家的亲戚、一个木材商的女儿。在那群星灿烂的夜晚，儿时的田中曾与她并肩坐在家乡观音堂的廊沿下纵情歌唱。田中幼小的心灵里，一直认为她就是自己将来的终生伴侣。

可是，田中小学毕业后在建筑工地上当了小工，那位姑娘每次看到田中浑身泥巴的样子，就装着不认识他似的扭身走过去，田中感到很不是滋味。田中在医院生命垂危之际，姑娘嘴上说要来看他，但始终没有露面。后来，田中复员准备去东京谋生时，曾约她一起前往，姑娘又没有跟他去。从此，田中对这门娃娃亲彻底死了心。

其实，田中十六七岁时，还喜欢过一个女人。他总是在东京神田区的一爿水果店门前跟她约会。当时，田中初到东京，终日为学习和工作而奔忙。对田中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前程。因此，他十分珍惜时间。他不仅要求别人守时，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不过，田中对情人还比较宽容，容许她迟到30分钟。

有一天，情人果然迟到了，田中一直耐心地等着。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疾步走来。田中一看表，已经迟到31分钟，便回转身叫住一辆出租汽车，扬长而去。从此，田中再也没有跟这个女子约会过。

由于种种因素，田中终于听任命运之神的安排，于1942年3月3日桃花节那天夜里，同花子同衾共枕，毫不声张地结了婚。再说，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东京街头到处贴满了“奢侈铺张乃大敌”的标语，也无法举行讲排场的婚礼仪式，更不可能举办盛大的喜宴。

新婚之夜，花子向田中约法三章：（1）不准“休妻”；（2）不准打骂；（3）有朝一日升官发财，也必须白头偕老。花子自己则向田中起誓：只要田中信守这三条，她能忍受任何痛苦。田中只好苦笑着答应了她的条件。

婚后，田中一直信守自己的约诺，即使在他荣登总理大臣宝座之后，也没有嫌弃比他年长8岁的“糟糠之妻”。1942年，田中和花子生下了一个儿子，随后于1944年又生了一个女儿田中真纪子。可惜的是，儿子6岁时夭折了。

儿子夭折后，田中更疼爱女儿。真纪子自幼聪颖乖巧，性情刚烈，田中将她唤作“斗鸡”。

田中眼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高兴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他希望女儿能像个长子，经常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要是个男孩儿该多好……”

真纪子上小学那年，田中32岁，作为政坛宿将早已崭露头角。他整天在外面奔忙，很少呆在家里。在真纪子的记忆里，只要父亲在家，必定要把她

抱在膝头上，用胡子扎她的脸。

在父亲的熏陶下，真纪子养成了跟父亲相似的性格和气质。她读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突然若有所思他说：“我想当个女议员。”田中听到此事后，高兴极了。他觉得这是女儿对自己从政给予的全面肯定。

小学时代的真纪子，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经常在班会或生日庆祝会上，跟同学们一起演戏。

后来，真纪子进入日本女子大学附中读书。这是一所与东京女子大学齐名的名牌大学，有“小姐大学”之称。在这里读书，可以由初中、高中一直上完大学。

出乎田中意料的是，真纪子在初中毕业前夕，竟向老师说她要去美国学习。后来，真纪子在谈到她当时的心境时说：“因为我是独生女，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所以，我想远离父母，到美国去。”自小性情刚烈的真纪子，由于父亲的宠爱，变得越来越任性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她那种我行我素的特性，显得更加突出。

田中知道此事后，以种种理由进行劝阻。可是，真纪子不是那种遇到反对就轻易退让的姑娘。她跟父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一方面，田中说“绝对不行”，另一方面，真纪子说“非去不可”。

“不能去！”田中怒喝道，“你到20岁之后去美国我不反对，但你现在还未成人，我有养护你的义务。”说着，打了真纪子一巴掌。

“可我无论如何也要去。”真纪子一边摸着脸，一边坚持说。

后来，真纪子采取沉默战术，半年时间对父亲不理不睬。其间，田中对女儿抚慰、哄劝和拳打脚踢兼施。但由于看到女儿不想改变主意，怕她采取越轨举动，走上绝路，便噙着泪水同意了女儿的要求。

但真纪子是他的掌上明珠，他当然不会无条件地应允她。临行前，田中向真纪子提出：

- (1) 决不能领一个蓝眼珠的洋女婿回家；
- (2) 暑假必须回家；
- (3) 每周必须给家里写一封信，把近况告诉父母。

1959年秋，真纪子离开日本飞往美国。她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嘉曼达文·弗仑茨中学度过三年的留学生活。出发那天，田中到机场送行，田中再三叮嘱女儿，“要保重身体啊”，“别乱吃东西啊”，说着说着，不禁泪水夺眶而出。

女儿留学期间并没有忘记爸爸，相反，比她在国内时更关心爸爸。所谓“胡子风波”便是很好的佐证。

1962年，田中就冲绳问题的一次发言，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野的社会党对田中十分愤慨：“你要承担责任，剃掉你那得意的胡子！”

真纪子在美国看到有关报道，非常生气。“什么剃胡子云云，在国会上干涉别人的私事，岂有此理！”接着，她便给父亲打电报：“爸爸，别剃胡子！”

田中阅后，又高兴又激动，他感谢女儿的理解、鼓励和支持，很快便给女儿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毫无疑问，他没有把胡子剃掉。

但是，真纪子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很快又与父亲发生了对立。真纪子刚刚提出进早稻田大学深造，田中就大发雷霆，举手要打。田中觉得女孩子将来应该做贤妻良母，为此，应该去学和服裁缝、做饭炒菜之类的本事，而真

纪子选择的早稻田大学与贤妻良母的教育相去甚远。

反复争论的结果，田中再次告输。真纪子进了早稻田大学第一商学部。田中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内中富有个性，但不主动抛头露面，必要时才出来应付场面——这才是田中心目中理想的女性。这种女性形象是以他的母亲和妻子为依据的。换言之，田中从他的母亲和妻子身上找到了理想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一方面对丈夫的粗暴采取忍耐态度，一方面全心全意地抚育孩子。

不过，事情后来有了变化。在几度对立、反抗、冲突之后，田中渐渐地也承认了女儿的“魅力”。一次，一家妇女杂志记者在采访中，征求田中对理想女性的看法，田中在谈了贤妻良母型的女性特征之后，又加了一句：“但是真纪子有点‘疯’，有点性野不驯……”这是父女间充满狂涛巨浪的时光已过，田中将女儿嫁出、见到外孙之后说的话。

讲到真纪子出嫁，那是1969年4月的事。当时，真纪子25岁，田中51岁，已经重返自民党干事长之要职。真纪子的丈夫铃木直纪28岁，是在日本钢管株式会社供职的一名普通职员。他和真纪子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父亲全都是政治家。

直纪的父亲直人，战后先是当选为参议员，后又当选为众议员。直人与田中在吉田茂内阁时期就关系密切，家属间也经常来往。不过，铃木宣人早在1957年就去世了。他有三男一女，直纪排行老末。

田中与铃木两家的交往，使真纪子和直纪之间萌生了爱情，两人终于订了婚。

然而，有一个大问题难住了父女二人，那就是把女儿嫁到铃木家去呢？还是让直纪入赘，改姓田中呢？田中认为，他作为“家长”，有责任保护这个家，也有把这个家子子孙孙延续下去的义务，为此，无论如何不能把女儿嫁出去。

田中的胸臆吐露之后，真纪子表示坚决反对。她在上大学时就曾经说过，她非常讨厌“倒上门的女婿”。铃木家族自然也寸步不让。

田中在私下同女儿商量多次，仍然没有结果。在临近婚礼前的一天，田中把女儿叫到自己的房间，一边对饮着啤酒，一边直接交锋：

“喂，去跟直纪说说，请他改姓田中吧。”

“不必了，因为我要嫁过去。”

父亲和女儿盘腿坐在布垫上，已经喝了5瓶啤酒，可是谈判依然没有结果。

田附中当然不肯就此罢手。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通过直纪所在的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社长赤权武对直纪做工作，终于使直纪动摇了。

举行婚礼那天，田中又终于征得了直纪的母亲美弥子的同意。作为直纪入赘田中家的交换条件，田中立即同意了美弥子提出的以下三点要求：（1）要让直纪在亡父的选区出马参加众议院选举；（2）田中家的全部财产，将来要由直纪继承；（3）这些条件要在婚宴上当众宣布，以昭信守。

真纪子作为当事人，对事情的意外结果虽然感到吃惊，但只好面对现实，听从命运的安排。

直到举行婚礼当天，才好不容易有了满意的结果，田中喜出望外，激动万分。他在喜宴上代表两家人致词，一边扑簌簌地流泪，一边说：“在婚礼前的30分钟，直纪答应了我，要作为上门女婿到我家来……”他呜咽着，语

不成句，人们怎么也听不清他说的活。在他的感染下，人们也纷纷流下了眼泪。

1972年田中登上首相宝座之后，曾两次带真纪子出国访问，让真纪子替代她的妈妈花子充当了“第一夫人”角色。真纪子落落大方、幽默机敏、从容不迫的态度，使田中感到十分高兴。

后来，田中遇到麻烦，被迫辞去首相职务，接着又卷进一场马拉松官司，在处于逆境期间，他平时对真纪子的爱得到了报偿。真纪子在父亲受到社会弹劾时，无条件地袒护父亲，勇敢地保卫父亲。

1985年田中突然病倒，真纪子为保护其父不受新闻界的干扰，让父亲在安静的环境中得到治疗，更为了向外界保密，以防田中派的动摇，她作为田中家庭的代表，与各方周旋，导演了一出“保父剧”。真纪子的所作所为，一时成了日本新闻界的热门话题，真纪子也因此被人们称为“烈女”、“目白台女皇”，毁誉褒贬之中，真纪子的“田中的女儿”形象更加突出。

田中的家长意识是很强的。他始终抱着这样的态度：要为自己必须关照的人而努力工作，要保护他们。为此，他不仅信守花子的三点要求，而且还明确规定了丈夫与妻子的职责，不让花子为他的工作操心。

“工作上的事，你不必操心，因为干工作和在社会上处事是很辛苦的。你若是知道了我的工作情况，只会感到担心费神，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刚一结婚，田中就这样对花子讲。

“丈夫负责工作，我负责打扫卫生和管门守家。教育孩子和孝敬父母是两个人的共同责任。”花子说。

习惯成自然，两个人都感到很满足。正因为如此，田中成为政治家之后，也没有破坏这种分工。

不过，田中另外还有一个妾室。1950年真纪子上小学时，田中为情人让和子赎了身，把她安置在东京神乐坂住下来。第二年，让和子生下男孩田中京。虽说是情妇的孩子，但因为是男孩，田中高兴异常。田中的母亲也不辞辛苦从新潟老家赶来祝贺。1953年，让和子又生下一个女孩，但不久就夭折了。1957年，次子田中祐出生。

田中角荣对这两个儿子充满父爱，但管教颇严。田中祐谈到父亲时说：“我上小学时，常常挨父亲揍。如我称呼长辈时未加敬称，或大人谈话时插嘴，父亲便‘啪’的一下把巴掌打过来。吃饭时若不用公筷夹菜，也要挨一巴掌。”

田中打过孩子后，一定会说：“为什么挨打？如果不明白就一个人去好好想想，下次我回来时再给你讲清楚。”不过，据说当孩子们上了中学之后，田中就不再对他们进行这种斯巴达式的教育了。

后来，随着田中地位逐渐上升，当干事长、大臣，变得繁忙起来，不再常去让和子的邸宅住了，据说每月能回去一次就算不错。

但是，田中并没有对让和子和两个儿子置之不理。田中对孩子说：“你们的母亲与我的缘分是十分珍贵的，它是天地间的造化。这点我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你们什么也不必担心。”

田中祐因就事曾和父亲做过一次认真的谈话。田中的态度是要把田中祐这只“幼虎”赶向“深山”。

“你要尽可能争取自己去干一番事业。如果靠特殊的关系，你可以很快走上社会，取得成功，但对你没有好处。不自己去闯一闯，那是没有意思的。”田中又说：“在30岁以前，你要离家到外面去闯荡一番。因为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所以，你必须去经风雨，见世面。”

现在，田中的这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据说，大儿子田中京鼻子下面蓄着小胡子，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他已经结婚，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从母亲让和子的身边独立出来了。

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田中正妻的儿子，其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都不能与真纪子相比。他们之间虽是同父异母兄妹，却很少见面。田中京说，他只在小学低年级时，和真纪子见过一次面。以后虽也到目白台去过几次，可是没有见到她。

田中对待花子前夫之女也很不错，并把她许配给池田勇人的堂侄。田中以自己的方式对她尽到了继父的责任。

战乱中的冒险

田中建立了家庭之后，购置房产，新建了一座建筑事务所。随着事业发展，1943年，他把私营的事务所改组为法人性质的田中土木建筑工业株式会社，自任总经理，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该公司在田中的主持下，承包了很多工程，事业日新月异，一年工夫，便成为全国头50家土木建筑公司之一。

田中的经营秘诀除了“工期要短”、“收费要低”之外，重要的是“用人有术”。他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我当时还很年轻，光有我这样一个总经理是不行的。事业能否发展，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推动别人来为你工作。我对总经理这个头衔并不在乎。每天早上，我很早就上班，扫地抹桌子，和职工们一起劳动，一起娱乐，真可谓苦乐与共。职工们了解我的心意，也就高兴地为我卖力了。当然，由于提高了工作效率，公司增加了收入，我给他们的工资也比其他公司高出二三倍。”

正在田中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欧洲战场，纳粹德国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被苏军击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在亚太战场，盟军发动全面反攻，日本节节败退。1944年6月，美国空军开始对日本本土大规模轰炸。

为了保存战争实力，日本军部命令本上上的一些工厂向中国东北和朝鲜迁移。田中的公司承接了把一个活塞环工厂搬迁到大田的工程。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总共需用37.5万个人工，而且，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必须突击完成。战争给田中提供了一个机会，他立即把身边的6名干部分成两组，派他们分赴朝鲜北部几处地方去采购木材，他自己则漂洋过海，于1945年春到了中朝边境一带。

当他买完木材，回到汉城时，已是1945年8月8日晚上。正是这一天，苏联对日宣战，苏军突破伪满洲国国界，向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8月9日，美军B—29轰炸机继8月6日向广岛掷第一颗原子弹后，又向长崎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同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伟大号令。8

月 10 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的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向日军展开全面进攻，并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投降，如遇反抗，即坚决歼灭之。形势急转直下，至 8 月 15 日，天皇裕仁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日本全国宣读投降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长期受日本殖民者奴役的朝鲜人民也终于获得了解放。

田中看到天下大势已定，便决定逃回日本。他把全体朝鲜雇工召集到工程事务所前，自我解嘲他说：“我把全部财产都捐献给新生的朝鲜。”

不日，他就坐火车前往釜山，决定从釜山码头乘海防舰回国。那艘舰只让妇女和儿童搭乘，幸运的是，田中竟也被批准了。事后才知道，由于乘客名单字迹潦草，“田中角荣”被误认为“田中菊荣”，人家还以为他是个女人哩。

海防舰原定在舞鹤军港靠岸，后来接到指示改变航线，驶入了青森港。田中下船后立即南下，于 8 月 25 日黎明，回到了还在燃烧的东京。他望着成堆连片的瓦砾和七扭八歪的钢架，强烈地感到战败的现实是那么严峻。

战争结束了，日本人民的灾难并没有结束。粮食奇缺，物资匮乏，通货膨胀，黑市猖獗，失业严重……多少人饥肠辘辘，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但是，田中本人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在东京的住宅并没有遭到空袭，在新潟乡间 40 幢出租的房屋，也完好无损。战时花 1 万日元买下的店铺，在来势凶猛的通货膨胀中，一下就变成了价值百万的财产，田中顷刻间成了百万富翁。

然而，田中并不甘于当个暴发户。“要搞些什么……不能不搞”，在这种勃勃雄心驱使下，27 岁的田中下定了重操旧业的决心，要创建一个更像样的土木建筑公司。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在战败和贫困的条件下重建日本，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治。

当时，正是战后日本所经历的第一个政治动荡时期。战前的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之间的对立又恢复了。1945 年 11 月 9 日，自由党成立，鸠山一郎任总裁，河野一郎任干事长，三木武吉任总务会长，这些人都是旧政友会的班底。

旧民政党系统则以町田忠治为总裁，鹤见祐辅为干事长，犬养健为总务会长，于 11 月 16 日组成了进步党。

其间，革新阵营中，以片山哲为书记长（后又任委员长）的社会党和以德田球一、志贺义雄为中心的共产党也宣告成立。

作为中间政党，产生了以三木武夫为委员长的协同民主党和国民党，以后这两个党又合并为国协党。

当然，这些政党的成立，与田中都没有什么直接的缘分。但是，田中就是在这种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形势下，走上政治舞台的。

涉足政坛

具体他说，将田中角荣引入政坛的，是田中的土建公司的顾问之一、大政客大麻唯男。日本政治评论家户川猪佐武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大麻这个人，如果没有战败这个现实，或许就不会有田中角荣这个政治家登上政治舞台。

大麻本是民政党领袖町田忠治的亲信，曾经担任过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战后不久，他被解除公职，离开了政界。后来，解除公职的处分撤销

了，他又东山再起，参加民主党，推举重光葵为总裁，把民主党改组为民进党，显示了他的实力。鸠山内阁执政后，他担任了国务大臣。

1945年11月的一天，大麻声称有要事相商，把田中请到一家饭馆里。原来，所谓“要事”就是要求田中提供政治活动经费。田中听后，慨然应允。他说：“为了重建战败的日本，不管怎么说，最要紧的就是确立民主政治。政治不搞好，什么经济复兴，重建产业，一切都谈不上……”他表示很愿意捐赠资金。

此后大约过了半个月，大麻把田中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让田中出马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大麻对他说：“我喜欢你这样有魄力的人。日本需要头脑敏锐、有行动能力的青年。青年人不上政治舞台重建国家是不行的。在你的家乡新潟，我们进步党没有找到合适的候选人。你与其帮助别人，不如自己参加这一次选举。即使别人想出马竞选，我认为像你这样的人也要出马。”

田中从来不曾有过从政的念头，大麻的劝诱，使他感到很愕然，一时拿不定主意。几天之后，大麻又找他商量，并通过其两位亲信动员他出来竞选。最后，田中问道：“要出多少钱？”他们回答：“拿出15万日元，你就可稳坐钓鱼台了。一个月之后，保你当选！”这一席话说得田中动了心。“行，那就干吧！”田中终于打定了投身政界的主意。是年田中27岁。

后来人们向田中间起他从政的动机时，他解释说：“我是因为想救助战败后一筹莫展、缺吃少穿、流离失所的人们，才立志进入政界的。”

翌年正月，田中为竞选众议院议员回到家乡。他向恩师草间先生直抒抱负，使本想劝止他参加竞选的恩师深为感动，转而自告奋勇，积极支持他的竞选。

大选原定于1946年1月举行。因占领军当局公布了《解除公职令》，并对参加大选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最后决定3月11日发表大选公告，4月10日举行投票。

这次大选，对田中来说，是人生的一次机会，也是一次挑战。这是一场艰苦而无把握的战斗。是年28岁的田中，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地方政界里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加之田中的竞选班子不甚得力，选举的结果更是吉凶难卜。

竞选期间，新潟连降几十年不曾有过的大雪。田中按照他的竞选参谋的安排，终日在冰天雪地里奔波。

有一天，他和草间先生一道踩着自行车赶到寺泊的学校里去作竞选演说，会场里竟没有一个人影，等了半天，总算来了四五个人，田中精神为之一振，道谢了一番，让他们坐下，便发表了热烈的讲演。讲完之后，不顾满脸汗水，又奔向下一个会场了。

规模最大的竞选演说是在柏崎市的一所小学校举行的。事前，田中的高级参谋久保田正治把拟好的讲稿交给了田中，并说：“你在当地人的眼里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所以，你首先要作些自我介绍。”

“是，是。”田中连连点头答应。

久保田还对他的衣着打扮作了指点，说为了对选民表示敬意，应该穿大礼服，就白手套。田中听了指教，特地理了发，当天又换了内衣，穿上礼服，郑重其事地登上了讲坛。但是，其他的竞选者都是一身工人打扮，他们身穿立领制服，足蹬沾满泥巴的长筒靴。听众大多是从战场复员回来的男人，都穿着满是皱褶的衣服，女人则穿着肥肥大大的裤子，上面满是污泥。相比之下，田中的打扮显得十分突出，甚至有些滑稽可笑。

因此，他刚上台，台下就发出了嘘声：“把礼服脱下来！”“脱下来！”

“我……”田中后来追述这段往事时说：“当时真被这种气氛制住了，只觉得头晕目眩。”

虽然如此，田中还是硬着头皮开始作自我介绍了。于是，又飞来喝倒彩的声音：“我们可不是来听你的经历的！”

田中脸色苍白，一副进退两难的样子，仿佛要哭出来。久保田回忆说：“我当时也在场，看到自己的忠告收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真不知该怎么道歉才好，只好用大衣蒙着头流泪。”

竞选中一直陪着田中奔走的草间，看到田中出师不利，听到有人冷言冷语，还碰到盛气凌人的人，感到很难过，甚至为此偷偷地擦眼抹泪。

田中却没有悲观，也没有退缩。他不顾风雪严寒，跑遍了整个选区，无论见到什么人，都主动地向他们鞠躬行礼。但田中到底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名气不够，又不懂得怎样有效地使用金钱，使得相当多的竞选活动经费变成“放空炮”。投票结果，田中只得了34060张票，名落孙山。

初试锋芒，未能如愿，对田中来说，无异是个打击，但田中并非一无所获。通过这次竞选，他结识了许多朋友，获得了许多知己，这为他后来的竞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政海初航

田中一开始就是作为保守政治家登上政治舞台的，他的政治行动具体地代表了城乡的保守意识。

雪耻

1947年4月25日，日本举行了战后第二次大选。这是根据新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实施）举行的初次选举。田中角荣获得了雪耻的机会。

当时，“建立民主国家日本”的呼声响彻全国，而实际上究竟怎么办，还处于痛苦的摸索状态。田中因应时势，以“年轻人的呼声”为口号，作为民主党（总裁芦田均）的候选人出马竞选了。

田中总结了第一次竞选失败的痛苦教训，决定亲自管理竞选事务。他周密策划，扎实行动，把竞选活动组织化。田中在选区建立了临时竞选办公室，还雇用了近100名职员。为了争取人心，田中带着酒到各村庄去，挨门逐户地给选民斟酒，大部分选票都是田中通过交往直接争取到的。

开票结果，田中当选了，开始了政治家的生涯。从此以后，他连续当选众议员，并奇迹般攀上了政坛的巅峰，成为战后日本著名政治家之一。

初试啼声

1947年7月10日，刚刚当选的田中代表民主党，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初试啼声，阐述了对议会政治的观点。他指出，在战后新国会的运营上，必须重视议员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使议员之间有充分的自由讨论的机会，认为这有助于建立透明的民主政治。

日本新宪法制订之初，国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各议院为给予从事国政的议员以自由讨论的机会，至少两周要举行一次会议。”这条规定旨在使议员有充分机会代表其所属政党或个人，自由发表意见和对政府提出质询，从而使议会活动活跃起来。但是，他看到的首次国会上的“自由讨论”却水平很低，各政党议员间互相谩骂和喝倒彩，堂堂议会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市场。

血气方刚的田中目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他果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人家发言时要认真地听！当然赞成与否是你的自由。唯有自己正确，容不得他人意见，这不是一个民主政治家应有的态度。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要重蹈覆辙，回到战争期间议会压制民主的老路上去。”

他还指出：“每个议员都不是孤立的个人，平均每个人背后有155000名国民大众，我们的发言正是国民大众的呼声。”要求政府对议员们的意见抱着诚恳和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

但是，田中青年时代所憧憬的民主的议会政治模式没有成为现实。由于以后几次全体会议上的“自由讨论”情况依然没有改善，这种“自由讨论”在1955年第五次修改国会法时，作为一项“无实际效益的制度”被削除。

第一个政策性发言

1947年9月25日，田中在众议院全体会议的“自由讨论”中，就当时应采取的经济政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是田中第一个政策性发言。

他首先强调了广大中小企业在日本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日本产业漫长的历史是以中小企业为母体形成的”。他说：“战前打入世界市场的薄利多销的日本制品，包括一部分在受威胁的情况下出口的汽车、电灯泡、钟表及其他制品，它们几乎都是由家庭工业或手工业之类零散的小规模企业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日本中小企业是建立在世界产业界上的金字塔。”在战败不久召开的国会上，还没有人如此强调中小企业的作用和重要性。

接着，田中谈到了振兴中小企业的意义，认为扶植中小企业是复兴战后产业的“燃眉之急”，中小企业的振兴可以提高国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提高技术水平，活跃贸易，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将发挥巨大作用。而且，通过发展乡村企业，使农山渔村的生活合理化，中小城市企业的发展，还可以防止大城市人口的集中。田中认为，振兴中小企业应当成为重建日本的出发点。

田中还猛烈抨击了政府在资金和资材调配上偏重大企业的政策，力陈考虑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主张通过禁止私人垄断、排除企业集中等手段，创造自由公正竞争的环境，以使中小企业得以健康发展，强调中小企业是日本重新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角，为使其逐渐博得世界市场的信用，成为“与国际经济为伍的和平日本的尖兵”，政府必须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

田中还提出设巴中小企业对策厅、完善中小企业家贷用资金的机构、建立经营咨询所等。这些主张直至今日仍是扶植中小企业的核心措施。

田中为完成战后复兴任务，还提出“建设行政一元化论”。

1947年12月4日，众议院国土计划委员会对政府的《建设院设置法案》提出质疑。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制度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内务省。于是，片山内阁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成立建设院的法案。而田中认为，建设院的构想不能适应“战后复兴”的要求，向片山首相提出了挑战。

“我是个土木建筑商，过去10年里，我一直主张设置建设省。为什么必须要设置建设省，现在已无需多费口舌。因我国的建设行政部门太多，管理分散，极大地妨碍着我国的重建。我想，总理大臣也承认这一点。”田中还具体他说明了设置建设省的迫切性：各建设行政部门本位主义，互相牵制，各自为政，致使有些涉及几个部门的工程计划无法实施，明显地影响了战后复兴，主张“在战后的日本，必须实行建设行政一元化”。

田中还从解决民众住宅问题的角度，力主设置一个独立的建设省，认为建设院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衣食住是人们生活的必需条件，住宅是一家人团聚的地方，是灵魂的安息所，思想的温床。如果过30年还恢复不到战前的住房水平，那问题可就太大了。如果不到30年就不能解决住房问题，那么片山内阁就不应该标榜‘建设高度民主’了……”

这说明田中当时已经认识到，解决国民大众的衣食住问题是治国安邦之本，所谓“政治活动”，首先是要“改善国民的生活”。田中作为日本战后

混乱时期涌现出来的政治家，所具有的时代顺应性和抓住民心的本领，表现了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资质和手腕。

走出危机

田中的仕途，经常潜伏着危机。1947年10月，片山内阁提出《临时煤矿管理法》，引起田中所属的民主党分裂。11月，田中脱离民主党，参加了由前首相币原喜重郎等二十几名议员组成的同志俱乐部，1948年3月更名民主俱乐部。同月，民主俱乐部与自由党合并，组成了民主自由党（总裁吉田茂）。同年10月，田中所属的民主自由党单独执政，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田中出任法务省政务次官，当时，他才是个当选议员仅一年半的新议员。

可是，40天后，田中因涉嫌受贿，被迫辞去政务次官。检察厅以田中在反对《临时煤矿管理法》活动中接受煤矿资本家100万日元贿赂为由，逮捕了他。

这是田中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但是，问题的解决很顺利：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田中有罪，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则判决无罪。其间，赶上1949年的大选，田中在小营的拘留所里出马竞选，第二次当选为众议员，得票比上一次还多3500张。

促成《国土综合开发法》

田中议会活动最初的政绩是促进政府制定了《国土综合开发法》。该法虽是政府的提案，但其基本构想是来自众议院建设委员会地方综合开发小委员会的报告，而田中是该小委员会的委员长，对报告的形成起了主导作用。

地方综合开发小委员会设置于1949年9月15日，此后，经过四次集中审议。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报告第一次确立了“国土开发的综合性”概念。田中还在报告中主张，地方的发展是国家综合发展的一环，而不只是为了建立地方的自给自足经济体制；要统盘考虑资源情况，综合研究治山治水、发电、交通等将对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要着眼于向农村普及文化，根据各地的实际，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提高整个国民生活水平。

《国土综合开发法》于1950年5月先后在众、参两院通过。该法是战后日本最基本的开发立法，它成了促进各地区各领域发展，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性支柱。

其中的《特定地区综合发展计划》，把全国的21个地区指定为“资源开发落后，且在防治自然灾害上需要采取特殊措施”的“特定地区”。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粮食问题和确保工业资源。由于这项计划变成了政府的行动，在广阔的领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如通过兴修水利，增加了粮食产量，扩大了水力发电能力，等等。

《国土综合开发法》制定后的12年，池田内阁又通过了日本第一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该计划的基本目标是谋求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其具体措施旨在“防止城市过分膨胀”，“缩小地区差别”，“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适当地分配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资源”，计划于1970年实现上述目标。

1969年，佐藤内阁又制定了《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该计划提出了1985

年以前的奋斗目标，但由于“石油冲击”之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计划流产，结果被1977年福田内阁制定的《第三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取代。这项新的计划以“创造丰饶的环境”为主题，为纠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生的种种弊端和国土利用的偏差，解决人口过密、过疏的地区差别，重点在于充实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网以及发展全国通讯网络。

田中1972年登上总理大臣的宝座之后，就对他当年促成的《国土综合开发法》进行修正，同时，根据他的施政纲领《日本列岛改造论》，通过制定《国土利用计划》和设立国土厅，使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现在，田中虽然早已下野，但他的政策思想仍然存于现实的政治中。人们认为，竹下登首相倡导的“日本列岛故乡论”（亦称“故乡创生论”）和自民党领袖之一宫泽喜一倡导的“资产倍增计划”，都是与田中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一脉相承的。

提出《电力发展促进法》

田中在报告中提出的另一项主张是关于发展电力资源问题。日本战败之初，由于社会混乱，工业停滞，对电力的需要曾一度减少，但两年后，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田中作为地方综合开发小委员长提出报告时，电力发展计划已纳入经济恢复五年计划。为了加速电力事业的发展，田中在上述报告中，就发展方式提出了积极的倡议，并提出了《电力发展促进法案》。

但是，为了实现田中的提案，首先必须征得美军占领当局的同意。美方认为，电力产业是一种潜在的战争能力，它的发展必将导致日本产业基础的加强、经济的自立，乃至日本的振兴，故而采取了非常消极的态度。由于这个原因，《电力发展促进法》迟迟到1952年7月才得以制定。这时，日美间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日本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政策。

《电力发展促进法》的实施，大大促进了日本电力产业的发展，为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后来的腾飞，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田中作为政治家的声望，也因此得到了提高。

促进住宅建设立法

如前所述，田中是战后困难年代里重视解决衣食住问题的政治家之一。他在第一届国会上就住宅问题大声疾呼之后，接二连三地提出了有关的政策设想，并积极地促进了住宅建设立法工作。

在他的积极要求之下，首先在众议院国土计划委员会里成立了住宅复兴对策小委员会。鉴于当时住宅问题并没有引起政治家们普遍的重视，田中在议会里反复强调，“欲使政治稳定，要让黎民百姓有房子住，住宅问题务必要解决”，并要求政府采取综合性的政策。

关于住宅政策问题，田中的基本设想是：（1）政府动用国库直接帮助国民建设住宅是有限度的，为此，要运用国民想利用自己的资金建房的积极性，同时，要采取措施，提供低息贷款，以解决其资金不足的问题；（2）营建公营住宅，以解决无力自己建房的人的住宅问题。

田中的设想，前者导致了《住宅金融公库法》的制定，并消除了妨碍国民自建住宅积极性的法律限制，如减免高额税金等；后者导致了《公营住宅法》的制定。这样，既照顾了一部分有能力建私房的人的需要，又为解决无力建私房的人的住宅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

《住宅金融公库法》1950年4月公布，但在法制和财政方面有很多困难，进展受阻，亟需从政治上作强有力的推动。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率先行动，他联合一些议员于1951年5月12日向国会提出了《公营住宅法案》。该法案明确指出，提出此案旨在使“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协作，建设健康而足以享有文化生活的住宅，以低廉的房租把这些住宅出租给低收入者使用，从而对稳定国民生活和增进社会福利作出贡献”。此时的田中，已从社会

福利政策的角度来考虑住宅问题了。

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日本政府马上据此制订了一个《公营住宅建设三年计划》，使战后日本的住宅政策进入新阶段。

其后，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公营住宅法》曾几经修改。

1955年，又设立了日本住宅公团，从而确立了以公营、公库、公团三个支柱为基础的住宅政策，使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一定福利。

后来，田中在第十三届国会（1952）和第十六届国会（1953）上，分别参与制定了《耐火建筑促进法》和《北海道防寒住宅建设等促进法》。前者指定了城市的防火地区，对在该地区内建筑耐火建筑物进行补助；后者规定国家对为在北海道建筑防寒住宅进行的实验研究提供资助，并对建筑防寒住宅在提供住宅金融公库的贷款条件上，给予一定的照顾。

这样一来，至1954年，日本基本上有了一整套住宅政策。

这里不能不指出，“住宅难”一直是战后日本社会一大问题，即使在日本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这个问题仍未解决，以至欧美各国椰榆日本人住在“兔子窝”里。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的国家明显存在着“生产与生活失衡”现象，相当一部分人在第一流的经济水平下忍受着第三流的生活水平。近年来，随着日元升值，日本国力进一步增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87年已超过美国，但就日本人的住宅状况而言，实难认为日本是个“经济超级大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少可以说，日本的住宅情况仍未改善。

关注交通事业

在有关住宅问题的法律基本完备之后，田中又开始关注起日本的交通事业。

田中生于多雪的新潟县，那里的道路一年之中有1/3时间被冰雪封冻，当地人不得不在“陆上的孤岛”生活。克服冰雪，建设道路，是田中少年时代的执著追求。他成为政治家后，这种追求变成了坚定的信念。他认为，道路的建设，将带来文明的发展，而文明的发展，将使人得到解放。道路是国家的动脉，如果不建道路，日本的重建和振兴都是不可能的。

公团，是依靠政府资金和民间贷款来运营的机构，如住宅公团、道路公团等。公库，是向建筑住宅和兴办事业提供贷款的政府机构，如住宅金融公库等。

田中直接参与了全部有关道路的立法工作。他的手法与参与《国土综合开发法》和住宅法的立法过程一样，先是在众议院建设委员会里设置小委员会，约集有关议员和有关政府人士，进行彻底讨论，在此基础上，写成一份小委员长报告，然后择机作为议员立法提出。《道路法案》是1952年4月17日，以田中为首席提案人向众议院提出的，经众、参两院审议通过后，于同年6月10日公布。

1919年，日本帝国议会曾制定过《道路法》，但该项法律作为旧宪法思想体现，具有浓厚的中央集权色彩，优先考虑的是行政和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要求。其后，据此制订过几次道路改良计划，但由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经济恐慌以及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没有取得实际成果。至二次大战结束时，道路荒废至极。1948年，政府制定了关于修筑道路的法律，但主要还是停留在已有道路的修修补补上，以应急需。

另一方面，在战后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中，由于《地方自治法》的出台（1947），地方自治体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国家和地方自治体相关的公共财产——道路——的管理方式，迫于根本性的改革。

再者，由于1950年以后，汽车数量激增，而且，至1951年，矿工业生产超过了战前的水平，道路的状况与交通需要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形势要求用一部新的道路法来取代旧道路法。

田中正是鉴于这种情况，带头提出了新道路法案，其主要内容有：

（1）修改现行法律，把国家干线道路网中最重要的道路分为一级国道和二级国道，由国家积极地促进其修筑。

（2）作为促进筑路的手段，明确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的责任、分工，各尽其责，各尽其力。为此，要改变作为现行法律基础——道路要由国家修筑——的旧观念。树立一级国道和二级国道由国家来修，其他道路要由地方公共团体来修的新观念。

（3）基于上述想法，要改变现行法律中以各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为道路管理者的做法，建立一级国道和二级国道由都道府县知事管理，都道府县道由都道府县自行管理，市町村道由市町村自行管理的体制。

（4）国家应增加负担新建或改建一级国道所需费用的比例，以促进一级国道的建设。

（5）为适应现代交通的要求，充分发挥道路的机能，应完善对企图占用道路青及在道路上行驶车辆者的规定，改正现行法律在调整道路及这些人的利益方面的不完备之处。

（6）改变现行损伤负担金制度，建立相应的新制度。

（7）建立对土地因新筑或改筑道路被占用的损失补偿制度。

（8）为健全道路的行政管理，要设立道路审议会，作为建设大臣的咨询机构，其委员由建设大臣任命。

《道路法案》提出后，于当年6月通过，它被称为战后日本的“道路行政宪法”，它的作用被后来的日本现实所证明。

为促进新道路法的实施，田中又推动政府制定了《关于道路整备费的财源等的临时措施法》。该法不仅使道路整备所需财源有了法律上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它将作为加速经济增长的根本政策之一，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

1929年纽约股市暴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也受到严重影响。

产生不可估量的波及效果。

此后，田中与“道路”的缘分越来越深。在上述两个法案通过之后，《道路整備特别措施法》（1952）、《日本道路公团法》（1956）、《关于确保积雪寒冷地区交通的特殊措施法》（1956）、《高速汽车国道法》（1957）、《国土开发纵贯汽车道路建设法》（1957）等相继制定。这些道路法的制定，促进了日本道路网的建设，为日本向经济大国过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证。

从上可知田中从政初期的活动是以议员立法为中心的。他当选议员的最初8年间，参与提出的法案达26项之多，这在日本议会史上还没有先例。

据统计，田中亲自提出的法案有46项，其中成立的有32件。田中曾说自己搞过的议员法案有73项，实际上，如加上他任自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和大臣期间经手的法案，恐怕不下数百项。

1955年以后，田中历任商工委员长、邮政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大藏大臣、自民党干事长、通产大臣等职，后又成为自民党总裁和首相，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直接向国会提出法案。况且，由于时代的变迁，国会审议的法案变得大部分都是由内阁提出了。

但是，田中在就任自民党和政府的要职之后，仍时常亲自提出一些设想，与智囊们共商，然后作为内阁的法案或其他议员的法案提出。许多法律就是以田中的思想为基础制定的。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田中如此精力充沛地去进行国会活动呢？

日本政治评论家、曾任田中秘书多年的早坂茂三认为，这是田中在战后新宪法赋予的民主条件下，“代表在我国（指日本）的历史中，被国家弃而不顾、成为牺牲品的人们的政治活动”。

早坂指出，在战前的旧宪法下，主权存于天皇之手，从而，立法权也属于天皇。帝国议会只是对天皇的立法权起辅弼襄赞作用的机构，实际上行使立法权的是官僚和特权阶级。然而，战后制定的新宪法规定主权在民，立法权在国会。用日本宪法学的最高权威、已故宫泽俊义博士的话来说，这是日本战败后实现的一场“革命”。

只因“主权在民”，田中才得以登上政治舞台，才可能在国会里慷慨陈词，表明自己的立场，面对面地与总理大臣论争。早坂认为，“在战后日本的政治中，田中是最理解新宪法，并要实现新宪法精神的政治家之一，是立于‘1945年8月革命’前列的实践者”。

田中本人也曾在一篇题为《自民党的反省》文章中说过：“战后的政治家，不少人有一种错觉，误以为精通行政，能看懂预算表，能修改法案就是政治。这虽然也说得过去，但我想明确指出，只有在吸取各阶层国民的利益要求，并在将此充分过滤的基础上，找出全体国民的利益要求，并亲手通过立法，昭示政治和政策的方针，才是政治家本来的机能。”

但是，舆论界却对上述看法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田中是所谓“利益诱导”型政治的元凶。

对此，早坂又加以反驳。他说：“田中的‘利益诱导’型政治，是意欲将被特权阶级占有的利益引向民众一边的尝试。”

田中的政治动机和动力究竟为何物，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容忽

视的是，田中一开始就是作为保守政治家登上政治舞台的，他的政治行动具体地代表了城乡的保守意识。因此，他的政治活动自然受到具有保守意识的群众和保守党的青睐。刚刚从旧秩序中解放出来的具有保守意识的群众，把田中看作其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保守党也发现了田中在权力稳定机制中的作用。田中从政之后，节节高升，从一介“头排议员”成为掌执政权的总理大臣，其奥秘正在于此。

头排议员，指初次当选的议员，在国会里坐在第一排座位上。

仕途坦荡

身居要津，显出与众不同的资质和独特的风格。不循规蹈矩，讲求实效，善于学习，不矫揉造作和超群的行动力，在他身上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最年轻的邮政大臣

1955年以后，日本在各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转折。

革新的社会党左右两派实现了统一（1955年10月），保守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实现联合，结成了自由民主党（1955年11月），从而出现了自、社两党对立的政治格局。

遭受战败严重打击的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军事订货的刺激和美国的直接援助下，迅速恢复，铺垫了高速发展的轨道。1956年发表的《国民生活白皮书》宣布“战后阶段已告结束”，经济已进入“起飞”阶段。

技术革新的浪潮冲刷着人民的消费生活，电视时代拉开了帷幕。但是，在一些部门，劳资关系依然紧张，特别是邮政系统的工会组织“全递”，作为“总评”中的一个富于战斗力的组织，与官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57年7月10日，岸信介改组内阁，田中被任命为邮政大臣，时年39岁，是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大臣。

田中的荣升绝非偶然。尽管他自称“八成是因为交了好运”，但一般认为，是田中的行动能力受到岸信介和佐藤荣作两兄弟的垂青。岸信介与石桥湛山、石井光次郎争夺自民党总裁宝座时，田中在佐藤麾下，曾为岸立下汗马功劳，而当石桥短命内阁下台、岸信介如愿以偿时，田中又作为佐藤的得力干将四处奔走。

田中就任次日便召开邮政省全体职工大会，发表训辞：“我是新潟县柏崎生人，才39岁，不言而喻，还很不成熟。因此，在能力高而又老练的前辈平井之后，接替这个职务，很有些担心，不知究竟能否干好。但是，我还年轻，来日方长。希望大家不要将我与前任大臣比较，说长道短，希望你们向前看，能把我当成一个还有点使用价值的人。”

“关于邮政事业，我完全是个门外汉，谈不上有什么抱负经纶。我只想在大家的协助下，把这项属于国家和社会的邮政、电报电话、电波等事业，办得越来越兴旺。在组织工作方面，我特别希望大家的是，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最终的责任当然由我来负，这是我就任之初首先要强调的。”

礼堂里挤了1000多名职工。许多人趴在窗口，争睹这位39岁的青年大臣的风采。

会后，田中回到办公室，看到“全递”工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书记长等候在那里。原来他们是来向新大臣田中提抗议的。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田中下令摘除了“全递”工会的招牌。三个人怒气冲冲地质问田中，指责说这无异于“偷窃行为”。田中毫不退让，反击说：“哪个国家有在机关里开店，而把店招牌挂在机关大门口的事情？你们把‘全递’工会的招牌挂在邮政省里，请问你们，付房租了吗？”

接着，田中又说：“我不想说好听的，我要改一改老规矩。该改的就要

改！”

这就是田中与“全递”工会的第一次交手。从此，立下了双方定期会谈的规矩。在此之前，历届邮政大臣的方针都是回避与工会的直接接触，而田中却认为，要想解决纠纷，就要面对面地对话。他自己对应付对话也怀有自信。

就在商定定期举行会谈之后不久，“全递”工会方面要求增加参加会谈的人数，而改变只有工会三位领导干部参加的做法。田中不顾邮政省事务当局的反对，满口答应说：“来吧，来几十人几百人都行！”于是，决定先与50名工会会员会谈。

那天，工会方面找了一间大厅，让头扎布巾的女会员坐在最前面。田中在听取了15名会员的意见之后，伺机说道：“好了，我明白了。现在可以谈谈我的想法吗？”田中首先厉声要求女会员把头上的布巾摘下来。此要求遭到工会书记长大出俊的拒绝后，他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大臣和本单位的人谈话，彼此都不要摆出吵架的架势。首先请你们把布巾取下来，气氛搞得太紧张不好。平心静气地谈谈心吧。”

接着，田中滔滔不绝他讲了起来，话题越来越泛。

“大臣真是岂有此理，尽讲些我们没有问的琐事可不好！”认为自己上当受骗的大出书记长愤怒地喊道。

“不会的。我们的邮政事业是受国民之托的一项大事业，我当然应该同你们进行对话。你看，她们听了我的话后，也点头同意嘛！‘民主’这东西是一半对一半，你们讲一个小时，我也要讲一个小时，你们讲两个小时，我也要讲两个小时。这是理所当然的。”田中不客气地回敬道。

工会干部听了这番话后，无言以对，田中立即宣布结束会谈。从此以后，工会方面再也没有要求举行群众性的会谈了。

但后来，某县邮政局长自杀，又引发了一场斗争。

为了平息“全递”工会的斗争，田中召见其领导人，向他们提出书面警告，指出工会搞的政治斗争、休假战术、上班时间开大会和设置纠察线等行为，是违反《国家公务员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将按法规予以处分。

接着，田中又通过邮局向全体邮政职工的家发信。工会方面把信退回后，田中又表示，“你们不合作，我还要寄，退多少次寄多少次”，工会方面只好声称“请便吧”。

田中向职工写信的“战术”出乎工会的意料。邮政省事务当局对这种做法也不甚欢迎，但田中还是执意这样做了。

一个大臣向他主管部门的全体职工写信做工作，这在日本还是件罕事，自然也就成了人们一时的话题。这封信要求全体职工“为传统事业（邮政）的发展，自觉努力”，要求“全递”工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承认职工有理由要求“改善自身的劳动条件”，表示他将为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尽最大的努力”，给职工创造“愉快工作的条件”。田中声称，他和职工的想法“完全一致”，即“既要改善劳动条件，又要使邮政事业顺利地进行”，他表示，“劳资”之间的问题“可通过和平的、友好而怀有诚意的谈判获得解决”。

其后，“全递”工会的斗争虽然仍有发展，但田中的手腕奏效。1957年

《历代邮政大臣回忆录》。

《通讯文化报》，1957年10月2日。

11月6日，工会与邮政省之间的秋季斗争，经过通宵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使秋季斗争结束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早。

可是，翌年春季劳资双方又起冲突。由于“全递”工会在春季斗争中利用上班时间召开大会，田中以违反《公共企业体等劳动关系法》和《国家公务员法》为由，毅然决然地处分了大批工会干部和会员，其中“全递”委员长等领导干部7人被解雇，297人被勒令停职，2000人被降薪，404人受警告，21567人受训告，加起来相当“全递”工会总人数的1/10。

田中做出了上述处分决定之后，又给工会方面3亿日元，作为解雇的预支金。田中表示，这样做是出于不使会员发生生活困难的考虑。

大批处分工会干部和会员的举动，受到了自民党方面的高度赞扬，使田中在党内的声望陡然提高，而事后也不大听见工会方面的责难。

田中担任邮政大臣期间的显赫政绩之一，是批准在全国开设43家电视台、站。田中任内解决了这个久拖不决的悬案，其决断能力受到肯定与称赞，也使田中在政治上加深了跟新闻界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大批电视台、站的开设，对日本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当时，日本全国只有黑白电视接受机90万台左右，而由于电视台、站的大量开设，加速了电视时代的到来。由于电视机生产的扩大，日本的弱电、重电部门飞速发展，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之一。后来，电视机又和汽车、钢铁一样，成为日本出口的拳头产品，加速了日本经济的膨胀。

出任政务调查会长

1958年4月25日，众议院解散，5月22日举行大选。6月10日召开特别国会，第一届岸信介内阁辞职，第二届岸信介内阁诞生。6月22日，田中辞去了邮政大臣的职务。7月，田中就任自民党新潟县支部联合会长，致力于党的组织发展工作。翌年9月，出任自民党副干事长。其间，田中潜心于国土开发方面的立法工作。

1960年，岸信介强行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日本爆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6月23日，岸信介内阁被迫辞职。在这之后，为争夺自民党总裁的宝座，出现了池田勇人、石井光次郎、藤山爱一郎、大野伴睦四雄逐鹿的局面。为使池田上台，田中和岸信介、佐藤荣作一起，在幕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当时已是佐藤左右手的田中认为，日本保守派的主流应该继续紧握权力，只有让池田—佐藤接班，日本的政治方向才有不发生偏离的保证。正是在田中的努力下，佐藤退让一步，使池田捷足先登总裁宝座了。

池田内阁成立后，田中回党内工作，担任政务调查会长，是年43岁。其间，他通过与医师会谈判解决医疗费问题，又一次显示出解决难题的本领。

由于问题久拖未决，当事者的一方——保险方面的医生——声称要全部辞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仅要影响到患者，还要使政府丢脸。

田中接手处理这个棘手问题时，医生们宣布的辞职时间已经迫近。于是，田中便急匆匆地拜访了医师会会长武见太郎。由于他带去的是厚生省拟的旧方案，医师会方面当然不答应，谈判破裂。

最后一天——7月31日，田中带着自己拟的方案去医师会馆。他一见武见会长，就单刀直入地说：“如果连这个方案也不接受，那么，无论政府还是自民党，只能把医师会抛开不管了。双方认真地考虑一个成熟的方案吧。”

他显然是在耍边缘政策。

另一方面，武见也善于看人和估量形势。他说一声“行”，就同田中商定了所谓“四原则”，即“彻底修改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水平，与国民福利结合起来”，“自由地确立同保险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确立自由经济社会的诊疗报酬制度”。双方还同意“设立医疗恳谈会”。这些原则为医师会和厚生省之间的谈判打下了基础。

参加这次会谈的医师会理事兼宣传部长远藤朝英事后说，“那时，所以能谈妥，是因为医师会方面对田中先生的认真和诚实有很高的评价。还有，田中先生真正抓住了我们所想的要害问题”，“听田中先生的声音，就觉得这个人不一般……虽然目前被人称为‘轻量级’的干部，但我认为他迟早会上升为一代英雄的”。

池田首相用田中为政调会长，是期待他对维持政权进行忠心耿耿的合作。田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了池田。因当时党的干事长前尾繁三郎动辄生病，田中常常发挥了替代干事长处理党务的作用。

田中在池田执政期间，继政调会长之后，又被起用为大藏大臣，为池田谋求的经济高速增长目标，发挥了尖兵作用。池田去世后，田中留任佐藤内阁藏相长达三届之久，长期负责运营日本的财政，成为精通财政、金融的专家。其间，他在自民党内的地位不断提升，为后来担任佐藤政权的自民党干事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田中担任政调会长期间的政绩是显著的。他推进了所得倍增政策，为实行经济开放打下了基础，促进了煤炭、海运、肥料等产业部门的发展。

1962年1月23日，田中在众议院全体会议（第四十届国会）上，代表自民党对池田首相的施政演说进行质询。这是田中在政调会长任内，在国会的正式场合合作的唯一一次发言。

田中在质询中，把自己的政治信条称作“爱的政治”，其核心内容是主张国家要采取适当的政策，推进日本不发达地区的综合发展和建设新产业城市，缩小城乡差别，使城市和农村“共存共荣”。

田中在发言中批评了那种把设备投资和公共投资集中投向大城市的偏向，指出这是“错误的”“鼠目寸光”的做法，应该放眼民族的未来，进行更合理的长期投资。如果急功近利，指望今日投资，明日就有所获，势必扩大城乡差距，造成人口过分集中于大城市、生产布局不合理的局面，而人口过于集中，会带来交通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将来改造所要花费的财力将比建设的花费还多。

田中指出，农村、山村、渔村是日本人“心中的故乡”，为日本战后的复兴和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能忘恩负义，将农村抛在一边。

田中在发言中，还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是“国家百年大计”，“教育的刷新充实是当务之急”，主张教育方针应是使学生有正确的人生观，“懂得为什么生活、学习和劳动”，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父母与自己”、“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认识“自己在社会上享有的权利和应负的责任”，“做一个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当之无愧的日本人”。

田中作为执政党的发言人提出上述政策主张，当然是与池田首相的经济政策以及所谓“塑造人”的教育政策相呼应的。但反过来说，正是田中本人有这样的政策主张，池田内阁的相关政策才得以强有力推进。当时，田中已身居权力中枢，成为池田政权的台柱之一了。

大藏大臣时代

1962年7月18日，田中角荣出任第二届池田内阁的大藏大臣。田中出任此职，在自民党内遭到反对姑且不论，还使大藏省的事务官僚感到吃惊。

大藏省是重要的政府机关，历代首相常常任用通晓财政金融、相当于副总理一级的大人物担任藏相。而田中是年44岁，历史上还不曾有如此年轻的藏相。况且，他在财政金融领域并无多少经验可言。加之，他只有高小毕业的学历，在大藏省事务官僚们的眼里，他只不过是土木建筑商出身的政治家。

而且，田中任政调会长期间，在自民党内积极推动《水资源开发促进法》、《新产业城市建设法》等立法工作，一直对此持消极态度的大藏省事务官僚担心田中出任藏相后，强行推进上述目标。

田中体察到大藏省内的气氛，在上任之初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既然把我放在大藏省这个位置上，首先我要努力使国民理解大藏省的工作。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知道金钱来之不易，因此，我要站在纳税的国民的立场上，正确地使用国家的钱……”

田中上任第一天向大藏省课长以上干部训话时，又说：“我是田中角荣，高小毕业。诸位是日本的‘秀才’，是财政金融专家。我虽然是个门外汉，但也迈过不少门槛，知道一些做事的秘诀……大家一起共事，重要的是要互相了解。欢迎你们到办公室来找我，不要有顾虑，什么话都可以讲。不需要经过顶头上司的批准……我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就不办。但是，一切责任都由我田中角荣来负。”

新大臣上任训话，这是日本各省厅的惯例。首次训话讲得好不好，往往成为评价大臣的标准。田中上任伊始的训话，打响了第一炮。大藏省的干部们放了心。当时的大藏省官房长官佐藤一郎后来说：“该来的人终于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感觉。”

田中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中心期任藏相的。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起飞，以1957年为顶峰的“神武景气”和1959—1961年的“岩户景气”作支柱，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岩户景气”期间，出现了空前的投资热，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1959年为17%，1960年为41%，1961年为37%，持续保持了惊人的记录。由于这种高速增长，日本的对外贸易呈扩大之势，技术革新方兴未艾，社会生活变得活跃起来，世界各国也开始重新注视日本。为此，池田内阁于1960年发表了贸易自由化计划和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进一步表明日本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经济国际化和高速增长。但实际上，日本离经济国际化的目标还很遥远。而且，田中上任时，日本经济刚刚从一场危机中走出来，人们对日本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增长，看法分歧，大藏省也没有成熟的看法。

田中受命于这个时刻，可谓任重道艰，无疑是个考验。但历史证明，田中作为藏相，在职三年间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从1962年7月至1965年6月，他连任池田和佐藤两个内阁的藏相，负责国家的财政管理工作，以编制国家预算为中心，处理了许多难题，对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加速国际

化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田中任职期间，日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十四条国转为第八条国，参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转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十一条国，对于一揽子降低关税谈判即所谓“肯尼迪回合”，采取基本赞同的态度，等等。这标志着日本从锁国经济、温室经济向开放经济体制转变，稳步地走向世界。

田中在他的《大臣日记》中，对其大藏大臣的生涯作了满意的自我评价。他写道：“三年，从漫长的人生看来，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在万事皆争朝夕的时代，整整三年的岁月并不算短。任何一个人站在起跑点上的时候，都会在内心深处发出‘一定好好干’的誓言……回顾三年，无所遗憾。”

田中任大藏大臣期间，已经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资质和独特的风格。不循规蹈矩，讲求实效，善于学习，不矫揉造作的平民风格，在他身上都表现得比较突出。人们认为，这些特点也是铸成田中藏相业绩的因素之一。

下面不妨列举有关田中的几个真实故事：

其一，抵制“进讲”。日本有个不成文的做法，当了大臣，要听“进讲”。各局长、课长都将自己主管的工作整理成文字材料，装订成漂亮的册子，对大臣作说明，这实际上是给大臣上课。按通常做法，一个局就要一两天，合起来就要两周左右的时间。

田中决心作一番改革。他一上任立即宣布：“装订好的材料，等我有闲空的时候再读。各局先用一个小时进行说明，只就文章里没有的内容进行重点说明。”

大藏省的官房长官佐藤一郎听后，劝说田中还是听一听。他说：“我知道大臣是什么都了解的，但是，这些人都是连夜把材料赶出来的，不挤出时间听一下，不好办。”

“那我知道，但不是马上需要的我不听！”田中坚持道。

“若是没有时间听的话，那就请大臣挤时间读一读吧。”佐藤退让了一步。

田中却接着采取了攻势。他放大嗓门说道：“我读书是个浏览主义者，一本书花上10分钟的话，就大体上知道写的是什么。如果局长们的说明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学习也可以，听也可以，但不都是一些‘这个不行’、‘那个要拒绝’的话吗？如果谈的是执行什么政策，那又另当别论，否则，各局的说明就没有必要。”

就这样，田中把这个沿袭了多年的衙门作风改掉了。

其二，博得掌声的英语演说。1962年9月，田中藏相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去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十七次年会，竟然大着胆子在会上用英语发表演说。出发前，田中让从美国回来过暑假的女儿真纪子按照演说稿作了录音，猛练了一阵，增强了信心。加之田中听说，各国代表中懂英语的人才有一半左右，美国人和英国人说话时也要带翻译，否则也不能完全听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第八条国和第十四条国规定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得借口国际收支的赤字和美元不足而实行限制进口贸易。后者是指以战后的过渡时期为限，如美元不足，可以享受限制进口贸易的国家。日本1952年8月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作为第十四条国，享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恩惠，后由于经济实力增强，尤其是在1961年2月英、联邦德国、法、意等西欧主要工业国一齐转为第八条国之后，日本也被迫转为第八条国。这是经济国际化的必不可少的步骤。

该条规定参加国一般地取消进出口贸易限制。

更觉得自己的英语也不必那么担心。

田中登台讲演，全场肃静地听他讲完后，报以掌声。

回国之后，他坦率地对人说：“当时我打听了一下，大家总算听懂了。不过，会议主席问各国代表是否有什么疑问，我一听出了一身冷汗。说真的，如果一个个纷纷用英语提问，那就不可收拾啦。幸好没有人提问题，我才过了关。”

其三，酒会放声高歌。就在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十七次年会要回国的前夕，田中在一家公司的老板为各国代表举行的送别会上，引吭高歌，唱了一曲《王将歌》，令其文质彬彬的随员们大吃一惊，而各国代表都很高兴，夸他是个风趣的人。

田中这次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是他初次踏上美国的国土。在此之前，他也不曾参加过国际会议。但是，田中是个有心人，参加过这次会议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外交家了，而且总结出一套经验。

他在其所著的《大臣日记》中写道：“对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政府代表和外交官来说，必备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是好胃口；第二是腿脚灵便；第三是外国语；第四是即使遇到激烈的、异乎寻常的事情，也不为之所动。外交就是吃吃喝喝的机会多，所以有人说外交就是吃喝。一天之中有 5—8 次宴会、酒会和午餐会是常事。如果没有能这样吃吃喝喝的胃口，就不能进行工作。

“还要会打高尔夫球；还有，只要一有客人来访，往往都要回访，自己也要为拜访而奔走，这些都是不用腿脚不行的。

“与各国代表谈话的时候，一般不用那种开口就说‘是’和‘不’的呆板说法。从谈笑开始，以谈笑告终，不道出本意，适当讲些俏皮话，在谈笑声中进行工作，这样做最好。同时，对于对方发表的一些激烈或奇怪的言论，要是都信以为真，那就可笑了。所以，必须具备不为之所动的健全的神经。”

1964 年 11 月，池田勇人因病辞去首相职务，佐藤继任首相。佐藤新首相声称要继承池田路线，在他的班底中，除更换了内阁官房长官外，其余的人员全部保留，田中当然留任其藏相职务。他在这个岗位上共干了三年，直到 1965 年 6 月佐藤重新组阁时，被提拔为自民党干事长为止。

这时的田中在财政金融方面早已不是门外汉了。主持大藏省工作三年的实践，使他不仅成为一名精通业务的行家，而且有了独自の财政金融政策。

一人之下

在佐藤掌政期间，曾经五任自民党干事长，呼风唤雨，扮演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角色。

五任自民党干事长

战后日本的政体是议会内阁制，实行以政党操纵政治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战后新宪法规定，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议会分众、参两院，其议员均由选民选举产生，在众议院中占有议席最多的政党出来组阁，内阁对议会负责。

自由民主党自 1955 年成立以来，在议会里一直拥有过半数席位，未来的内阁自然是自民党内阁。

由于执政的自民党的意志是通过内阁的活动来体现的，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内阁的作用而忽视执政党的作用。实际上，执政党的作用非常之大。内阁制定的法律、编制的预算及与外国缔结的条约等都要通过执政党的力量及其努力，获得议会的通过或承认。内阁意欲推行的政策，如果没有执政党的保证作用，是不可能实行的。因此，自民党的干事长、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等三个“常委”的职责非常重大，尤其是干事长，处于发挥核心作用的地位。

自民党党章第八条规定：“干事长辅佐总裁，执行党务”，表明干事长具有广泛的职责，可谓“万事皆管”。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自民党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的调整机能加强，党对政府机关的主导性增大，干事长不仅仅限于管理“党务”，掌管全部国政的“政务”，也成为其重要的工作了。

一言以蔽之，自民党干事长是执政党自民党的大管家，在权力结构中，其地位和实权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具体而言，干事长的职责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运营国会。干事长要负责使国会通过由自民党、政府提出的法案、预算案和条约等事项。为此，他要负责调整与各在野党的关系，有时不惜采取强硬手段，排除在野党的反对，达到目的。

（2）调整党内意见。在特定的政策目标下，负责调整党内各派系间的意见，使其达到统一。

（3）在党与内阁间起联络、调整作用。自民党与内阁的意见未必总是一致的。尤因自民党内派系林立，往往有主流派、非主流派之分，甚至还有反主流派存在，派系间常因权力分配问题引起矛盾与抗争。为防止因此引起政局动荡，干事长需在党与政府间起联络、调整作用。

（4）参与决定内阁、国会及党的人事。首相组阁时，干事长加入组阁小组，做首相的参谋。同时，干事长在决定本党的干部和本党的国会干部问题上，有举荐权。

（5）提出或调整政策。大凡由自民党和内阁提出的新政策或关于调整既存政策的意见，均由干事长负责。

（6）应付选举。干事长负责拟订和落实本党在众、参议院选举及其他选举中的对策。选举对一个政党来说，生死攸关，争取本党获胜，是干事长最大的职责。

(7) 筹集资金。同其他各政党一样，自民党为进行政治活动，也需要有一定的资金。但因自民党的总裁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表面上不参与筹集资金的活动。于是，这项工作就落在干事长的头上。这是自民党的习惯做法。

由此可见，自民党和内阁的所有工作都与干事长密不可分，其成败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事长的实力和手腕。

田中在佐藤荣作执政期间，共任五届自民党干事长职务，长达4年零1个月，创该党历史上干事长任期的最长记录。

佐藤首相在日本政坛以“知人善任”著称。他之所以雄踞总裁、首相宝座长达7年8个月之久，其秘诀在于“用人有方”，让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和保利茂分理党务和政务，是他成功的权术表现之一。佐藤起用田中长期担任干事长一职，使其居于权力中枢地位，是因为佐藤政权为解决它所面临的许多难题，无论如何也需要借助于田中的智慧和行动力量。

佐藤首相的前任池田勇人执政期间，推行所得倍增政策，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日本的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变化，种种社会弊端突出显露，而且，池田实行“忍耐政治”，出于同在野党关系的考虑，把一些本来应该迅速处理的问题搁置起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和悬案，成为佐藤内阁不可回避的课题。田中作为执政党的干事长自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日韩关系正常化”大动干戈

田中任干事长期间，不顾日朝两国人民的反对，为“日韩关系正常化”的实现煞费苦心，在调整党内外意见方面，发挥了对自民党主流派来说不可或缺的作用。

“日韩关系正常化”对日本统治集团来说，是战后一大课题。朝鲜曾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战后，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被摧毁，但朝鲜并没有能够建立独立、统一的国家，而被分裂为南、北两部分。1945年美国占领朝鲜南半部和日本之后，为加强东北亚地区的反共力量和组织美、日、南朝鲜联盟，积极“促进日韩间的和解”。美国的“和解”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日本和朝鲜人民的反对。它们认为解决朝鲜与日本之间的“邦交正常化”等问题，应由统一的朝鲜政府同日本谈判，在朝鲜分裂的情况下，日本不应该与南朝鲜当局单独谈判，南朝鲜当局也没有资格代表全体朝鲜人民。加上南朝鲜右翼势力中的一部分人士对这一政策也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日本与南朝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在美国的推动下，1952年2月15日，日本同南朝鲜举行了正式会谈（这次会谈后来被称为第一次“日韩会谈”）。从这时起到1961年5月，双方共举行了五次会谈，但都没有取得进展。在头两次会谈中，南朝鲜当局曾要求同日本建立对等的关系和废除1910年的《韩日合并条约》，日本方面当时均没有接受。另一个主要分歧是“财产请求权”问题。在第三次会谈中，日本代表久保田贯一郎曾发表了朝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美国军政府把日本人的财产归还朝鲜政府（指南朝鲜当局）违反了国际法”，“日本在统治朝鲜期间给朝鲜人带来了利益”等言论，一方面为日本侵略朝鲜辩护，另一方面则表示了日本不愿赔偿或少赔偿的意图。后来，经美国的“调停”，1957年12月双方发表了《日韩联合声明》。日本在此声明中表示撤销久保

田的发言，但仍坚持不赔偿或少赔偿的立场，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却要求日本赔偿它统治朝鲜期间给朝鲜造成的损失，1960年上台的民主党政权也向日本提出了赔偿要求。另外，双方在捕鱼、旅日朝侨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因此，谈判没有进展。

这种状况在1961年5月朴正熙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有了改变。为了取得日本的经济援助，朴正熙上台不久，双方就举行了第六会谈，同年11月，他在访美途经东京时，同池田首相就“日韩关系”交换了意见。

1962年11月，南朝鲜中央情报部长金钟泌去东京，在“财产请求权”问题上，向日方作了让步。此举遭到南朝鲜学生的激烈反对，在“反对屈辱外交”的口号声中，“日韩会谈”被迫中断。佐藤内阁成立后，为加速“日韩关系正常化”进程，在一周之后便宣布椎名悦三郎外相将于1965年初访问南朝鲜。由于双方都急于寻求突破，接触频繁进行。1965年2月5日，南朝鲜“总理”丁一权访日，与佐藤首相举行会谈。2月17日，椎名外相访问南朝鲜，就历史问题表明“在日韩两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过一段不幸的时期，日本对此感到十分遗憾，并表示深刻的反省”。南朝鲜对日本政府这一表态给予评价。椎名外相访日期间，同朴正熙“总统”等举行多次会谈，朴正熙表示“从大局出发，应抹去不幸的历史，迎接光荣的明天”，使“日韩关系正常化”有了初步的基础条件。

在此基础上，椎名和南朝鲜“外相”李东元一连数日不分昼夜地进行了会谈，在20日椎名离开汉城几小时前，终于草签了《韩日基本关系条约》。会谈中，围绕南朝鲜政权的管辖权范围，是否确认旧条约（韩日合并条约）无效等问题，曾僵持不下，后来，双方就下述两点达成一致：（1）如“联合国决议”所示，“韩国政府”是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2）旧条约无效。

其后，双方就捕鱼问题也达成协议。4月3日，双方就渔业问题、经济合作、在日“韩国人”的法律地位等主要事项草签了协议。

6月26日，李东元“外相”来日，在日本首相官邸同日外相椎名悦三郎正式签署了《日韩基本关系条约》及渔业协定等各种协定。这样，长达14年之久的谈判，几经周折，告一段落，实现“邦交正常化”。

日本同南朝鲜“建交”，引起了日本和朝鲜人民及国际公正舆论的强烈反对。在日本，以社会党、共产党为中心的左派力量强烈谴责此举旨在“否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永远分裂朝鲜”，“拼凑日美韩军事同盟”，掀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使佐藤内阁受到严重冲击。

按日本有关法律规定，内阁与外国签约，须经国会批准，佐藤政府更加面临严峻的考验。在7月22日召开的第四十九届临时国会上，虽决定《日韩基本关系条约》留待第五十届国会审议，但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仍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这次临时国会闭幕后，执政党和在野党以下次国会为目标，厉兵秣马，分别展开了推进批准和反对批准的运动。

执政的自民党起初预定于9月上旬召集第五十届临时国会，但因提出补充预算案和椎名外相出席联大，将会期推迟到10月上旬。9月1日，自民党召开了促进批准日韩条约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展开宣传日韩条约和促进其批准的运动。同月11日，成立了国民运动推进会议和国民运动本部。

为了与在野党寻求妥协，田中干事长于同月22日会见记者，表示“愿意就审议日韩条约问题同各党的干事长、书记长举行会谈，根据需要，也可举

行党魁之间的会谈，以求得各党的合作”，佐藤首相也通过记者表示，要充分审议，愿意同各在野党会谈。

另一方面，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总评”为阻止日韩条约在国会上强行通过，要求它支持的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的国会议员总辞职。社会党中央执委会讨论的结果，提出保留意见，决定与日本共产党联合斗争一天。9月3日，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会见记者，发表了以下谈话：

(1) 要求第五十届国会不以日韩条约为议题；(2) 为克服经济危机，要求举行不超过40天的短期国会，与自民党和政府作斗争；(3) 社会党议员总辞职不是现实的斗争手段。

9月14日，社会党成立了11人委员会，加强阻止批准日韩条约的斗争。24日，社会党拒绝了田中提出的关于执政党与各在野党负责人会谈的建议，主张在议院运营委员会上协商国会运营问题。

接着，社会党中央执委会决定了在临时国会上的斗争方针：

(1) 在国会内外掀起斗争高潮；(2) 阻止国会批准日韩条约；(3) 打倒佐藤内阁；(4) 要求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民社党就“日韩邦交正常化”采取原则上赞成的立场，但该党国会议员意见分歧，有人主张要视国会审议的情况，决定民社党的态度。结果决定由该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和党的副秘书长负责调整党内的意见。

问世不到一年的在野党——公明党，当时只在参议院里占有几个席位。该党虽然对“日韩邦交正常化”采取了基本赞同的态度，但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临时国会上，采取反对批准日韩条约及有关协定的立场，其理由是：

(1) 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分照顾了南朝鲜的立场；(2) 关于条约的解释，日本与南朝鲜之间存有分歧；(3) 南朝鲜国会是以强行通过的方式批准日韩条约的。

当时在众议院里仅有4名议员的日本共产党，不言而喻，当然表示了强烈反对的态度。

在这种形势下，第五十届临时国会于10月5日开幕。政府立即向国会提出日韩条约和有关三项国内法案。佐藤首相当天会见记者，表示要为在本届国会上批准日韩条约等“全力以赴”，态度十分强硬。接着，佐藤邀请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民社党委员长西尾未广、公明党委员长让武寿，在众议院议长“沙龙”会晤，要求他们就日韩条约和有关法案的审议工作给予合作。这次党魁会谈就是田中角荣出的主意，并由他说服了在野党实现的。

这次会谈于上午11时30分开始，只谈了十来分钟。对田中来

说，最大收获是，摸清了在野党对这次国会的基本态度。

自民党同在野党围绕这次国会的会期问题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社会党对自民党操纵国会，强行议决会期为50天，表示强烈不满，拒绝出席协商会议日程的议院运营理事会，致使原定于6日举行的开幕式和政府演说延宕至11日举行，各党代表在众、参两院的质询改在15—17日举行。

临时国会最初的日程结束之后，进入正题，关于日韩条约及有关三项法案的审议方法又成为焦点。结果决定，这个问题将在议院运营理事会上进行正式协商。

身为自民党干事长的田中，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次国会的成败将关系到佐藤政权的命运。为此，在国会开幕之前，就把国会对策委员长和议院运营委员长等人约到家里好几次，商量本次国会的运营方法。其结果，决定在众议

院设置特别委员会，采取一揽子审议日韩条约和有关三项法案的方针。

方针既定，便开始与在野党方面进行交涉。在 18 日举行的议院运营委员会上，决定成立一个由 50 人组成的关于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条约及协定等特别委员会。田中运筹帷幄，起用了党内运营国会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任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和理事，采取了万无一失的体制。

10 月 25 日，特别委员会开始实质性审议。会议伊始，社会党就对日韩条约等程序问题提出异议，要求将条约和有关的法案分开审议和分别通过，而且坚持在问题解决之前拒绝审议。

由于自民党急于求成，特别委员会于 27 日开始审议。经过了 33 个小时的审议之后，11 月 6 日，在未与在野党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就依仗自民党议员占多数席位的优势，强行批准了日韩条约和有关的三项法案。

自民党此举引起了在野党的反对。社会党表示反对召开国会全体会议，反对向国会提出日韩条约及有关三项法案。为此，田中与各在野党的干事长、书记长举行了多次协商，但终未取得一致意见。

这样，众议院议长船田中于 11 月 9 日下午召开众议院全体会议时，社会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接连提出了好几个对有关阁僚的不信任案，并在国会里采取旨在拖延时间的所谓“牛步战术”，抵制国会审议。

田中看势不妙，立即要求船田议长居间斡旋，希望通过朝野党的干事长和书记长的协商，使众议院全体会议正常进行，但没有如愿。

在朝野党尖锐对峙的形势下，众议院全体会议连续举行了 4 天 3 夜，至第四天即 12 日零时 18 分时，议长突然动用其“议事日程变更权”，宣布中止审议对石井法务大臣的不信任案，而开始审议日韩条约及有关三项法案，而且略去了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报告这一程序，在一片混乱中，强行批准日韩条约，通过了有关三项法案。

自民党的“暴举”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在野党的反对，它们拒绝参加 12 日以后的国会审议。国会外对自民党搞突然袭击也表示不满。但田中却不以为然，他后来振振有词地声称，“社会党在众议院采取了脱离常识的行动，妨碍审议，这已经不是议会政治了。日韩邦交正常化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是日本必须解决的课题。我只是尽了执政党（干事长）的责任”。

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后，参议院也如法炮制，在社会党等在野党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于 12 月 11 日强行通过日韩条约。

自民党在被称为“日韩国会”的第五十届临时国会议上的行径，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留下了有争议的记录，田中角荣作为一个政治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不言而喻。毫不奇怪，这时的田中角荣已经成为整个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了。

制定《城市政策大纲》

1966 年 12 月，第一届佐藤内阁改组时，田中辞去了自民党干事长的职务。

当时，自民党、佐藤内阁接连出了好几个问题，以自民党众议员田中彰治因诈骗被捕为开端，连续发生了运输大臣荒船清十郎、农林大臣松野赖三和防卫厅长官上林山荣吉的读职事件。

荒船因利用职权策划特快列车在其选区的车站停车，遭到新闻界和在野

党的抨击，被迫辞去大臣职务。

松野因公访问美国时，把与农村省毫不相干的朋友作为随员；上林山回家乡鹿儿岛时，让一个保释出狱的人乘自卫队的飞机，并动员自卫队的乐队来迎接，都成了大问题。

结果，佐藤首相不得不改组内阁和更换自民党的负责人，并于年底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

田中就是在这次人事更动中辞去干事长职务的。佐藤提拔福田赳夫接替了他。据认为，这种人事安排，正是佐藤善于玩弄权术的典型表现之一。佐藤为谋求其政权的稳定，凌驾于自民党内最有希望接他的班的这两个人之上，使其互相制约，尤其不希望田中的实力急剧膨胀。

田中辞去干事长之后，就任自民党的城市政策调查会会长。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为降低田中的地位而设立的职位。

然而，田中是颇有预见性的。他任职期间曾说，“城市问题将来是日本的大问题”。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年多，获得了很好的学习和研究的机会。他分析城市人口的过密、公害、交通拥挤等问题，制定住宅及交通的长期计划，制定解决城市人口过密和一些地区人口过疏及工业均衡发展政策，汇编成《城市政策大纲》。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田中自著的《日本列岛改造论》的基本设想之所在。

《城市政策大纲》后来得到自民党总务会的承认，成为党的纲领性文件。由于该大纲提出了很新颖的设想和许多政策性建议，一同世就受到党内外的注意，日本数一数二的大报纸《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对大纲给予高度评价。

对付学潮 冲锋陷阵

1968年12月1日，田中荣归自民党干事长之职。这是他第三次担任此职。田中的返职，不外是佐藤感到“党没有田中不行”的缘故。

1968年秋，日本政坛波澜起伏。由于已连任两届总裁、首相的佐藤恋栈，政局围绕佐藤“三选”问题激烈动荡。自民党内的反对派领袖三木武夫和前尾繁三郎亮出批判佐藤政治的旗号，先后出马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佐藤为保住江山，一方面在政治上许诺实行三项基本政策，一方面在组织上周密部署，与其政敌三木、前尾对抗。

竞选期间，田中作为佐藤派的得力干将，为佐藤蝉联总裁和首相废寝忘食，日夜奔忙，在党内积极做争取多数的工作，为佐藤“三选”的胜利立下了头功。这当然也是他在佐藤新班底中再次占据要津的一个原因。

田中荣返干事长之职后，如鱼得水，又大显身手了。

田中上任伊始，就在与社会、民社、公明和共产等四个在野党的干事长、书记长的座谈中，除表示自民党政府今后致力于归还冲绳、消除公害外，还强调要刻不容缓地对付大学生闹学潮等问题。

田中谈及的大学学潮问题，是自民党政府当时面临的突出的内政问题之一。以1968年1月日本的名门学府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罢课为启端的学生斗争，如燎原烈火，迅速蔓延，席卷全国高等院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日本的政治社会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使自民党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

田中作为既存制度的捍卫者和辩护士，自然不能容忍事态的发展，他作为辅佐执政党的总裁和政府首相的“第二把手”，当然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1968年2月25日，田中在自民党总务会上表示，“从最近的大学纷争等情况看，需要研究具体对策，来保卫和平的生活，排除暴力，维持法律秩序。为此，希望同各在野党协商”，表明田中一开始就准备从“排除暴力”的观点来对付学潮。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翌年1月10日，东京大学的学潮再起高潮，学生们占领了学校的礼堂大楼，当局出动武装警察，与学生们发生了激烈冲突，事态的发展引起全国上下的注目。同月20日，东大又取消了入学考试，形势进一步恶化，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急剧高涨。一部分人要求以立法形式改革大学的制度，以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但广大人民群众和学生坚决反对这样做。

鉴于这种情况，田中在2月25日举行的自民党总务会上表示，“要把教育改革的长远措施和谋求目前大学秩序正常化的临时性措施分开考虑”，声称“准备在预算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寻找适当的政治时机，提出临时措施法案”。

社会、公明、共产等三个在野党获悉田中这番讲话后，一齐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自民党政府企图借改革大学制度之名，炮制治安法，对学生进行镇压。但民社党却采取了有别于其他在野党的立场，它反对自民党政府策划的“临时措施法案”，认为这是旨在“对付学生”的，“是错误的”，主张“从大学管理的角度研究立法”，并表示愿为此与自民党方面会谈。

田中看到在野党意见分歧，心中暗喜，于3月10日与民社党干事长佐佐木良作举行了会谈。田中明知这次会谈不会对平息学潮有什么直接的效果，但是他却非常热衷。从4月中旬起，田中又向各在野党多次试探举行佐藤首相与各在野党领袖会谈的可能性，其目的是就制定大学管理法进行协商。

这种“会谈”方式是自民党政府运筹政权的手段之一，也是其传统之一。正如美国基辛格博士所说，“日本人不喜欢搞对抗，因为对抗会产生一连串看得出来的得胜者和失败者。他们对于做那种结果难以预料的事情感到心中不安”。很显然，如果能在国会审议之前与在野党达成一项协议，国会内的阻力就会消除。更重要的是，可以标榜所有政党都参与了制定法律的过程。这样，新法律实施起来也就有了更大的动力。

但是，当“会谈”难以实现或没有成果时，自民党政府依仗其多数议席来实现其目的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由于3月份以来，以大学为中心的学潮规模急剧扩大，且从校内扩展到社会，另一方面，在野党一直采取与政府不合作的态度，佐藤内阁处境十分被动。

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田中利用4月30日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解决当前大学教育问题的措施》方案之机，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了自民党政府的方针。田中表示政府对有关大学的立法采取慎重态度，事前要广泛地听取在野党的意见。为此，要与在野党举行会谈。

经过田中的一番努力，5月9日，佐藤首相与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民社党委员长西村荣一、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分别进行了会谈，强调需要在“必要最小限度”内制定一项临时性法律。政府的这种主张遭到三位在野党领袖的一致反对，会谈不欢而散。

田中并不善罢甘休。他又于13、14、15日先后同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民社党书记长佐佐木良作、社会党书记长江田三郎举行了会谈。在这一系列会谈中，因江田表示“已没有必要再与自民党会谈”，态度十分强硬，田中

被迫放弃了与社会党继续协商的想法，但认为同公明、民社两党仍有协商的余地。

另外，在对付学潮问题上，自民党内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一种强硬的意见认为制定一项临时性法律还不够，要求制定彻底改革大学管理和运营的法律，而政府的方针是，将法案的内容限制在“必要最小限度”内，以避免介入大学的自治，引起新的麻烦。

为了统一党内的意见，身为干事长的田中在政府和自民党之间，一连进行了几个昼夜的调整工作。结果，于5月24日由政府向国会提出了一项《关于大学运营的临时措施法案》（以下简称《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

（1）闹学潮的大学的校长有权设副校长等职务，起辅佐、审议、执行作用；

（2）校长有权决定6个月以内的停课；

（3）文部大臣在学潮持续9个月以上的情况下，有权决定停止该校的教学和科研（关闭学校）；

（4）如关闭学校3个月之后学潮仍不平息，将注销该校；

（5）临时设置大学问题审议会。

该法案提出后，引起在野党的一致反对，各大学也掀起了反对的浪潮。可是，自民党在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进行了长达37个小时的审议之后，于7月24日不顾在野党的抵制，进行了强行表决。

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在野党方面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不信任议长和文部大臣等人的动议，并采取“牛步战术”，抵制审议。而且，国会一连开了5天4夜，创造了议会史上的新记录。

《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提交参议院审议时，会期临近结束，在野党强烈抵制审议。为收拾事态，参议院议长重宗于8月1日通知在野党说，《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留待下届国会继续审议。但田中坚持要在本届国会通过。为此，他向重宗议长一再施加压力，要求重宗在本届国会上通过该法案。

田中对重宗说：“既然在野党企图拖延议事，自民党就可以提出要求限制发言时间和投票时间的动议以及优先审议大学法案的动议，以促成参议院对大学法案的审议。如果采取这个办法，大学法案还是可能在本届国会通过的。”

关于国会的运营，田中向报界表示，“如果本届国会不通过大学法案，那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自民党的方针是要在本届国会通过，佐藤首相的意见也如此。……留待以后审议是下策”，并声称，“如果在野党在国会里进行技术性的对抗，也许不得不动用警察，这是为了维持国会内的秩序”。

2日晨，当《健康保险法》修正案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过5天4夜的审议通过后，田中向自民党议员鞠躬致敬，要求他们继续作战。他说：“大家可能已很疲劳，但尚未通过的大学法案事关自民党的命运，这是解决70年代问题的关键。因此，务请各位尽最大的努力，通过这项法案。”

自民党于当天下午6时22分强行召开文教委员会，在说明《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的提案理由之后，不允许质疑，就强行通过了该法案，并决定于翌日（星期日）指使重宗议长行使其“议长职权”，召集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大学法案，在会期结束之前，使该法通过。

自民党作出上述决定之后，与在野党进行了非正式的协商，但并没有谈拢。

另一方面，重宗议长因担心开会强行通过大学法案会引起严重后果，并摸不透佐藤首相的真意，犹豫不决。

于是，演出了一场田中逼使重宗按电铃召集全体会议的精彩戏剧：

事情发生在8月3日下午5时。因迟迟不见开会的动静，田中急不可耐，奔出他在国会的办公室，跑进重宗议长办公室，怒气冲冲地喊道：“喂，老头儿，怎么还不按铃？！快按！”

重宗沉稳地说：“阿角，你别急，老头子的意思是不要硬干吧？你跟老头子商量过吗？”

田中更不耐烦了，摆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重宗教训了一顿：“你说些什么呀，老头儿。你们这些人的孩子已全部长大成人了，所以才优哉游哉的。可是，全日本的学生家长怎么办呢？他们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学，而学校却变成了武斗场，老师无法讲课，想念书的学生也不能参加入学考试。学生不好好上课，能毕业吗？能就业吗？学潮搞得大家都紧张，胆小的学生想上学而不敢上，只好蹲在宿舍里。老头儿，给我赶快按铃！你不按，我可不答应！”

重宗听后，边说“阿角，你少罗嗦”，边拿起话筒与内阁官房长官保利茂通话：“保利，阿角硬要叫我召集全体会议……”

在田中等自民党政府首脑的压力下，重宗议长终于在当晚7时许，召集了参议院全体会议。

会议一开始，朝野党之间就展开了较量。在野党提出对安并谦副议长的不信任案。自民党则按预谋的步骤，提出了限制发言时间的动议。当就该动议举行记名投票时，由于会场发生混乱，全体会议一度休会。

当晚8时6分复会时，重宗议长以会场秩序混乱为由，根据国会法第十九条，行使议长的“议事整理权”，突然宣布改变会议日程，一举宣布以《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为议题，并立即付诸表决，于8时8分，便以起立表决方式通过了该法案，其手法与四年前众议院强行通过日韩条约同出一辙。

《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的强行通过，不仅遭到在野党的激烈谴责，而且受到大学方面的反对。东京大学总长加藤一郎异乎寻常地发表一项声明，指出“这是十足的暴举，有使大学学潮的解决变得越来越困难之虞……”日本各大报也纷纷发表社论进行谴责。田中则公开辩解说：“自民党内外都有人主张提出一个严厉的规定大学管理办法的法案，但这次通过的法律只规定了政府为解决学潮必须采取的最小限度的措施。虽然该法中没有罚规，都是一纸政令就可解决的内容，但政府和自民党认为，有责任以法律议决的形式，表明在国民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谋求解决学潮问题。该法案的通过是不得已的。”

“这项立法并非出于一部分人所担心的那种动机，而是考虑到如果明年4月不能进行入学考试，就要注销一部分大学。政府不能坐等事态自然解决，必须唤起大学当局和学生的觉悟和奋起，创造一个学习的环境。自民党并没有控制教育的想法。”

“关于参议院的议事方式似有种种议论，但为了维护议会民主，只能那

样做。未动用警察就维护了议会民主，我想这不会遭到非难……”

“ 腊月选举 ” 建奇功

第六十一届国会 1969 年 8 月 5 日闭幕。这次被称为“ 异常国会 ” 的国会，虽在自民党政府的操纵下，强行通过了《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和《健康保险法》等重要法案，但由于在野党的激烈反对，约有 50 项法案流产。自民党政府提交本次国会审议的法案仅有 55.75% 获得通过，在战后历次通常国会中，成绩最为不佳。

田中鉴于这种情况，在国会闭幕的当天，作为自民党干事长，发表了引人注目的谈话。他声称，“ 当国会不能决定具体方针和政策，国会机能不能发挥时，议会政治的危机就要产生。我们为了解决大学学潮和充实国民的福利，根据多数表决的原则，采取了以其行动与实绩问信于国民的道路 ”，表明在强行通过大学法案等问题上，要通过国会选举，让国民做出判断。

11 月 29 日，佐藤首相召集第六十二届临时国会，宣布解散众议院。大选定于 12 月 7 日发布公告，同月 27 日进行投票。新闻界因此称其为“ 腊月选举 ”。

为了争取大选的胜利，田中在政策上大做文章。他强调：面向 70 年代的日本，应当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作为选举公约，自民党发表了稳定物价、减税等十大政纲。

“ 结束美国对冲绳的占领状态，实现国民要求归还冲绳的愿望 ”，是田中和他的自民党在这次竞选期间最得意的宣传材料。由于佐藤首相在第六十一届国会之后访美，同尼克松总统会谈，并发表了包括美国于 1972 年把冲绳归还日本等内容的联合声明，自民党对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增强了信心。

12 月 27 日，投票日到了。这一天，全国各地都是阴沉沉的天气，寒气袭人。加上新年临近，正是人们回乡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投票率只有 68.51%，在战后历次选举中，是较低的一次。可是，开票当天，自民党捷报频传，贴在自民党本部大楼四楼走廊上的全部候选人名单，几乎个个都插上了象征当选的红蔷薇花。

众议院解散时，各党派所占的席位是：

自民党 272

社会党 134

民社党 31

公明党 25

共产党 4

无所属 3

缺员 17

这次选举结果：

自民党 288

社会党 90

公明党 47

第六十一届国会中，自民党单独进行的表决，在众议院多达 15 次，在参议院 5 次；在众议院举行了 4 次通宵达旦的全体会议，参议院召开了 3 次。因此舆论界揶揄这届国会是“ 异常国会 ”。

民社党 31

共产党 14

无所属 16

其后，由于 15 名无所属议员申请加入自民党，并立即得到干事长田中的批准，自民党总议席突破 300 大关，达 303 席。这是自 1932 年 2 月大选（第十八次）中政友会获得 303 席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自民党获得如此大胜，超乎田中之预料，他和佐藤总裁、首相并肩而立，脸色红润，喜不自胜。

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在这次大选中，减少 44 席，仅占 90 席，尚不到自民党的 1/3，只好发表声明，承认遭到“惨败”。

选举揭晓后，田中得意洋洋地对电视记者说，“我们作为执政党，在大学法和健康保险法等法案上都失败了，这是国民所知道的。但是，收回冲绳是国民的回答”，“没想到自民党的政策会赢得如此众多选民的支持……越发感到我党的责任”。

12 月 28 日，田中代表自民党，就大选结果发表了如下声明：“在这次决定日本 70 年代方向的大选中，自民党赢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这是国民对我党战后长期执政实绩的评价和我党今后政策和态度的信任。我党要铭记自己的重大责任，为建设新日本竭尽全力。”

关于这次“腊月选举”中自民党获胜的原因，国内舆论认为这是由于自民党政府“在归还冲绳等问题上，与美交涉取得了成功”，“归还冲绳满足了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当然也有人认为，这表明了国民对自民党平息学潮的“评价和支持”，《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的成立，使学生家长“消除了不安”。

不管怎样说，自民党在“腊月选举”中的胜利，大大加强了田中在自民党的地位，为他日后问鼎总裁、首相宝座奠定了更为牢靠的基础。这不只是因为他的智慧、魄力和组织能力经受住了考验，更重要的是因为田中有效地利用了这次大选的机会。他运用干事长的权力，施展手腕，在党内培植亲信，为其日后的崛起打下了有力的组织基础。

还应看到，这次大选的结果，大大加强了自民党政权的统治地位，至少对日本 70 年代前半期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内政上，自民党以其政策受到国民信任为理由，做法上更大胆了。

选举结果加强了佐藤首相的地位。大选一揭晓，政界和财界就有人认为佐藤可能还会第四次连任总裁、首相，并表示支持，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自民党在争夺总裁、首相选举上的内耗，能继续强有力地推行保守政治的战略。

续坐重镇

大选过后，佐藤荣作调整自民党领导班子和改组内阁。田中角荣的去留成了党内各派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起用谁当干事长，关系到佐藤荣作之后谁来接班。党内围绕这个职务的人事安排，发生了争执。

大选刚揭晓时，自民党内觊觎下届总裁、首相宝座的福田赳夫一派认为，“自民党在大选中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要求更迭干事长，可就不大有理由了”。可是，没几日，党内空气就发生了不利于田中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大选的胜利应归功于使归还冲绳谈判获得成功的佐藤首相，主张趁着自民党获得 300 多议席的大好机会，更换干事长，以使佐藤体制面貌一新。

不少人认为应起用内阁官房长官保利茂担任干事长。

正值党内议论纷纷之际，佐藤首相又对记者说：“大选的胜利是大家赴汤蹈火的结果，不存在给谁论功行赏的问题。”人们听了这番话之后，更认为田中的干事长之职要被保利茂取代了。

但佐藤大选取胜之后，对继续掌政增强了信心，心中盘算着任期届满后，如何第四次连选连任的问题。他又想到眼前棘手的课题堆积如山，需要田中继续在关键岗位上发挥作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决定田中留任。

在佐藤的授意下，自民党内经过调整，于1月12日特别国会召开之前，正式作出了田中留任的决定。这样，田中第四次担任了自民党的干事长职务。1970年10月29日，佐藤第四次当选总裁，田中继续留任自民党干事长职务，直到1971年7月5日佐藤重组班底时改任通产大臣为止。

延长安保条约显手腕

1964年11月9日至1972年7月6日，佐藤连续执政7年8个月，创造了战后执政的最长记录。

佐藤政权之所以能渡过一道道难关，成为战后最长的政权，固然有诸多客观因素，但自民党内外部认为田中干事长为佐藤政权“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在解决许多棘手的内政外交难题的过程中，田中都发挥了作用。

例如，田中协助佐藤处理日美安保条约的延长问题，就是一例。延长日美安保条约是佐藤执政期间曾经面临的重要而敏感的国政问题之一。1960年，岸信介因强行修改安保条约，遭到国会内外的强烈反对，被迫下台。随着这个为期10年的新安保条约临近期满，各种政治力量又对条约的延长与否展开激烈辩论，社会党等在野党酝酿在国会内外掀起一场“70年代反安保斗争”风暴。因此，如果佐藤政权处理此问题策略失误，将难免危及其生命。

自民党内，比较占上风的想法是，条约期满后，再固定延长10年。佐藤和田中却认为，如果建议国会“固定延长”，势必引起严重混乱，决定采取“自动延长”方式，把日美安保条约一直延续下去。为此，田中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在设法调整党内意见的同时，大力组织开展了社会宣传运动。

经过田中的努力，自民党统一了意见，于1969年10月14日，作为党的决议，决定了“自动延长”的方针。在此基础上，1970年6月22日，佐藤召集临时内阁会议，作出了“自动延长”的决定。

由于采取“自动延长”的形式，无须经国会审议通过，这就使在野党等失去了掀起大规模反对运动的靶子。佐藤政权渡过了“70年代危机”，从而为佐藤扫清了通向第四次连选连任总裁、首相的道路。对田中来说，也为他日后掌权赢得了重要的一分。

田中在处理“自动延长”日美安保条约过程中，又一次显露了他的政治手腕，也表现了他长期坚持日美安全体制的政策主张。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他在60年代末一次答记者问的内容，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记者：自民党采取了“自动延长”日美安保条约的态度。自民党的决议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要继续坚持安保条约。虽然形式上是以一年为单位的“自动延长”，但实际上又可理解为“长期坚持”，请问，侧重点究竟在哪里？

田中：关于条约的期限问题，有不规定有效期限和规定长期有效两种。

现行的日美安保条约的有效期为 10 年，是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半吊子”。明年 6 月 23 日以后，只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就可以把它废除。所以，条约的形态确实发生了变化。

记者：以“自动继续”的形式加以延长，不就使该条约有可能废除吗？

田中：废除它要有前提，即找到代替它的东西，或者建立自己保卫自己的“自主防卫”体系，或者通过联合国参加集体安全保障体系。日本不搞不设防的中立。关于“自主防卫”，是从精神方面说的，自民党现在并不想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来达到这个目标，而是始终坚持在集体安全保障中来搞，如同每个人都雇保镖最安全，但因花钱太多，才产生了警察制度一样。这个道理国民是会充分理解的。

日本如果只搞“自主防卫”，军费就要占财政支出的 50—60%，这是办不到的，况且，国民因有战前的经验，也不会同意这样做。再说，还有宪法第九条的制约，现在，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也搞的是集体安全保障吗？

记者：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现在的日美安保条约可以不要呢？

田中：必须在苏联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后；越南战争结束了，柏林墙也拆除了。所以，不能把重点放到“终止”或“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上。（加重语气说）即使通过联合国搞了集体安全保障体系，但如果中东上空炮火连天，联合国并不能有效制止，那也不行。记者：这就是自民党“长期坚持”的真正意图吗？

田中：是的。

记者：那么，所谓“相当长的时期”，具体地说，准备延长多少年？田中：这很难说。按联合国的电脑测算，“到本世纪末，东西问题将不存在了，南北问题也解决了。届时，人类最大的问题，将是没法保证水和主食的需求”。

记者：这么说来，日美安保条约的“自动延长”，虽从形式上看讲得很和缓，实际上却变成“长期坚持”了。

田中：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当然应该如此。而且，这是以宪法第九条作为大前提的。记者：是否意味着日本的安全主要是依靠日美安保条约的战争抑制力量，而不是靠“自主防卫”？

田中：完全如此。日本进口大宗原材料，商船都是靠美国第九舰队保护的。当发生纠纷时，日本本身只能进行外交交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记者：但是，自民党内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到 70 年代中期，应该把日美安保条约变成友好条约一类的东西”。

田中：自民党是个跨度很大的国民政党……（笑）但是，要那样做，就得有个前提，即把军费增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左右。

记者：一方面决定“自动延长”，一方面又说“长期坚持”，这不自相矛盾吗？

田中：从概念上说，也许是矛盾的。但是，我们是讲现实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过于现实了，但我们是执政党，必须采取现实的政策。如果是在野党，那就另当别论了。

记者：如果国际局势的缓和比预料的快，该怎么办呢？对日美安保条约

日本战后新宪法第九条为“放弃战争”条款，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希望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权发动的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实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的态度也要相应变化吧？

田中：紧张局势可能逐渐走向缓和。首先，我可以断定，只要核武器在发展，就不会发生毁灭全世界 35 亿人的全面大战，但局部战争是会有有的，那是因为局部战争是在东西方的接点发生的……从趋势看，我认为面向 21 世纪，局部战争会走向解决，但还看不到今后 5 年、10 年或 15 年的短时间内就天下太平的前景。

记者：那么，是不是说安保条约要坚持 15 年以上？

田中：也许如此。但随着我国经济力量的迅速增强，搞“自主防卫”的想法也会强烈。到 1985 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可达 200 万亿日元，人均收入将超过 3000 美元，正好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

记者：既然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坚持安保条约，为何起初不采取“固定延长”方式？

田中：这是双方的事情……也有自己家里的情况。

记者：如果搞“自主防卫”，是否会导致修改宪法？

田中：修不修改宪法……说到 15 年之后，我们还会活在世上，这是我们的巨大责任。

记者：那时还会是自民党掌权吗？

田中：当然（充满自信）。

记者：如在野党掌权，安保条约的“自动延长”会怎样？

田中：绝对掌不了权。主张废除安保条约的是社会、共产两党，而以这两个党为中心的政权是绝不可能出现的。至于民社、公明两个党，不管它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它们在安保问题上的主张，是与自民党接近的。

记者：可是，民社、公明两党说要“分阶段地取消”安保条约……

田中：现在它们是在野党，才那么说，一旦成了执政党，还能对国会那么说吗？在安保问题上，它们还会延长的。国民接受安保条约，自民党政权会一直继续下去的。

在 20 多年后的今天，重读田中上述讲话，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田中作为一位保守政治家对形势演变的洞察力和政治方向感。

从 1970 年 6 月 23 日日美安保条约自动延长至今，其间，尽管日美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国的政府也都更迭多次，但双方出自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各自的需要，均没有对安保条约的延续提出异议，而且，目前也看不到在最近的将来“废除”或“终止”该条约的前景。

据日本新闻媒介进行的民意测验，将近 80% 的日本人，鉴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已对日美安保条约表示支持。公明、民社两党也调整了对安保的政策，转而采取肯定的态度，赞成日本在日美安保体制中管理国家。

实际上，自安保条约 70 年代自动延长后，日本和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体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尤其是中曾根康弘执政后，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显著加强，双方签署了保卫 1000 海里航线的联合作战计划，两国陆海空三军联合实兵演习频繁，日本全额负担驻日美军劳务费，日本参加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研究，等等。情况表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结构正处于变化之中。

美国 1970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1.0155 万亿美元，人均收入为 4523 美元。日本 1985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1.3494 万亿美元，人均收入为 8837 美元，两项指标都超过了美国 1970 年的水平。

《读卖新闻》，1969 年 10 月 10 日早刊。

人们今后还会看到，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将适应美国的要求，分担更多的责任。

1987 年度日本《防卫白皮书》强调，在当前美苏全球军事对峙的形势下，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确保了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只有加强日美同盟体制，利用美国巨大的遏制力量，才是日本应走的“最妥善的道路”；强调日本今后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同美国的合作关系，提高日美安保条约的可靠性，以确保日本的安全。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要坚持日美安保条约的。

另一方面，也正如田中 20 多年前所预言的那样，日本随着其国力的迅速增强，在强调与美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增强“自主防卫”能力。为此，日本放弃了 1976 年制定的军费政策，军费预算突破了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 1% 的限额，加速扩军步伐；日军作战指导思想在“专守防卫”的基础上，增加了“海上击破”的内容，把 90 年代具备“保卫 1000 海里海上航线”能力，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近几年来，日军为加强海上防空、反潜、海峡控制、港口防御、本土防空、海上狙击及陆上战斗能力，不断地扩充和更新装备，加紧演练，改革体制。一些动向表明，日本加速了走向常规军事大国的步伐，日本正向具有威慑力和实战力的现代化军队发展。不少人据此认为，日本正在改变战后一直奉行的“重经济、轻军备”的政策轨道，也认为现今的做法与田中的政策思想有着微妙的差别。

瞄准宝座

支持佐藤政权的同时，觊觎着首相的宝座，为在未来的角逐中取胜，他竭力树立太政治家的形象。

阐发日本“前进之路”

1970年10月29日，佐藤荣作第四次当选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在佐藤的新班底中，继续担任干事长。

这次总裁选举后，自民党内的派系地图又发生了一次变化。本来最有希望取代佐藤的前尾繁三郎，在关键时刻放弃了出马竞选的念头，总裁选举后，未能入阁，这使他作为前尾派领袖的地位发生动摇。不久，大平正芳取代前尾繁三郎，前尾派改换门庭，成了大平派。另一个变化是，在党内颇有影响的川岛正次郎副总裁溘然长逝。党内豪雄三木武夫率领的三木派依然是个小派别，而中曾根作为另一个小派系领袖的地位也很脆弱。这样，佐藤总裁和首相的接班人，自然就集中在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身上。

这时的田中，更清楚地意识到他未来的政治敌手。田中在支持佐藤政权的同时，觊觎着佐藤的宝座。为了在未来的角逐中取胜，在组织上，田中积极创造变佐藤派为田中派的条件，争取佐藤把佐藤派的一伙人马的帅权交给他；同时，积极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树立起大政治家的形象。

当时的田中，作为执政党资深政治家，已经形成一套政策思想，对日本的发展方向亦成竹在胸。田中在与法国《世界报》记者罗庇尔·盖兰的谈话中，就日本在国际上应负的责任、修改宪法和经济发展等重要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堪称田中为争夺佐藤后政权的一篇政策宣言，受到国内外广泛的注目，也成为人们后来研究田中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不可或缺的资料。这篇题为《日本的前进道路》的对话，全文如下：

盖兰：日本将来也许会失去世界第三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可能有新的大国崛起。一体化的欧洲，重新并合的东西德国，都有可能成为大国。但我坚信，即便如此，日本仍将保持其大国之一的地位。重要的不是占第几位，而是在处于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中占一席之地。将来，日本仍将继续处于这个地位。

田中：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并不认为日本是个大国。因此，并没有大国意识，日本因第二次大战，变成了穷国，现在，总算达到了一般水平。国民中间，尚有许多不满，所以，在国内，还必须继续增加国民收入。我的想法是，今后15年间，要使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始终保持10%左右。经济企画厅的计划也是如此。这样搞下去，到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就会翻两番，由现在的75万亿日元，增至300万亿日元。在这种经济状况下，日本愿意在对外事务中，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第二世界银行等机构，对世界和平作出相应的贡献。

日本作为大国的基础，还没有国外说的那么牢固，还存在着中小企业、零散企业这样一些特殊难题。再说，日本必须进口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但却没有为此而同别国保持特殊的关系。英国、法国虽已失去了殖民地，但仍同那些国家保持着特殊关系。另外，城市问题、公害问题，也都是难题。日本丝毫没有参与大国竞争的意思。盖兰：听了田中先生的话，很高兴。您

的谦逊诚实的态度，对新日本来说是可贵的。但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人们都认为日本是个大国。因此，应该当仁不让，发挥大国的作用。

我认为，这个世界将来仍然是经济与贸易的世界。因此，日本今后很可能成为世界的新型政治——重视贸易、经济关系、和平——的政治领袖。

如果像过去那样，以战争的力量作为大国的标准，这个地球就难免有一天在战火中毁灭。……顺便提一下“经济动物”这个词，这个词是巴基斯坦的政治家首先使用的，日本报纸上常常使用它。

田中：日本人并不觉得自己是“经济动物”。但是，如果有人针对日本在国外的活动，提出这种批评，我想做两点解释：（1）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倾家荡产，必须拼命地去干；（2）日本本身没有原材料，必须跟拥有原材料的国家一起，在同一自由市场上，进行经济活动。

日本丝毫没有通过发展军备在东西方问题上作贡献的想法。在南北问题上，日本愿意承担相应的、合理的责任。这是政治的基本理念。听了盖兰先生的话，我明白了，“经济动物”一词原来是日本的新闻用词。日本的一些学者和记者往往喜欢自嘲，我听了真实情况后，放心了（笑）。盖兰：关于日本的国际关系问题，我想，对日本来说，最大的问题，大概可以说是，在征得美国同意的情况下，摆脱美国的影响吧。譬如，日本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时，如果逆着美国的意志行事，可能会引起许多麻烦，而征得美国的同意，就好办得多。

关于将来日本的和平问题，应该是日本与苏、中、美三大国都保持同样的友好关系，并让这三国对日本的和平作出保证，而日本本身不应该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我希望日本将来成为这样的国家。欲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仍然不能与美国的意志相悖，或与美国敌对。

对日本来说，应该让美国明白其亚洲政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为此，应该给它上一课。美国参与亚洲事务时，有时显得极为幼稚和缺乏常识。它们在亚洲经历了多次失败。日本虽也失败过多次，但现已从中汲取了许多教训。因此，日本可以帮助美国改正错误，使其理解亚洲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认为，美国国内存在着倾听日本忠告的气氛。因此，其结果也许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即从现在美国在日本的协助下形成亚洲政策，变成将来日本在美国的协助下形成亚洲政策。

田中：日本同美国之间没有令人不安的因素，这是因为日本没有军备。由于日本丝毫没有以军事力量来对抗美国的想法，日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会继续下去。

因苏联已与铁幕时代不同，日苏之间也可以友好相处。苏联与中国大陆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日本对华政策倒好办，可现在它们的关系坏了，如日本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就会表示反对。

盖兰：关于亚洲政策问题，刚才我说以日本为主体，在美国的协助下加以推进为好。现在我还要补充一句，即不能因此而形成日美两国统治亚洲的局面，否则是很危险的。日本在调整对美政策的同时，应实行多边的亚洲政策，包括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在内。田中：日本与中国是邻国，有1000多年的交往。虽不是同一人种，但非常相似，可谓兄弟之邦。在战后已经历了1/4世纪的今天，日中两国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仍然有着友好关系。我相信，将来一定能实现完全的友好。但是，中国问题也有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问题，单从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来看，也非轻易解决的。当然，如果

连同东西德问题、南北朝鲜以及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等世界上的分裂国家问题一并考虑，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

老实说，与东西德问题相比，中国和台湾的关系问题难度更大。这种困难基因于东方人所具有的特性。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多么困难的问题也都解决了。人们都说战后日本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外交上，日本现在正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努力争取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基本。

盖兰：关于日本重整军备问题，田中先生有何考虑？外国听到中曾根防卫厅长官发表“第四次防卫力量整備计划”的消息，十分担心。我身在日本，感到日本人对日本重新武装的抵触情绪正在淡薄。

前几天，我在浅草一带，看到一座建筑物的橱窗里摆设着海军和空军的大幅照片。我想，这不会是政府搞的宣传，但对外国人来说，看到这个场面，确实是个刺激。虽然人们并不认为日本已具有军事野心，但新形式的军队一旦出现，新的军人会在日本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这样，日本的发展方向就会完全不同了。

田中：现在的日本国宪法已经生效 25 年了。这个新宪法是在（美国）占领下诞生的，并不理想。但是，它已被日本人接受。今后即使有修改，但规定放弃战争的第九条是不会修改的。这是由于日本曾经受过原子弹的洗礼。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将是一场核战争，意味着全世界 35 亿人的毁灭，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将坚持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想法。

日本自卫队始终是防御性的，完全是从自卫的立场出发，来对付外来的武力进攻和间接侵略，保卫国家。另一方面，如果联合国想建立一个解决阿拉伯和以色列争端之类的国际警察机构，日本愿意大力协助。

所以，日本确实没有修改宪法、建立军队、派遣联合舰队、在世界上搞名堂的想法。你在浅草看到的海空军照片，是为了与美国到处泛滥的裸体照片唱对台戏，与军国主义毫不相干。

盖兰：新闻记者对一个国家的将来进行预测是不足为据的。但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一句，我对日本的未来，是既悲观又乐观。

之所以悲观，是因为我看到，迅速的现代化正在使日本遭到破坏。最近，公害问题提出来了。我想，这个问题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我最担心的是，自然的破坏，是日本美丽的国土因无计划的、野蛮的现代化而遭到破坏。但是，通过加强计划性和运用政府的权力，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划定一些地区，不准在其内建工厂，搞现代化。只有积极地实行这种划定地区的政策，才能使自然受到保护。应该改变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所欲为的状态。

另一点是担心日本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例如，古都京都和奈良因为搞现代化正在受到破坏。长此下去，到本世纪末，来日本观光的客人，恐怕只能看到丑陋的大工厂群。虽说那是现代化，但未免大煞风景。

下面，我想谈谈乐观的理由。现在日本人已经及时地发现了公害问题，并开始着力解决。还有，日本人中间已经产生了反对一味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而不重视提高生活水平的情绪……现在有些人自发地掀起运动，尽管他们是少数人，但表示了对政府的反对。法国哲学家有一句名言：“市民应该是反对政府的。”所以，我认为，市民发起的消费者运动和消除公害运动

等，对发展日本的民主是可喜的现象。

田中：我出生在盖兰先生撰写的《第三大国——日本》中一个背阴而偏僻的角落新渴，是个命运不济之人。因此，我想必须创造一个改变命运的时代。为此，就必须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国民收入。我正在考虑制定 1971—1975 年、1976—1980 年、1981—1985 年的 3 个五年计划。我的想法是，摒弃以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为中心的想法，在新的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的基础上，对水资源、青壮劳力、公害等问题，统盘加以解决。15 年后，现在杂草丛生的、日本典型的低发展地区，将成为某种规模的工业地带考虑到我不一定活到 30 年以后，所以，我考虑了今后 15 年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已有具体的政策，不是让国家多掏钱，而是以税制为中心去搞，这样就不会很困难。

田中的这篇“政策宣言”既阐明了他的国内政策，又阐明了他的对外政策，为其后来掌政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为进一步了解田中的政策思想，再引述一些他在 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前期的政策性言论，作为补充。

田中是一个对国际形势反应非常敏感的政治家，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就认为世界已由两极进入“多极”，从“冷战时代”过渡到“通过对话缓和紧张局势”的新时代。

1969 年 4 月田中在《政策月报》著文称：“国际政治现状是世界到处有动乱和局部战争不绝”，“只要注视这种国际形势，便可以看到，世界趋势虽然正在从过去的冷战时代向和平共处时代过渡，但其速度非常缓慢。……力量均衡才是世界政治的现实”。

1972 年 6 月 21 日，田中在其竞选自民党总裁声明中说：“世界进入了新时代。从通过力量的均衡确保和平，到通过对话缓和紧张。东西方关系逐渐走向改善。世界的新问题之一是南北问题。”

1972 年 6 月 27 日自民党机关报《自由新报》发表田中如下谈话：“国际政治已经进入多极化的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新展开，表明战后东西方的对立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新时代的帷幔正在揭开。在所有的地方，都要求对战后的秩序和制度加以革新，而新的秩序还远远处于摸索阶段。整个世界处于过渡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能掌握好航向，世界和日本在 20 世纪最后 30 年里，能够创造出国际协调和生活向上的新记录”。

基于对国际形势的上述判断和对日本国情的认识，田中认为，日本应适应世界潮流，推行“和平外交”。

1969 年 4 月，田中在《政策月报》就和平外交的内容谈到以下四点：

“（1）以邻近各国为中心，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2）维护和促进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3）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机能，促进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裁军；（4）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同日本安全有密切关系的远东及南亚各国，应给予积极的经济援助。”

1972 年 6 月 23 日，田中发表了《十大基本政策》，更系统地概括了他的和平外交思想。他明确强调，“要把日本的命运寄托在世界的和平之上：

（1）世界的潮流正向着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方向发展，日本的建国基础，要全面地寄托于下述两点上，即同世界各国友好下去，一切国家和平共处。

（2）我国不应追求军事大国的道路，而要把宪法第九条作为对外政策的

基础。

(3) 日本将来也不应持有核武器，要贯彻无核三原则。日本要进一步站在销毁灭绝人类的武器的前列。

(4) 自卫队是守卫日本列岛的队伍，将来也不实行征兵制和向海外派兵。

(5) 坚持日美亲善的基调，在自主平等的基础上，努力增进友好关系。继续维持日美安保条约。

(6) 迅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使日中两国国民建立永恒的友谊，对亚洲及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7) 对占世界人口 2 / 3 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为消除其贫困和实现经济自主与政治稳定，(日本)应从各方面予以协助。

(8) 推进日苏之间的睦邻友好，扩大经济合作，努力解决北方领土问题。

(9) 同友邦国家共同努力，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及促进南北的和平统一。

(10) 为使日本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扩大发展发挥作用，要主动地适应公正而合理的国际分工的变化，国内产业要进行必要的调整。”

接着，田中又于 1972 年 6 月 26 日在《自由新报》发表谈话称：“我们必须适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开辟日本新的进程。”“今后，日本的进程，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外搞和平，对内搞福利’。对外要坚持战后 27 年来一贯推行的和平国家的方针，在与国际社会谋求协调与和谐中，寻求发展的道路。”

与此同时，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田中作为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言人，强调日本在世界事务中“负起责任”，争取大国地位。

1972 年 6 月 27 日《自由新报》刊载的田中谈话录中，有这么两段话：

“在国际社会中，日本同美国、欧洲并驾齐驱，构成了强有力的一角。”

“已经拥有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力量的日本，不能像过去那样，在国际社会中站在被动的地位上生存。为建立和平共处与国际协调的新秩序，我们必须同其他一切国家一道，作为负责的创造者，积极地参与这一工作。我认为，日本能作出多大贡献，将决定今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

关于日本重整军备问题，田中还发表过几次引人注目的谈话。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1969 年 9 月田中表示：“有人说，因为不会发生战争，所以不需要军队，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世界上 130 多个国家都有军队，在这样的时候，唯独日本可以不要军队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1969 年 11 月，田中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声称：“自己负起责任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合理性、效果等方面来看，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这是 20 世纪末的人的智慧。重要的是要有这样的气概：保卫自己的还是自己。”

1972 年 6 月 11 日，即田中出任首相前夕，田中在自民党众议员田川诚一的著作《松村谦三与中国》出版纪念会上，发表讲话称：“日本不认为持有它（指核武器）有意义。……日本有如此大的经济力量，如此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要造，马上就可以造。但，日本不造。该做的事做，不该做的事不做。”

田中上台之初，1972 年 7 月 19 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谈到核武器问题。他说：“我是主张不使用核武器的。如果使用了核武器，就不是哪个

国家遭到损失的问题，而是有人类毁灭的危险……日本是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唯一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我完全拒绝使用核武器……正因为如此，我们制定了无核三原则，即不制造核武器，不持有核武器，不运进核武器。这是政府的想法，而且在国会上也得到了批准，变成国会的决议，就是表明决不改变。”

联系起来看，在军备问题上，田中主张长期保持日美安保条约，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同时开始鼓吹建立“自主防卫”体系，朝自己保卫自己的方向迈进。

在经济政策上，从田中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一系列言论可以看出，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思想已经形成。有关具体内容，将在本书后面作详细评述。

辞去干事长职务

进入 1971 年，佐藤政权的“末期症状”已经显露。物价问题、公害问题、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和农村的荒废等问题日益严重，人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自民党在统一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通常选举中，均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田中身为自民党干事长感到自己的责任，参议院选举一揭晓，便向佐藤呈递了辞职书。佐藤为了“刷新人心”，接受了田中的辞呈。这样，田中便离开了他前后担任 5 届、为期 4 年 1 个月的干事长职位。

田中在 1969 年底的大选中，作为自民党参加竞选的总指挥，曾一举使自民党夺得 303 个议席。正因为如此，自民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的失利，对他是一个打击。

“如果不提出辞职，难免受到党内的批评，这样，以后的工作就难做了。”田中想到这里，便下定了辞职的决心。

至于佐藤首相接受田中辞职的原因，据有“日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之称的伊藤昌哉分析，这是“佐藤有意识地让田中远离政权”，为福田赳夫日后接班铺路。

艰难使命

出任通产大臣三个月就解决了困扰政府三年的难题，为日后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赢得了一分。

出任通产大臣

1971年7月5日，佐藤首相在更换自民党“三巨头”的同时，改组了内阁。辞去自民党干事长职务的田中角荣接受佐藤的恳请，接替宫泽喜一，入阁当了通商产业大臣（即通产相）。此时，日美纺织品摩擦闹得正烈。

佐藤任命田中为通产大臣时，说“纺织品问题就交给你了”，指示他全力以赴解决。佐藤的意向是，在预定于9月份召开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之前，要设法找到解决办法。佐藤深知田中的谈判本领，指望他解决这个在宫泽任期内未能解决的棘手问题。

田中觉得这是个挑战，同时也是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因此，他一走马上任，就把通产省的有关负责干部召集起来，提出纺织品问题的谈判是通产省当前工作的重点。

此后，田中开始“学习”，他请其下属详细介绍了迄今的纺织品问题谈判的经过、美方主张、日方主张以及日美两国有关行业的情况。

7月14日，刚刚就任通产大臣10天的田中与尼克松总统特使肯尼迪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田中直感到，纺织品问题靠现今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日本必须作出让步。

会谈之后，田中对通产省的有关干部说：“纺织品问题只要求合理解决，看来是不行的。老办法不行，就要下决心从高处跳下来。当然，即使采取措施限制纺织品的输出，也应该坚持最低限度的要求，如在明年以后，还要保持一定的出口增长率，承认不同品种间流用出口配额等。但是，我们还要充分估计这样做可能对国内纺织品产业产生的影响，同时，需要采取对策，对有关中小企业加以关照。”

很清楚，田中的想法是通过让步与美达成协议。同时，也要适当照顾国内纺织品业界的利益。为此，要计划出国内纺织品业界因减少出口而受的损失金额，然后，由国家给予补贴。

通产省的官僚们对田中的这个想法感到迷惑不解。田中刚上任时，曾对他们说“日本方面的主张是有道理的”，对通产省和国内纺织品业界的立场表示理解，可是，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谈后，立场就改变了，这是为什么呢？

通产省的官僚们向田中表明了他们的担心，强调若对美国让步，势必引起国内纺织品业界的混乱。但是，田中却说“责任由我来负”，不想改变自己的主意。

当时，日本以经济高速增长为背景，对美出口激增，除纺织品外，其他产品也开始出现摩擦。譬如电视机、不锈钢板、钢玻璃、氧化物磁性材料等，美国以日本向美国倾销为由，已提起多次诉讼，纺织品问题只是当时日美贸易摩擦之象征。

除此之外，当时的形势还有两个特点：（1）佐藤政权亟欲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归还冲绳——能否如期实现，形势非常微妙；（2）美国因其经济走下坡路，美元危机已表面化。

田中对日美关系的形势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之后，才痛下决心，在纺织品问题上让步，以换取美国把冲绳归还日本。

但是，基本方针虽定，道路却依然坎坷，在田中—肯尼迪会谈后三个月里，日美间的交涉又经历了一连串的曲折。

对于负责解决纺织品问题的通产省来说，田中是第三位“纺织品大臣”了。从1969年尼克松总统要求日本自动限制纺织品出口以来的三年期间，曾有大平正芳和宫泽喜一两任通产大臣为此进行了苦斗。

日美纺织品摩擦发端于尼克松参加总统竞选的1968年。尼克松在选举运动中，为争取美国南方各州的选票，提出要求日本自动限制其纺织品出口的主张，并向南方选民许诺，一旦他入主白宫，定将在纺织品问题上有所作为，倘若日本不主动限制出口，美国将采取强制性限制措施。尼克松之所以如此信誓旦旦，是因为他看到美国南方的纺织品制造业是受日本竞争打击较重的产业之一，许多工厂被迫关门，工人失业，而且这些纺织品厂商也有一个力量强大的院外压力集团。

尼克松决心履行自己的诺言。1969年2月，他上台不久，果真要求日本自动限制纺织品出口了。同年5月以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商业部长莫里斯坦斯等政府高级官员相继访问东京，轮番催逼日本尽快采取自动限制出口措施。在同年7月举行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上，美方又以咄咄逼人的态度，威压日本就范。当时的通产大臣大平正芳不愿吞下苦果，但又不愿给美方留下“死硬派”的印象，便来了个缓兵之计。他表示先派一个通产省调查团赴美调查纺织品业界受损情况。可是，同年9月派遣的调查团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发现美国纺织业界因日本向美国出口纺织品而受害的事实。

大平以为用“事实”可以堵住美国人的嘴，但美国不达目的岂肯善罢甘休，坚持要求在日本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一项纺织品协议。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

1969年11月19—21日，佐藤去华盛顿，与尼克松举行首脑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公开说法是就归还冲绳问题达成最终协议。实际上，留给两国领导人处理的问题有：（1）冲绳存放核武器问题；（2）纺织品问题。而美国方面把这两个问题拴在一起了。

佐藤为了不使他的要求归还冲绳之行受挫，在启程访美10天前，派密使赴美，同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举行秘密会谈。日本密使告诉基辛格说，佐藤可以同意通过一个全面安排，把日本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于是，基辛格打出了一个美国商业部拟定的纺织品限制出口方案。密使立即飞回日本，向佐藤汇报。过了几天，密使答复说，美方方案可以接受。

1969年11月19日，佐藤到达华盛顿。他在同尼克松进行的第二次谈判中明确保证，纺织品问题将会像总统所希望的那样得到解决。佐藤宣称，他完全负责，并说言而有信是他的“信条”和“誓言”，说这是他的诚意，他将为此而尽一切努力。

佐藤作出上述保证后，尼克松考虑到佐藤在日本国内的立场，同意严格保守秘密。这样，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只字未提纺织品事，只是冠冕堂皇地大谈美国归还冲绳等问题。

但是，首脑会谈刚结束不久，东京的报纸就争相报道说，佐藤与尼克松搞了秘密交易——“卖线买绳”，意指佐藤以在纺织品问题上的出卖和让步，

换取美国同意归还冲绳。

首脑会谈之后不久，日美间就纺织品问题进行正式谈判。美国方面先后两次提出了限制日本纺织品进口的协议草案，规定5年期间对28种化纤品分别进行不同额度的限制，对该28种以外的纺织品的向美出口规定了“触发点”，即出口到一定水平，便要自行限制，内容相当严厉。

通产省认为此案没有讨论的基础，断然拒绝了美国的方案，使佐藤首相处于尴尬的境地。为了排除通产省的阻力，佐藤利用1969年末大选之后改组内阁的机会，起用“知美派”宫泽喜一取代大平正芳任通产大臣。

当时，日本内部在纺织品问题上大致有两种态度，其一是以外务省为中心的“对美照顾派”，担心因此事影响日美间的政治关系，主张尽量考虑美国的要求，早日达成妥协；其二是以日本纺织品业界和通产省为代表的“合理解决派”，认为“既然美方没有受损失，日方就没有必要自动限制出口”。宫泽的任务是使上述两派的意见达成妥协，以争取尽快解决。

1970年6月，宫泽主持拟定了一个政府方案，其内容是：（1）限制时间为1年；（2）限制品种共23种，包括化纤制品15种，毛制品8种；（3）标准年次，化纤制品为最新的1年，毛制品为过去最高年份（1968）；（4）限制方式，只设23个品种合计的总限额，不设品种个别限额。

日本政府决定以上述方案为基础，在华盛顿举行日美会谈。经过协商，会谈于1970年6月22—24日在宫泽通产大臣与斯坦斯商业部长以及爱知揆一外务大臣与罗杰斯国务卿之间分别举行。美方的态度始终强硬，日方也不肯让步，双方的意见相距甚远，结果，发表声明声称“没有达成协议，希望今后继续协商”，会谈破裂。

会谈的决裂刺激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派，他们扬言要控告日本制品对美国倾销和限制向日本出口原煤，使日美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张。

为了打开僵局，1970年10月，佐藤利用出席联合国成立庆祝会的机会，又同尼克松举行会谈。佐藤表示，在16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他打算把其中14个问题达成协议，剩下的两个问题留待他回国后解决。佐藤和尼克松就再次举行政府间谈判达成协议，并决定由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和尼克松总统的国际经济政策助理彼得·弗拉尼根来谈。这样，日美纺织品谈判进入了第二个回合。

但是，牛场和弗拉尼根的谈判也未获结果，致使美国方面的保护主义更加高涨，纺织品问题陷入泥沼。日本纺织品业界鉴于这种情况，于1971年3月宣布了自动限制出口措施，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其内容是：从1971年7月起，自动限制出口3年，第一年度限制5%，第二、第三年度限制上年度的6%；采取棉、毛、化纤制品的总额限制方式。

这些措施基本接受了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提出的妥协方案的内容，使纺织品问题的解决露出曙光。然而，尼克松对这个方案却颇不以为然。这是因为米尔斯系反对党民主党人，而且，日方在提出上述措施的同时，就单方面地中止了日美政府间的谈判，使尼克松很恼火。在此背景下，尼克松声称，“日方的措施与美国的要求相距太大”，彻底拒绝了日方的方案。

佐藤获悉尼克松的反应后，大为震惊，焦虑地说：“这下可糟了，虽然提出限制措施时做了很好的说明，但看来对方有误解，必须设法消除它。”爱知外务大臣和宫泽通产大臣也说：“政府原以为由业界采取自动限制措施

便会取得成果，并期待美方也会予以理解。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很遗憾，但今后通过业界的自动限制出口能有好结果，同政府间达成协议，实际效果是一样的。今后，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再采取政府间谈判的形式了。”

由于日方把美国政府撇在一边，以米尔斯为对手，招致了尼克松的不满，日本业界虽然从7月1日起开始实行单方面限制，但美国政府并不予以理解。结果，纺织品问题仍是个悬案。

田中出任通产大臣，正是日美政府间的意见僵持，佐藤首相和日本政府十分焦虑不安的时候。

纺织品谈判的“田中式解决”

田中在上述与肯尼迪特使的第一次会谈（1971年7月14日）中，已意识到日本非让步不可了，但他在与肯尼迪特使举行第二次会谈（7月26日）和9月9—1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八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并未作出让步的表示。

尤其是在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斯坦斯商业部长声称，“日本应根据政府间协定来进行限制”，对此，田中却说，“日本的纺织品业界与农民一样，团结得很紧密，政府不能包办代替，做不到的事就是做不到。纺织品问题已经由日本纺织业界采取了自动限制措施，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把斯坦斯的意见踢了回去。田中在正式场合，始终强调日本坚持不搞政府间协定，而坚持要等纺织品业界自动限制的效果。

实际上，田中在第八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举行之前，在威廉斯堡与肯尼迪特使和朱立克总统助理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次秘密会谈是应肯尼迪的要求进行的，由于田中也认识到仅凭公开交涉难于收场，便同意通过幕后活动寻求妥协。

会谈中，肯尼迪强烈要求以他7月末提出的一项方案为基础，签订政府间协定，而且详细说明了美国国内的情绪，警告说，如果日方不让步，10月15日以后，美方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对此，田中表示，虽然不能全部接受肯尼迪方案，但准备同美国继续协商，而且声称，日本不再坚持不与美政府谈判的立场，从迄今的正式立场后退下来。在这次密谈中，双方设定了“10月15日”签订协定的日期。从此，日美间围绕纺织品问题又展开了频繁的活动。为了压日本作最后让步，9月17日，朱立克总统助理向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因从10月15日起实行进口配额制度，要求日方在10月1日之前明确态度”，并于9月20日飞抵日本，于第二天同田中举行了会谈。朱立克向田中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方针，说“肯尼迪方案是美国的最后方案，如果日本不同意据此签订政府间协定，美国将根据对敌交易法采取限制进口措施”。

如果美国实行限制进口措施，日本纺织品对美出口的年增长率就要被压到3%以下，而且在限制进口细则拟出之前的半年之内，可能被禁止进口，还可能使日本的电视机、汽车的对美出口受到影响。

鉴于这种情况，田中一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也可能让步的话，两国政府间可以举行谈判，现在这样不像话”，另一方面却认识到“一定要避免美国单方面地实行进口限制”，认识到“要计算出日本纺织品业界因限制出口所蒙受的损失金额”的必要性，并决心为此展开一些活动，以扫清日美政府谈判的障碍。

10月以后，田中明确认识到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签订政府间协定解决了，便开始在执政党内和向在野党做工作，以取得谅解。同时，强烈要求美国降低要价。田中还指示通产省计算出日本纺织品业界因采取自动限制出口措施，将蒙受约2000亿日元的损失，为此，他四处奔走，要求政府从预算中拨出相应款额，对之进行补偿。因款项太大，田中在佐藤首相的支持下，向掌管财政大权的大藏大臣水田三喜男直接进行交涉，结果很迅速地把这笔款项编入了修正预算案中。

最后一幕是从10月13日起与肯尼迪特使进行的三天谈判。田中对来日进行幕后谈判的朱立克说，“肯尼迪不来不好谈”，要求美方提高谈判代表级别。同时，在10月12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田中提出改变政府方针，正式开始进行政府间谈判的想法，得到内阁的同意。这样，使日本政府在纺织品问题上的方针来了个180°的大转弯。

接着，田中于13日夜在横田基地、14日在大仓饭店、15日在通产大臣办公室连续不断地与肯尼迪特使进行正式、非正式的谈判，终于在15日签署了“为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的谅解备忘录”。当时，田中就任通产大臣才两个多月，堪称“闪电般的速度”。

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1) 限制时间为3年，从1971年10月开始；第三年时，日美双方就是否延长问题进行磋商；

(2) 限制对象为所有毛纺和化纤制品；增长率化纤为5%，毛为1%。

(3) 以9.5亿码为基数，在实行总额限制的同时，也可实行品种限制。

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美方许诺对日本向美国出口的纺织品免征进口附加税。

从上述内容看，这份谅解备忘录除有个别修改外，基本上是肯尼迪方案的内容。

15日夜，内阁官房长官竹下登发表政府声明称，日本根据“互让的精神和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同美国签订了政府间的协定”。

同日夜，田中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日美政府间协定的签订是为了避免日美关系恶化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因为不签订这个协定，其他产业的产品出口将受到影响。形势十分紧迫，谈判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想到纺织品的对美出口终于被排除在进口附加税的征收对象之外，而且能在短时间内就草签了这个协定，我不能不有所感慨。我非常清楚纺织品业界会反对这个协定，会对政府加以批评，但政府别无其他办法，而且，这个协定的内容可以说跟业界自动限制的内容几乎一样。我想，经过沟通，业界是会理解的。反正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这样，长达三年的日美纺织品谈判，终于在田中的手上解决了。但是，田中的大幅度让步，果然激起了业界的猛烈的反对。日本纺织业联盟会长大屋晋三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抗议声明，声称“政府终于无视国会的决议，并不顾纺织品业界的一致反对，同美国政府签订了对美纺织品出口限制的政府间协定。……我们将采取一切手段，彻底追究政府的责任”。

但是，政界及纺织品以外的出口产业部门却都给田中以肯定评价，又一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为对付美元危机，宣布了一项“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对输入品征收10%的附加税。

次认识到田中的决断力和行动力。田中出任通产大臣三个月，就解决了困扰政府三年的难题，为他日后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赢得了一分。

前通产省事务次官、田中任通产大臣时的秘书官小长启一事发表感想：“我非常佩服田中作为政治家的魄力，该做的事挨骂也能做到底。当时，如果没有赴汤蹈火的觉悟，问题就不会解决，而事态只能越来越恶化。只有田中大臣敢于这么干。当时，纺织品业界的反对很强烈，在野党也与之呼应，提出了对田中大臣的不信任案，抨击说，‘搞这样无聊的谈判，致使纺织品业界蒙受巨大损失的人物，担任通产大臣不合适’。参院也提出决议案，对田中大兴问罪之师。然而，田中大臣为了日美关系，能做到极大的忍耐，毫不介意人家的反对。

“与此同时，他的决断之神速，抓住时机进行幕后活动，细心周密的考虑，都令我由衷地佩服。

“当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能迅速地找到现实的解决办法；在做出让步的同时，又能让美方同意日本的出口有一定的自然增长，其谈判手法实在巧妙；与此同时，又注意采取国内措施，以免使纺织品业界受损失……

“我认为，田中大臣有做这种事的天赋，其运筹能力、行动能力和谈判能力等，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

尼克松冲击的考验

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冲击”，是田中任通产大臣期间面临的最大考验。这次“冲击”是继美国于7月15日宣布尼克松总统决定访华后的第二次冲击，是动摇日本战后经济基础的历史性事件。

8月15日，尼克松总统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国发表了“新经济政策”，其内容为：

- (1) 暂时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
- (2) 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制；
- (3) 对进口商品加征10%的进口附加税；
- (4) 冻结工资、物价90天；
- (5) 削减联邦支出417亿美元，削减海外援助10%；
- (6) 取消轿车消费税；
- (7) 提前一年实行预定从1973年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减税；
- (8) 为促进设备投资，实行投资减税；
- (9) 监视工资和物价的冻结状况，制定长期性的稳定物价政策。

尼克松上述声明发表之初，许多日本人最为关切的是“对进口商品加征10%的进口附加税”一项，担心这项措施影响日本对美出口。这种担心并不奇怪，因为日本当时对美国的出口额约占日本出口总额的30%，而且，成为加征进口附加税对象的商品达94%。可是，从其后的效果看，“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一项具有更本质的意义。这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平价价值崩溃。

在此之前，美国向全世界保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1盎司黄金=35美元的比价用美元兑换黄金，因为这样，美元保持着作为国际通货的价值。但是，

尼克松声明表明，今后各国不能再以原比价用美元兑换黄金了。

这个事实意味着战后的国际货币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支柱国际货币基金（IMF）体制的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章程规定，成员国决定本国货币的“平价”时，用黄金或与其价值等同的美元标出，并以各国货币对美元（黄金）的固定汇率来维持固定汇率制，进行稳定的贸易。

日本战后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便以 1 美元 = 360 日元的固定汇率进行对外贸易。可是，尼克松声明发表后，因黄金与美元脱钩，固定汇率就无法维持了。

尽管大藏省和日本的国家银行在东京外汇市场上买进了约 40 亿美元，拼命地维持 1 美元 = 360 日元的平价，力求避免日元升值，但是，到 8 月 27 日，终于抵挡不住抛售美元浪潮，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改行浮动汇率制，眼睁睁地看着日元升值的现象出现。

田中作为通产大臣，在尼克松声明发表三天之后，就表明了倾向于同意日元升值的态度，并及时地着手研究日元升值后的中小企业政策和出口政策。这是由于他当时已意识到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的矛头所向，日元升值已势在必行。

至 9 月份，形势进一步发展，日元在货币多边调整中面临大幅度升值的压力。9 月 17 日，田中出席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后，从华盛顿回国。他对记者说：“日本当初考虑的日元升值 5—10% 的幅度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又不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升值 15% 以上，那样做的话，日本经济承受不了。”

田中关于把日元升值幅度控制在 15% 以下的想法后来并未成功。日美和西方各国之间经过一系列紧张的讨价还价之后，在同年 12 月 17、18 日于华盛顿召开的第四次十国财长会议上，终于决定将黄金价格由 1 盎司 = 35 美元提升为 38 美元，在美元贬值的同时，日元升值 16.8%（1 美元 = 308 日元），联邦德国马克升值 13.75%，荷兰盾和比利时法郎升值 11.55%，法国法郎和英镑升值 8.57%，意大利里拉和瑞典克朗升值 7.48%，加拿大元继续实行浮动汇率制。

会议还决定：（1）在长期性的货币改革取得一致意见之前，汇兑变动幅度可为新汇率的上下 2.25%；（2）美国废除征收进口附加税的做法；（3）美国将同日本、欧洲共同市场和加拿大就长期和短期贸易问题进行个别谈判；（4）将开始讨论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这样，第二次尼克松冲击引起的国际货币动荡暂告平息。

华盛顿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标准汇价为 1 美元 = 308 日元，并宣布从 20 日开始实行。

田中作为通产大臣兼代理大藏大臣，在政府作出上述决定后发表讲话，强调要采取万无一失的对策，避免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人民生活和对外贸易造成不良影响。

田中这番话与其说表明了他对佐藤政权的耿耿忠心，莫如说是他觊觎佐藤后政策的政策宣言。当时，佐藤政权已近末期，人心思变，政局动荡。田中为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实际上已与他的政敌福田赳夫开始了激烈的角逐。

攀上巅峰

鼓足勇气同命运抗争，以“决断与实行”为号召，入主首相官邸，成了“庶民宰相”。

亮出竞选旗号

从1971年7月5日佐藤首相最后一次组阁，到翌年7月5日进行佐藤下台后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是田中角荣问鼎自民党总裁和首相宝座关键性的一年。

1971年7月5日，佐藤首相更换自民党“三巨头”，同时改组了内阁。这次人事更动的最大企图是把田中从党的干事长的位子上拉下来，有意识地让田中远离政权，而让大藏大臣福田赳夫转任外相，以使他增长才干，为日后接班任首相作准备。

尽管佐藤首相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但田中却毫不气馁。他鼓足勇气同命运抗争，并在佐藤的眼皮底下，为迎接最后的决战扎扎实实地作了一系列准备。

对田中来说，胜负的关键在于他能否集聚足压倒福田赳夫的力量。

为此，田中在他所在的佐藤派内进行了精力充沛的多数派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周密筹划和紧张活动，1972年5月9日夜，佐藤派内以木村武雄为首的拥立田中集团，在东京一家日本餐馆聚会，正式亮出了支持田中竞选党总裁的旗号。这批人由地下活动转入公开活动，意味着佐藤派事实上已分裂为田中系和支持福田赳夫的保利系，前者为82人，后者仅为22人。

接着，田中又在自民党各派领袖中间展开了合纵连横活动。6月2日，田中与党内实力人物大平正芳达成协议，商定在总裁选举的决选投票时实行联合。在此基础上，田中又开始大力争取自民党内中曾根派、三木派和各中间派的工作，以求彻底孤立福田。

与此同时，田中又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6月11日，田中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日本列岛改造论》，作为其对内政策支柱。该书一发行，立即引起轰动，很快就销售了80余万册，田中的声望因此进一步提高。

6月17日，佐藤在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大会上正式表示辞职。总裁选举定于7月5日举行。

6月19日，佐藤出于对事态发展的忧虑，召见福田和田中，要求在总裁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得票占第二位的人不要参加决选投票，而无条件地让位于第一位的人。福田当即表示同意，而田中的回答却非常暧昧。田中对自己获胜充满信心，他很清楚，即使在第一轮投票中所得票数在福田之下，但加上大平和三木派的票，也定会超过福田，稳操胜券。

6月19日，在日本政坛上素有“风向标”之称的中曾根康弘见大势已定，宣布自己不参加总裁竞选，而要支持田中。中曾根在自民党内虽只率领着一个小派别，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中曾根派作为一个砖码，在田中与福田之争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消息传出，田中派大长志气，福田派受到严重冲击，待价而沽的中间派受到震动，纷纷倒向田中。从这天起，田中角荣的优势地位日渐明显。

到6月30日，离总裁选举还有5天，日本各大报早刊无一例外地报道称，

田中角荣处于优势。

7月2日，田中与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举行三派首脑会谈，一致商定在总裁选举中谁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最多就支持谁，并就日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达成政策性协议。

田中、大平、三木三派政策协议书如下：

我们正处于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了度过这个时期，需要打破陈旧政治和行政的桎梏，把国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我们就下述几个基本点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决心共同努力，促其实现。

(1) 排除陈旧政治的惰性，吸收国民的一致意见，实行清新而有魄力的政治；

(2) 实行党的改革和不停顿的自我革新，使其组织和管理现代化，建立与国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体制，以适应时代的潮流；

(3) 鉴于世界已进入“脱冷战时代”，将在和平共处的精神下，积极地致力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现在已是举国上下一致的舆论。我们将通过政府谈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缔结和平条约；

(4) 改变财政经济政策的出发点，要把经济发展的果实还归于民，谋求改善和充实国民的生活环境，尤其要置重点于教育，促进富饶的、地区社会的形成；

(5) 我们确认，在总裁选举中，遵循党的章程，为实现初衷，同心戮力。

三派首脑会谈意味着田中在与大平结盟的基础上，最终取得了三木派的支持。由于中曾根日前表示支持田中，实际上形成了四派联合对付福田的局面。

四派联合，不仅仅是自民党派阀间的合纵连横，而且采取了政策论争的形式，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平、三木和中曾根在各自的竞选声明中都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放到重要位置上。他们都认为，福田一旦上台，将继续奉行佐藤路线，成为“佐藤亚流政权”，在外交上也不可能迅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四派之间在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方面的意见一致，促进了他们的联合。

四派联合的实现，为田中角荣日后登上总裁、首相宝座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田中赢得了党内三派的支持，使福田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福田因此失去了在第二轮选举中可以联合的对象。

田中、大平和三木7月2日会谈后，联合会见记者。当记者问及“决选投票时的三者关系”时，三木代表三人答称：“三个人中有一人得票占第一或第二位，其余的两个人就协助他。如果有一人占第一位，一人占第二位，就要堂堂正正地进行选举，第三个人的行动不受约束。所谓‘遵循党的章程’，就是这个意思。”这番话实际上为田中当选提供了保证，因为当时田中的实力显然已不是大平和三木所能匹比的，三人之中只有田中有可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占据第一或第二位。

许诺实行新政

按照惯例，田中在1972年6月21日正式宣布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发表了一篇题为《争取实现新政》的竞选声明。田中在声明中概述了他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决断与实行”的口号。声

明在自民党内外受到广泛好评，人们对他上台执政解决日本面临的内外课题抱有期待。应该说，声明的发表进一步拉开了他与“佐藤亚流”福田赳夫的距离。田中在声明中声称：

我们正处于内外双重的转折时期，面临着“第二次开国”的考验。

此时此刻，我痛感时代提出的要求，为实现飨于国民的新政，决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

世界进入了新时代。世界由靠力量均衡来确保和平向靠对话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向过渡，东西方关系逐渐走向改善。另外，世界上还有一个新问题即南北问题，“北”方各国应该通过扩大对占人类2/3以上的“南”方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合作，帮助“南”方各国发展并维持和平。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南北方关系上，我国的作用和责任都增加了。

战后历经27年有余，国内也处于转折和变革时期。

我们为从战争的废墟上站立起来，出大力流大汗，终于在不长的时间内，创造了今日的繁荣局面。今日的成就是日本人亲自努力的结晶，这是值得自豪的。现在，日本经济在量的方面已充分扩大，但质的充实还要靠今后的努力。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产生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公害蔓延、物价飞涨、教育的混乱、两代人的代沟，等等。

在内外课题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国民中间出现了焦灼、烦恼和对前途深感不安的情绪。这些问题对于在漫长的历史中克服了重重困难的日本人来说，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胸怀崇高的理想，又始终立足于现实，勇敢地解决问题，我们的理想就能变成现实。

我国的民主政治在“战败”的高昂代价上培育起来了。我们要精心培育它，要一代代传下去。

政治是属于全体国民的。70年代的任何一个课题都需要国民的参与和合作，只有唤醒基于国民的生活感觉的大众政治，才能铲除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另外，政治是能够吸收国民的英知与活力的。

70年代的政治，要求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政治。

政治家应该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国民，然后设定具体的目标，并规定完成的时间，全力以赴地去实现。但是，在民主政治之下，即使一项项政策再好，如果没有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也不可能收到如期的效果。

我将与全体国民一起思考，深思熟虑，果敢行动。如达到最高的目标需要时间太多，就先求其次。我绝不左顾右盼，犹豫不决。有时即使味道是苦涩的，但只要它是真实的，我会把情况如实地告诉大家。关于后果如何，责任由我来负。

我所希望实现的是责任明确的“决断与实行”的政治。

我将为建设一个使每个家庭都充满笑声，老年人和青年人都对明天充满希望的社会而竭尽全力。

最荣耀的日子

1972年7月5日是田中角荣一生中最荣耀的日子。田中在这一天举行的自民党临时大会上，当选为自民党第六届总裁。执政长达7年8个月的佐藤荣作首相发表引退声明之后，为选举接班人，自民党临时大会于7月5日上午10时4分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

10时50分过后开始投票。开票结果，4位候选人的得票结果是：

田中角荣 156 票

福田赳夫 150 票

大平正芳 101 票

三木武夫 69 票

因4位候选人均未达到超过半数的239票，按有关规定，接着在第一、第二得票者之间进行决选投票。12时34分投票揭晓：田中角荣282票，福田赳夫190票，无效4票。

投票结果表明，田中击败了福田，赢得了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胜利。顿时，田中阵营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坐在前面第二排的田中激动地站起身，深深地鞠了一躬，举了一下右手，又转身向后施了一礼。场内又一次响起祝贺的掌声。田中又一次举起右手表示谢意。接着，田中登上主席台，发表简短讲话，他最后铿锵有力地表示：“我决心全力以赴，为国家、为我们的党增添光辉的一页。希望国民们自爱。”

大会之后，在首相官邸花园举行盛大酒会，祝贺新总裁和首相的诞生。

下午1时8分，田中新总裁在人群簇拥下进入会场。他被议员和记者们团团围住，边说“真热啊”，边走到前面发表了讲话，强调“现在已不是思考的时代，而是行动的时代，否则，国会是不会答应的”，说着说着，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

田中在首相官邸酒会仅停留27分钟就匆匆离去。

下午3时，田中出现在东京永田町的自民党本部，会见记者。会见中，他首先就当时日本最大的悬案日中关系发表看法：“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期已经成熟，我愿负起责任，来研究以什么样的基本态度进行政府间谈判的问题。”接着，他又谈及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论》设想。他说：“非这样干，公共投资的效益就高不了，还会引起通货膨胀。关于公害、物价和城市人口过密与过疏的问题，将制定年次计划，提出具体的蓝图和目标。”就这样，一开始就明确了田中政治的主要指向。

会见中，田中还表示：“因为是自民党总裁的更迭，政策仍然是自民党的政策，政治将保持连续性。只是，人变了，就会有若干变化。”谋求改变现状的想法溢于言表。

入主首相官邸

7月6日，即田中当选自民党总裁的第二天，召集了第六十九届临时国会。由于自民党在国会占有过半数议席，田中自然地当选为战后第十一位内阁总理大臣。

当天，以“决断与实行”为号召的田中进入首相官邸，着手人事安排。他首先决定了党的“三巨头”人事，桥本登美三郎（田中派）任干事长，铃木善幸（大平派）任总务会长，樱内义雄（中曾根派）任政调会长。同时，决定任命二阶堂进（田中派）为内阁官房长官。

翌日，田中开始组阁工作。考虑到总裁选举前“四派联合”的经纬，田中安排三木武夫出任无任所国务相（副总理），大平为外相，中曾根为通产相。阁僚名额的分配，除3名由参议员充任外，田中派4名，大平派3名，三木派2名，中曾根派3名，水田、船田、椎名等各中间派均1名。为弥补

同福田的关系，为福田派安排 2 名。起初，田中邀请福田赳夫本人入阁，但福田要价很高，提出从福田派、园田派、佐藤派和保利系各出一人入阁。田中考虑到各派系间的比例，决定把邮政相和经济企画厅长官两职留给福田派的三池信和有田喜一，不料被福田拒绝了。田中无奈，决定暂时由他自己兼任这两个职务，以后再说服福田同意三池和有田入阁。这样，田中于 7 日完成了组阁工作。

组阁当天，田中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发表了上任后第一次讲话：“我在内外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刻执政了。在此，我重申我的决心，要为我国的发展贡献一切力量。

“佐藤前首相长期执政，留下了许多光辉的业绩。我愿步前首相之后尘，肃正纲纪，实行清廉的政治，报答国民的期待。

“首先，在内政上，要活用迄今经济发展的成就，谋求国土划时期的利用，为解决公害、住宅、土地问题等，果断地推行高瞻远瞩的政策，实现国民的福利。

“在外交上，要加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

“日本随着国力的充实，国际地位正在飞跃地提高。这同时也说明我国在国际上责任重大。从而，我国必须为世界的和平和亚洲民生的稳定倾注全力。

“我决心在取得各位国民合作的基础上，谦虚地追求新的政治潮流，在举党一致体制下，奋力迈进。”

田中在这篇堪称“就职演说”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政府的基本内外政策：对内要搞福利，对外要推进和平外交。值得注意的是他第一次以最明确的措辞宣布他的政府要以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为急务，并把此举作为日本推进和平外交的前提。

“庶民宰相”神话频传

田中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首相后，从国民反应看，绝大部分都是支持的。人们对持续了将近 8 年的佐藤政权厌倦至极，而只有小学学历，又是贫民出身的“庶民宰相”田中角荣的出现，使他们感到新鲜，田中的内外政策宣言，给他们带来希望。“听说只有小学毕业，却能把东京大学毕业的尖子官僚玩于股掌之上”；“虽说年轻，却是个了不起的干将，据说他提出的口号是决断和实行”……人们的议论，一传十，十传百，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大堆关于他的神话。

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评称，田中“这个人是一手拎着《日本列岛改造论》，一手拎着‘承认中国’这样两项积极政策登上首相宝座的。正因为他是在无所作为的政治家佐藤荣作下台之后登场的，所以他的舞台效果得了满分”。

另一位政治评论家富森叡儿是这样看的：“田中当选自民党总裁绝非偶然，它如实地反映了保守政治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形势提出了修正战后保守政治轨道的要求。

“在外交方面，要摆脱以日美单独媾和为出发点的冷战外交。战后提交国会的重大外交案件，几乎均与加强日美安保体制相关联，因而总与在野党形成全面的对峙。僵化的外交及日本国内围绕这种外交发生的斗争，成为战

后政治无休止的现象之一，国民对此已感到厌倦，并日益加深不安感。形势要求日本的不仅仅是顺应走向缓和的亚洲的发展潮流，而是要在新的思维下，争取掌握主动权。

“在内政方面，以农村为选举地盘的自民党已走进死胡同。迄今，自民党为了获得农村的选票，用比国际行情高得多的价格收购农民生产的大米，还对农村实行其他种种补贴。但是，由于大米生产过剩，自民党和农民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出现了矛盾，且正在加深。

“自民党过于偏重农村而忽视城市的政策，又使它逐渐失去城市选民的支持。作为战后保守政治的另一根支柱——高速发展经济政策——弊端丛生，而这些弊端又集中于城市，这必然引起城市居民的不满。还有，这种高速发展经济的政策导致日本在出口商品和进口资源方面，与外界发生了矛盾。

“现在，形势对日本的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全面改变这种维持战后保守政治的内外基本政策。

“在4位候选人中，田中之所以被选中，一是因为他年纪轻；二是因为他有进取性，与佐藤政治恰成对照；三是他的出身和经历与其他候选人不同，人们感到有魅力。大概自民党大会是根据这些因素，认为他是最能适应当前形势的人吧。”

据《朝日新闻》进行的舆论调查，对田中内阁的支持率高达68%，超过了当年对吉田茂内阁的支持率，创历史最高记录。正如日本舆论界当时所分析的那样，这其中反映了国民对田中内阁所寄的热烈期待，希望他能实现竞选中的政策设想：外交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推行和平外交；内政上，消除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种种弊端，改变生产与生活的失衡局面，提高国民的生活福利水平。

建树卓著

从1972年7月7日组阁到1974年12月9日下台，田中执政仅2年5个月，与他的前任佐藤比较，其政权寿命是短暂的。

但田中内阁又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内阁，田中在既存的世界秩序发生巨大变化，国内人心思变的情况下，顺应时势和民心，针对当时日本面临的最迫切的内政外交课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并付诸实行。在“决断与实行”的口号下，田中在执政不长的时间里，其业绩超过了佐藤，作为一个有建树的内阁，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

田中就任首相84天，就走了日本27年没走完的路，一举同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这是田中内阁最大的建树。中日邦交正常化当然不能归功于田中个人，但是任何一段历史都不能没有代表人物，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于田中执政时期，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实行《日本列岛改造论》的设想，是田中上任后对内政策的支柱。为了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田中上台伊始，就设立了他的私人咨询机构——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在研究可行性的基础上，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遗憾的是，正当田中踌躇满志地大展宏图时，遭遇了“石油冲击”和物价上涨，田中的梦想变成了泡影。但是，由于田中的努力，国会通过了《国土利用计划法》并设立了国土厅，为后来留下了可贵的“遗产”。

开展资源外交，谋求资源市场多元化，也是田中施政的一项重大内容。田中在任2年5个月，先后出访外国8次之多，历访了20个国家，精力充沛地与各国首脑进行了会谈。其中除访华、访苏旨在处理政治问题外，几乎都是资源外交。实际上，田中对中国和苏联的访问，也包含着谋求资源、市场多元化的意图。

田中亲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是他在70年代初美苏关系出现缓和的形势下，力求开展“自主多边外交”，扩大日本外交回旋余地的又一表现（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和开展资源外交是其“自主多边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他力图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一次勇敢尝试。田中这次访苏虽未能使日苏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他作为日本政府首脑，在鸠山首相访苏后，相隔17年踏上苏联国土，就双边关系问题举行最高级会谈，重申日本的立场，无论从宣传效果还是从日后两国关系的演变情况看，都是一次有影响、有意义的访问。

关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日本列岛改造论》设想、资源外交和访问苏联，本书将在后面专设章节详细论述。这里列举一下田中执政期间其他的重要政策措施及其成果。

经济产业政策

（1）促进电力发展。

日本60年代末兴起反公害活动，发电厂尤其是核电站的选址问题，十分难以解决。为了取得电厂、电站所在县和当地居民的合作，田中内阁于1974年6月制定了《发电用设施周边地区整备法》、《促进电力发展税法》、《促进电力发展对策特别会计法》等“电力三法”，并设法解决了上述三项法律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财源问题，使三法发挥了效益。

（2）实行电子计算机贸易自由化。

电子产业部门的老板们为了保护日本方兴未艾的电子计算机产业，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尽量推迟进口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但是，田中认为日本只有加入国际社会，在开放的经济体制下参加激烈的竞争，才能使尖端产业部门得以发展，毅然地决定从1974年8月4日起实行电子计算机进口自由化，从同年12月1日起实行软件的投资自由化。同时，在1974年度预算中，编制了用于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预算，以促进本国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种做法成为后来技术发展预算的基础。

国土行政

（1）解决了公共事业用地问题。

1974年9月实施了有关扩大公有地的法律，并创设了土地的先买制度，决定成立土地开发公社，作为取得公共事业用地的公法人。这个措施解决了公共事业用地难的问题。

（2）成立下水道事业中心。

鉴于日本居民中下水道普及率较低，田中内阁于1972年11月成立了下水道事业中心，以发展下水道技术，培养下水道技术人员，促进下水道公益事业的发展。

（3）完善救助自然灾害的法律。

1972年7月，日本九州、四国等地区洪水成灾，受害严重，政府拨出了一笔救灾资金，并扩大了救助范围，但由于既有的救灾法不能适应救灾工作的需要，田中立刻指示自民党有关部门通过议员立法程序制定新法和修改旧

法。这样一来，救灾的措施更加完善和多样化，对稳定灾区的民心起了重要作用。

(4) 决定了建设筑波研究学园城市的计划。

1973年4月，筑波研究学园城市迁移工作开始，还制定了有关新建试验研究机构、教育机构的基本计划，使这座新学园城市的建设具体化了。

(5) 制定城市绿地法规。

1973年9月，田中内阁为保证城市绿地不受侵害，创设绿化协定制度，规定了城市建设规划中的绿地保护地区。

1974年6月，公布《生产绿地法》。为形成良好的城市环境，还创设了生产绿地制度，允许市区内的一些土地作为农田使用。

(6) 对市区内部分农田实施与宅地相同的课税制度。

1973年4月，对市区内一部分农田实行与宅地相同的课税制度。这项措施不仅使地方的税制趋于合理化，而且也使住房用地的来源有了一定的保证。1973年9月，又公布《宅地化促进临时措施法》，促进农田向宅地转化，对解决城市住房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7) 实行工业化住宅性能认定制度。

为推进住宅生产的工业化，1974年2月，认定了工业化住宅的性能，确立了买房者合理地选择住宅的指标。

(8) 设立国土厅和公布《国土利用计划法》。

1974年6月，为了保证有关土地政策的统一，并强有力地推进《日本列岛改造论》的实现，设立了国土厅。

另外，为了谋求利用土地的综合性和计划性，通过实施《国土利用计划法》，加强了对土地的管理。

邮政事业

(1)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采取措施改善了同中国的通讯状况。

(2) 放宽对一些主要地区民营电视台的限制，促进了电视事业的发展。

(3) 决定研制通讯卫星(CS)及电视广播转播卫星(BS)，为日本民用卫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4) 提高了邮政储蓄的总限额，加速了邮政储蓄事业的发展。

卫生事业

(1) 改善了老年人医疗、福利条件。

1973年1月开始实行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还采取了给老年人提供饮食服务等福利措施。

(2) 实行了养老金自动增长制度。

修改《养老金保险法》等法规之后，从1973年11月起，实行了养老金随物价上涨而自动调高的制度。

(3) 稳定医疗保险制度。

1973年10月，修改了《健康保险法》等法规，创设了高额医疗费制度，并采取措施，增加政府掌管的健康保险费用。

(4) 解决了药物受害者的救济问题。

为解决1955年日本森永奶业公司因生产的婴儿用奶粉有毒，致使11778名婴儿中毒，133人死亡问题，于1974年4月25日，在厚生省的努力下，成立了财团法人“光协会”，从事救济事业。田中内阁还努力使当时缠讼已久的安眠药事件获得解决，使厂家与受害者走向和解。

(5) 采取措施，大力改善残疾人的福利条件。

开始实行残疾人模范城市制度，还制定了扩充和完善残疾人福利设施计划，使希望进入设施的严重残疾儿童都能如愿。

文教事业

(1) 制定《人才保证法》，改善教师的待遇。

1974年2月制定《人才保证法》，大幅度地提高了从事义务教育的教职员的待遇。采取法律措施革除了不称职的教师，保证了视教育为圣职，热心于儿童教育事业的教师的来源及其待遇。

(2) 改革向国外派遣教师的制度。

1973年开始，田中内阁改革了向国外派遣从事义务教育的教师的制度，大幅度增加了派遣人数，并把教师在国外考察的时间从两周左右延长至1个月左右。这项改革旨在使更多的中小学教师开阔视野，增进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从而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

(3) 增建医科大学，做到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医科大学。

从1973年度起开始增建医科大学，使一些缺医县的落后状况得到了改善。

从上述罗列中不难看出，田中内阁的确是个“决断和实行”型内阁。从另一个角度看，田中内阁所采取的上述措施，是为了缓和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和摩擦，改善日本的形象，摆脱国际上的孤立状态以及缓和日本国内的矛盾，解救自民党政权面临的危机。

田中是在日本已经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时登台执政的。日本经济的迅速膨胀给国际关系和国内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都带来了新的不平衡。在国外，日本奉行的“出口第一主义”政策和廉价攫取能源、资源的行径，引起了美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强烈不满，其“经济动物”形象遭到许多国家的鄙视、怨恨和警惕。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上，尼克松所搞的“越顶外交”和逼迫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及田中出访东南亚遭到当地民众示威反对，都象征性地表明田中上台执政前后日本所面临着国际关系的紧张情况。在国内，一味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政策，造成了“第一流的生产水平和第三流的生活水平”现象突出存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公害、老龄化、人口过密过疏等社会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

尤其应该看到，日本的资源先天不足，其经济是在“贸易立国”的方针下发展起来的，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大，从而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田中政权登台不久，爆发石油危机，使石油99%靠进口的日本受到严重打击。石油危机刚爆发，日本立即受到冲击，市场混乱，人心惶惶，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都被迫作出调整。上面罗列的一些国内立法和行政措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对付石油危机

石油危机是继第二次尼克松冲击之后又一个从根底上动摇日本战后经济的巨大事件。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不久，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制裁和牵制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运用石油战略，采取了减产、禁运、提价和国有化等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国际石油垄断资本，使石油进口大国日本的经济乃至政治受到严重冲击。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以石油为中心的能源稳定供给的基础之上的。在此以前，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石油。但石油危机使日本人受到一次深刻而痛苦的教育。当时，田中政权成立刚一年多，危机与日本国内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使田中的经济、能源和物价政策受到双重打击。

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3 年 10 月 6 日爆发后，石油形势很快就受到了影响。10 月 16 日，海湾六国在科威特举行部长会议，把中东石油的标价从每桶 3.011 美元提为 5.119 美元，提价约 70%。翌日，包括非洲产油国在内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为支援第四次中东战争，也决定使用石油武器。

这种以石油为武器的战略，意味着产油国今后将采取独自の石油政策，而不再同国际石油垄断资本商量。

石油战略使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受到严重打击。10 月 20 日刚过，负责日本与产油国之间石油买卖的国际石油公司通知日本的石油公司和有关商社说，将提高石油价格并削减供应。

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使刚刚成立一年多的田中政权大为震惊，一场严峻的考验来临了。

田中面临的首要课题是，检查迄今日本对中东的政策，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此前，日本历届政府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斗争中，一直偏袒以色列。因此，在阿拉伯国家看来，日本并不是友好国家，而根据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战略，不是友好国家就要削减对其石油的供应量。这对于日本来说，当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在紧迫的形势下，日本政府内部和经济界围绕是否需要改变中东政策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希望能保证石油稳定供应的经济界和通产省，主张改变迄今的政策，在阿以冲突中明确支持阿拉伯。但外务省出于对美外交考虑，却持消极态度，担心因而刺激一直支持以色列的美国。

果如外务省所料，美国很快就出来干预了。国务卿基辛格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之后，顺访日本，会见田中首相。他强调，“现在美国正在谋求实现中东和平，希望日本不要改变迄今的外交方针，转而采取亲阿拉伯立场。如果一意孤行，将会使美日关系出现裂痕”。基辛格还向田中通报了美国国会的气氛，借以对日本的阿拉伯外交进行牵制。

面对基辛格的警告，田中毫不退让。他向基辛格解释说，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极高，如果阿拉伯产油国大幅度削减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经济势必陷入严重混乱状态。他告诉基辛格，除非美国能取而代之保证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否则日本便不得不采取接近阿拉伯国家的立场。

据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称，当时，“田中在连珠炮似的而又有些口吃的讲话中阐述了日本面临的问题，既不使用隐喻，也不躲躲闪闪。他列举了石油进口的统计数字，说明了减少能源消耗对日本的生产 and 生活方式的影响。他说，不能让日本公众认为他对事态的发展完全放任自流；无所作为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日本默然同意别人把它捏死。据田中说，发表某种对阿拉伯事业表示同情的声明是必要的，尽管它并不会改变美国的政策。他强调，日本真正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影响美国的政策”。

这样，田中给日本政府部门间的争论下了结论，并授权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于 11 月 22 日发表了一项明确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声明。

这项声明首先阐明了日本政府希望解决阿以冲突的立场，提出了以下四

项原则：

- (1) 反对以武力获取或占领领土；
- (2) 以色列从它在 1967 年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撤走军队；
- (3) 采取措施保障该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安全；
- (4) 承认和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

声明对以色列现在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表示“遗憾”，而且表示，如果以色列不从它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撤走，日本“将重新研究同以色列的关系”。

田中政府在发表了上述被称为“新中东政策”的声明之后，又向阿拉伯国家派出了特使，以争取阿拉伯产油国理解日本的立场，继续向其提供石油。

充任特使的是田中内阁的副总理三木武夫。他于 12 月 10 日乘专机离开日本，历访了沙特阿拉伯、埃及、科威特、卡塔尔、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 8 个国家。三木特使在访问中，不仅反复说明了日本的“亲阿拉伯”立场，而且给每个国家都带去了“礼单”，如答应向埃及提供用于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日元贷款，允诺向伊拉克提供用于建设液化石油气厂的日元贷款等。三木此行博得各国对日本的好感。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甚至表示，“感谢日本的友好立场，愿为日本尽一切努力”。12 月 25 日，在科威特召开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石油部长会议发表声明称，它们“承认日本是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国，今后将向其供应所需要的石油”。田中的阿拉伯外交收到了效果。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日本国内，石油危机加剧了通货膨胀趋势，出现了乱涨价现象，民众中不满情绪急剧增长，田中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通货膨胀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普遍现象始于石油危机之前。石油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1974 年的消费物价上升率，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等 7 个发达国家的平均值达到 14%。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受石油危机影响最明显的国家，日本当时正处于日本列岛改造热之中，许多商品供不应求，中东战争一爆发，通货膨胀之火就更猛烈地燃烧起来了。

石油危机导致了日本国内的抢购风潮，其象征性的事件是席卷东京和关西地区的“抢购手纸风”。田中内阁的通产相中曾根康弘 10 月 19 日对报界说，“将来纸张可能紧缺”，呼吁国民展开节约纸张的运动。当时手纸供应不足，价格不断上涨，一旦哪个店价钱便宜些，马上就会被抢购一空。

为此，通产省自 10 月下半月开始，就对企业加强了关于节约能源的行政指导，并呼吁一般消费者厉行节约。日中首相 11 月 4 日在长野市游说时也呼吁节约石油消费。他说，“我国现在有 79 天的石油库存，是足够用的。但是，我们不能浪费，希望大家注意节约，如适当降低室内的暖气温度……”

11 月以后，为了克服石油供应紧张的困难，田中内阁又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

第一项政策性措施是在 11 月 16 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的“石油紧急对策要纲”，它对民间企业、一般家庭和国家、地方行政机关、公共事业部门应采取的节油措施，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其内容是：

(1) 展开全民性的节油运动，室内暖气温度不超过 20℃，私人汽车和广告霓虹灯的使用要自行控制，实行五日工作制，等等；

(2) 通过行政指导，在 12 月底以前将企业的石油和电力的消费削减 10%；

(3)加强进出口贸易的管理,缩短酒吧、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及百货公司、超级市场的营业时间,电视台要自行控制深夜节目的播出;

(4)控制旅游交通,加油站节假日不营业;

(5)削减电梯运转台数 20%,节约路灯、室内照明用电,办公机器不用时随手切断电源;

(6)各工厂和办公处所成立节约石油等能源的消费节约委员会,具体落实节约事项;

(7)为防止物资供需失调和不正当的提价,通过《防止投机法》加强对物价的管理,加强对总需求的控制,并采取措施,防止有人投机取巧,牟取暴利;

(8)为确保石油的供应,包括外交方面在内,要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并进行石油资源的开发,进行原子能发电、水力发电、地热发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技术开发。

同时,政府成立了由田中首相直接领导的紧急石油对策推进本部,以强有力地推进节能措施。

为防止对石油制品的囤积居奇行为,政府在 11 月 20 日的内阁会议上,还决定将汽油、轻油、农渔业用的 A 重油、液化气和印刷纸追加为《防止投机法》的适用对象。

其间,田中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付物价上涨。他在每次内阁会议上都强调:“光节约石油的消费不行,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物价。为防止搭车涨价和取缔牟取暴利的行为,是否可研究一下建立加税制度?”他在指示政府部门采取更有力的法律措施制止社会上的不法现象的同时,还强调要用法律手段来保证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的稳定,命令有关政府部门采取切实措施,充分保证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以及对于国民经济十分重要的物资的供应。

为了稳定民心,田中于 11 月 22 日发表电视讲话,直接向民众说明政府的对策。

他说,18 升一桶的煤油 10 月 15 日全国平均价格涨到 410 日元,其实应卖 234—235 日元,如有需要,可采取凭票供应的办法。合成洗涤剂一般增产幅度为 7—8%,自 10 月以后,增产 22%,因此不会缺货,政府完全可以保证。关于砂糖,每公斤的价格应为 148 日元,虽说国际价格有若干上涨,但每公斤卖 300 甚至 350 日元是毫无道理的。从制糖公司的生产状况看,不会缺货,大家尽可以放心。

他告诉国民,为了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正在制定新的法律,而且可以运用现行法律加以控制。1—10 月平均价格上涨幅度超过 20%的商品,政府准备依据现行税法从制造厂到零售店,对各个环节进行彻底的税务调查。

他强调,政府正依据《囤积居奇防止法》等法律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如果发现在流通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政府将立即全部征收。

他说,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在东京中央邮政局开设了 1 号信箱,专门受理消费者诉苦告状信件,希大家加以利用。

他向国民解释了“手纸抢购风”的起因,说关西一家手纸工厂因违法被公正交易委员会处分,停产两个星期,引起一时紧张,而不是原料短缺。发现之后,大坂立即采取了措施。今后,超级市场里将出售廉价的手纸。

他强调指出,政府并不想搞统制经济,尤其不想搞战争期间那样的战时

经济。日本使用的石油占世界石油消费量的 10—12%，但与各国不同的是，日本的石油是用于民需和生产。今后，将使民需合理化，节约部分用于生产，以使生产不下降。另外，日本需要对消费过度 and 东西用了就扔的做法加以反省，首先，政府要端正态度，在此基础上，求得国民的理解。

田中在讲话中如此具体地分析了物资供应和物价问题，阐明政府的对策，说明田中为对付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生活混乱局面，颇花了一番脑筋。

田中政府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制定《石油供需适量法》和《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前者对节约石油的消费、分配和稳定石油价格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后者旨在通过调整生活用品和重要物资的价格和供应，保证国民生活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秩序的正常，以防止因石油供应不足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混乱。

上述“石油二法”制定过程中，田中曾遇到两个麻烦。一是自民党内部的反对，认为田中此举是“在搞统制经济”；二是该二法的积极推进者、田中的得力助手爱知揆一大藏大臣因患急性肺炎猝然去世。因此，直拖延至 11 月末才初步制定出来。

“二法”后经若干修改，于同年 12 月 21 日成立，翌日，田中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根据新法律《石油供需适量法》第四条发表公告，宣布当时的经济处于紧急状态。同时，改组了紧急石油对策推进本部，成立稳定国民生活紧急对策本部，自任本部长。当时，田中因患急性中耳炎和牙病住病。他从医院出来，参加了 22 日的临时内阁会议，发表谈话：我希望得到诸位国民理解的是，现在的情况与物资绝对匮乏的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统制经济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虽说要抑制石油消费，但从全部情况看，很快就要达到 1992 年的消费水平……石油供应形势的剧变，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今后，为了创造新的富裕生活，追求真正的国民福利，需要毅然改变思维方法。政府要带头厉行节约，同时要加紧实行产业结构的节能化，重新看待原子能发电和水力发电的意义，要运用煤炭及其他国内能源，推进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我们迄今克服了许多障碍和困难。我确信，只要政府和国民携手努力，一定会经受住今天的考验，防国民经济之混乱于未然，确保国民生活的稳定。衷心期望各位国民的理解和合作。

田中在发表上述谈话的同时，还提出了以下三项具体措施：

(1) 从明年 1 月起，原则上要将石油的供应削减率提高到 20%；对 500 千瓦以上的电力用户，要求其削减用电 20%；

(2) 将国营铁路运费和大米零售价的提价日期后延 6 个月，并抑制其他公共费用的提价；

(3) 为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价格稳定，要做好生产、进口和运输工作。

石油危机发生后，虽然日本国内乱了一阵子，但由于田中首相和他的政府认真对待，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明确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和国民的责任和应持的态度，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稳定了人心，并建立了适应新形势的经济生活秩序，逐渐缓解了这次石油危机。这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发展轨道，其间虽然遇到了诸多困难，但日本在发达国家群中的境况还算是比较好的，表明了日本经济的适应能力较强，而这种适应能力与政府的宏观管理水平密切相关。

田中首相在石油危机发生后进行的外交政策调整和采取的一系列内政措

施，又一次显露了其政治方向感、决策的果断性、施政的行动力和非凡的政治手腕。田中的“带电脑的推土机”形象又一次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北京握手

顺应时势和民心，勇往直前，仅仅用 84 天时间就登上万里长城第四个烽火台，超过了尼克松。

日中问题成为内政问题

1972 年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改变了历届自民党政权长期推行的“向美国一边倒”政策，实行以日美合作为基轴的“自主多边外交”，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1972 年 9 月，田中访华，同中国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是田中“自主多边外交”最典型的实践和最赫然的成果。

田中政权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其面临的内外形势推动的结果。田中上台后仅用 84 天时间就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当然也显示了他的政策决断力和行动力。

日本经过 60 年代的高速发展，至 70 年代初，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经济大国，其主要经济指标均居世界前列。随着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产生奉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的要求。打开日中关系，对日本展开“自主多边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平正芳在就任田中内阁外相后，就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同佐藤政府有何不同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新政府决心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他说：“日本过去的外交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认为同美国一致就不会错。今后即使有险阻，也要由自己来判断。”这番话清楚表明，田中内阁十分明白，其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之举意味着开辟日本外交的新时代。

田中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是在他的前任佐藤荣作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后，作出的顺应时势和民心的历史性选择。

佐藤政府 1964 年 11 月上台以后，追随美国，并继承自民党历届政府的衣钵，对中国奉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捞取实惠、反华而不断绝往来的政策，即佐藤上台伊始就声称的“政经分离”政策。

进入 70 年代，这项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从 1970 年中国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到 1971 年尼克松总统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以及同年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佐藤政府的意料，使其处于被动、孤立的境地。

为缓和国内外压力，稳定政局，佐藤政府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顽固坚持其反华的基本立场，一方面不断玩弄新花招。

佐藤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并宣称，会议的议题要扩大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并通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地或通过第三国造成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既成事实，以制造舆论，欺骗视听。在东京，佐藤派员与中国驻日人员秘密接触、试探。在枝节问题上，提出要与中发展关系，如提出同中国搞邮政协定、气象协定，简化我驻日人员去日签证手续、使用特惠关税等等，企图在不解决两国政治关系的情况下，应付时局，缓解压力。

1969 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美国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和美苏争霸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并相应逐步改变其对华政策。1971

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首次访华，中美双方发表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使日本又一次受到冲击。

由于佐藤政府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公告的突然发表“犹如晴天霹雳”，打得佐藤晕头转向。

据报道，佐藤是在公告发表前3分钟才接到美国通报的。公告发表的当天，佐藤起初故作镇静地说“尼克松干得真漂亮”，后来则慨叹道，“尼克松干这样的事，真是多灾多难啊”，“没有料到！不过，我并不慌张”。关于他预定发表的国会演说的中国问题部分，他开始坚持说“没有必要修改”，后来又不得不加以修改。

日本外务省对美国搞“越顶外交”，没有把基辛格到北京一事通报日本，“强烈地感到遗憾”，有人甚至抱怨说“华盛顿把日本抛弃了”。

日本在野党借公告之东风，纷纷猛烈抨击佐藤内阁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以要求佐藤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为目标，加强了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内人心涣散，反佐藤的力量趁势活跃，也出现了联合的趋向，佐藤的控制力空前削弱。日本财界也打破沉默，要求政府跟上世界形势的发展，改善日中关系。

在这种形势下，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阿尔巴尼亚等23国联合提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又一次给佐藤政府以沉重打击，日本国内各界要求佐藤下台的呼声进一步高涨。

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联合公报。美方声明：美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确认最终要从台湾撤走其全部军队。

2月27日联合公报发表后，佐藤政府为冲淡影响，极力贬低公报的意义，实际上，不得不承认其敌视中国的政策破产。日统治集团普遍担心美中关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将超过日本，日本成为“孤儿”。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日本国内各界人民要求同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空前高涨，对自民党政府形成了强大压力，关系到政局的稳定。日中问题从而已成为当权派迫于解决的内政问题。

发出信息

田中角荣在这种形势下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立即抓住这一紧急课题，以向前看的态度提出“改变政治潮流”，并与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就中国问题达成了政策协议。与此同时，田中通过他的心腹木材武雄、久野忠治等人同中国驻日本的人员进行秘密接触，发出了他组阁后将加速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信息。

1972年7月5日，田中当选为自民党总裁。7日，田中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发表谈话，正式表明政治抱负称，“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在激烈变动的世界形势中，大力推进和平外交”。

7日夜，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被新上任的外相大平正芳召到东京赤坂的千代新和风餐馆。桥本一进屋，看到田中首相坐在大平身边。

“内阁准备完成日中邦交正常化。桥本，要辛苦你了，请马上着手进行谈判的准备。”大平郑重地通知了桥本。

田中首相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最后说了声“桥本君，拜托了”，还指示桥本以后有事直接向大平请示、报告。

田中、大平让一个课长为中心作谈判的秘密准备，是为了减少阻力。当时，自民党内还有一股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势力，被称作“反对派”或“慎重派”。田中和大平知道，如果过分地刺激他们，就会增加不必要的阻力。

因此，最初一切都秘密进行，即使后来有了眉目，仍不声张。如桥本课长等一班人8月31日至9月6日作为田中访华的先遣队访问了北京，尽管谈的多是日程和礼宾安排，如宴会时演奏曲目的选定，应给爱出汗的田中准备几条湿手帕等等，但桥本一行何时启程，何时回国，一概未向记者透露。

田中首相7月7日发表加紧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谈话后，中国政府本着愿意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一贯立场，很快作出反应。7月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表示，“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周总理的讲话传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当夜发表谈话，他说，“三木先生和大平先生进入田中内阁，就可以说明田中内阁希望恢复日中邦交的态度。今后，大平外相将负责推进恢复邦交的进程，能否加快速度，全凭外务大臣了。周总理的这番讲话是恢复邦交的东风”。

田中内阁进而于7月10日统一了意见。田中、大平、二阶堂和外务次官法眼晋商议后，由二阶堂官房长官出面，发表了如下谈话：“政府寄予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热情，得到了中国方面充分的理解，这是很好的事情。政府认为，现在进行日中政府间接触的机会正在成熟。从而，我认为今后政府的责任是研究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方策。”

各在野党对田中政府的表态感到满意。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10日表示，“如果田中内阁承认恢复日中邦交三原则，社会党将予以支持”。民社党12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田中内阁明确原则，民社党愿意进行合作”。13日，公明党表示，“如果日中首相当真作出打开日中关系的决断，公明党将全力合作”。

这样，恢复日中邦交作为朝野一致的目标，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随后，社会、公明、共产和民社等四个在野党的11名议员向政府提出了一份“关于当前紧急政治课题的询问书”，要求政府把承认日中复交三原则作为政府的基本方针，并要求举行朝野党领袖会谈。

7月18日，田中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这份询问书进行答辩。答辩书的要点是：

“日中两国间有着长达两千年的漫长交流史，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麻烦。对此，应该谦虚地反省。

“日中两国间决不能再动干戈。为谋求邦交正常化，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开始日中两国政府间的负责的对话。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所谓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作为基本认识，

“三原则”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

政府能够充分理解。因此，要充分考虑广大各阶层国民的意见，研究能为日中双方接受的具体方案。政府的态度是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间谈判。

“政府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我国多数国民的愿望，而且有助于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政府将基于这种观点，负责制定具体谈判方案。

“政府认为，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间谈判是不可缺少的。”

同日，田中首相分别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胜党委员长春日一幸举行了会谈。21日，又同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会谈。通过上述会谈，田中得到了在野党合作的确证。

7月22日，田中会见访华归来的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听取了他会见周总理的情况。佐佐木转达了周总理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的谈话。

7月25日，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23日夜，竹入避开记者的眼睛，去田中私邪晤谈。在此前后，竹入同大平外相也进行了数次秘密会晤。在此基础上，竹入整理了一份包括十几个项目的所谓田中政府对恢复日中邦交的态度记录。

竹入在北京期间，与周总理总共进行了10个小时的晤谈。周总理在7月29日的第三次谈话时，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想法。竹入边听边拼命地记笔记。8月3日夜，竹入回到日本。翌日上午，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首相官邸会见了竹入。竹入向田中递交了“竹入笔记”，传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态度。

田中与竹入会见后，日本政府发表了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见解。其内容已经由竹入转达给周总理。这样，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已互相了解。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气氛高涨的形势下，中国上海舞剧团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赴日访问。周总理决定由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任团长。该团一踏上日本国土，就受到热烈欢迎。

7月20日，太平外相、三木副首相和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等人出席了日本民间人士为欢迎孙平化和赴任不久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举行的酒会。

接着，太平外相于22日下午在大仓饭店与孙、肖二人举行会谈。太平首先解释说：“我知道你们想见田中首相的心情，昨天，我见首相时，他说，‘我自己也想迎接远方来的客人，一起谈一谈，但现在的国内形势他们也知道，因此，我作为最终的负责人，就不亲自见了，请与我一心同体的大平来见’。他这番话，希望你们能谅解。”

孙、肖转达了周总理对日本政府首脑访华的邀请。他们说：“周总理认为，如果田中首相或大平外相能到北京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同周总理举行直接会谈，就会找到解决难题的办法。如果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起来，更加欢迎。”

对此，大平外相说：“对田中首相和我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都是我们豁出政治生命要搞的，因这个问题对日本来说也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因此，要在充分考虑对内对外的各种问题和今后的政治日程之后，再考虑访华的日期。”

在田中、竹入会见后，8月11日，大平外相再次与孙平化、肖向前会谈。

大平向他们转达了田中的话，说田中感谢周总理对他的访华邀请，“将愉快地访华”。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就今后的安排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会谈的信息传到北京的第二天（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发表声明，称“周总理欢迎和邀请田中首相访华”。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首相于15日在东京的帝国饭店亲自会见孙平化、肖向前。孙平化直接向田中首相转达了周总理的正式邀请。田中感谢周总理邀请他访华的厚意，表示他已决定访问中国，但说要处理好党内各种意见，作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暂不过早地公布具体时间，希望通过访华，一举建交。

8月16日，孙平化一行结束访日归国。田中政府为表示盛意，包“全日空”一架专机，把代表团一行直接送回上海。

周密的准备

在与中国疏通想法的同时，田中为消除自民党内的阻力煞费苦心，度过了一个紧张的炎夏。

田中首先授意自民党在7月13日举行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将中国问题调查会扩大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自民党当时有众、参议员431人，其中的249人参加了这个协议会，占58%，会长是小坂善太郎，副会长有江崎真澄、木村俊夫、小川平二、古井喜实、宇都宫德马、田川诚一、川崎秀二等12人，事务局长为鲸冈兵辅。

7月24日，田中出席该协议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并讲了话。

他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表示，政府对中国方面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异议；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也能理解。

他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战后外交的大业，自民党和政府将慎重而果断地行事。由于在野党和促进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等组织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为恢复邦交敷设了轨道，今后将继续接受它们的帮助，同时，在我们自民党内，希望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发挥核心作用，为此，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和作出判断。

他强调指出，为成功地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须和执政的自民党统一意见，并得到自民党强有力的支持。今后，我和大平外相将同小坂会长保持紧密联系，研究日中政府间谈判的具体方案。关于我访华的问题，请协议会决定。我希望政府和执政党慎重地研究。

田中讲话之后，大平报告了田中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想法。

在田中政府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发表正式见解的8月3日，大平外相出席自民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常任干事会，说明了田中内阁成立以来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的过程和政府今后的基本态度。还说，田中首相已接到中国政府的访华邀请，近期内必须作出答复。

大平外相在上述说明中强调，“在原封不动地保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要想同中国达成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协议，是有困难的”。对此，贺屋兴宣、北泽直吉、藤尾正行等“台湾帮”表示反对，声称“台湾问题是极

超党派的议员组织，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该组织更名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为日中友好六团体之一。

为重大的问题，不应该轻易地得出断绝外交关系的结论”，表明在自民党内确有反对派。

鉴于这种情况，田中8月7日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迅速成熟，也形成了相应的舆论。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没有一国同国府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关系，日本也不可能例外”，对自民党内的“台湾帮”进行了牵制。

该协议会于9日召开全体会议。小坂会长报告了3日召开的干事会上得出的两点结论：（1）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2）为此，田中首相可以访华。全会对此表示同意。但亲台议员提出意见称：“虽然同意上述两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首相访华的时间和复交的内容交由政府全权决定。”为此，该协议会决定，今后要通过正副会长会议、干事会和全体会议就首相访华的时间、日台关系、日中复交与日美安保条约的关系以及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等进行讨论，就政府同中国谈判的基本立场调整自民党内的意见。

8月15日，外务省对“台湾帮”贺屋兴宣等议员提出的12个问题作出回答。贺屋等人的问题全部与台湾问题相关，追究田中政府成立后急剧改变对华政策的原因。外务省在回答书中详细说明了国际形势的变化，解释说，日本必须顺应世界大势，企图以此说服“台湾帮”。

17日，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上又起波澜。“台湾帮”对大平外相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的答辩中，将“日华条约”称作“日台条约”表示不满，要求小坂会长提出“不抛弃台湾”的所谓“原则”。

在自民党内意见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自民党总务会8月22日开会，听取了小坂会长关于协议会的审议经过，并作为自民党的决议，决定自民党要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和同意田中首相访华。

自民党内的“台湾帮”虽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不满，但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大致说来，这些人可分为以贺屋兴宣为代表的战前派和以中川一郎为代表的战后派。中川等人在总裁选举中是积极支持田中的，他们对田中政权上台伊始就急于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表示不满，但对这批人仍有说服的余地。另一方面，当协议会开始起草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时，河野洋平等一大批主张尽速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人明确表示，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理所当然的”。

苦于收拾事态的小坂会长9月4日求见田中。田中在听取小坂的报告后明确表示，“台湾帮”主张的“两个中国论”和“一中一台论”是不能接受的，批示小坂会长统一协议会的意见。

在5日召开的协议会干事会上，果然意见纷坛，一下子提出了小坂会长方案、贺屋方案、其他鹰派方案和鸽派方案等四种方案。为此，小坂会长困惑不安，当他决定休会时，中川一郎等战后派提出了在小坂会长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某些字句修改以求解决的建议。另一个战后派浜田幸一也表示撤回他提出的“小坂会长不信任案”。由于年轻的鹰派突然软化，顽固的贺屋兴宣等人形影相吊，失去了作用。据田中秘书早坂茂三后来透露，年轻鹰派议员态度的变化是因为田中私下对他们做了说服工作。

形势急转直下，协议会干事会当日决定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

指台湾当局。

指中国领土钓鱼岛。

其内容如下：“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我国政府应注意以下几点。尤其是鉴于我国同中华民国的深厚关系，希望能在充分考虑继续保持向来的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涉。

- (1) 日中邦交正常化应基于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十项原则进行；
- (2) 相互尊重不同社会制度，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同友好国家的关系；
- (3) 相互不行使武力和武力威胁；
- (4) 相互增进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不进行歧视；
- (5) 为亚洲的和平和繁荣相互合作。”

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 8 日召开全体会议，承认了干事会决定的上述基本方针。接着，自民党召开总务会，将上述基本方针作为党的决议通过。“台湾帮”提议将上述基本方针中的“希望”改成“应该”，将“向来的关系”加上“也包括外交关系”的字样，小坂会长只表示同意将“希望”改成“应该”，而对“包括外交关系”未置可否。

为了减少阻力，田中决定在他访华之前，派遣以小坂会长为团长的自民党代表团访华。12 日，田中会见小坂，表示了政府的希望和要求。自民党代表团在小坂率领下于 9 月 14 日乘专机访华，18、19 两日在北京与周总理进行了会谈。

上述经纬表明，所谓调整自民党内的意见，意味着对“台湾帮”做说服工作。

当自民党内的意见调整大体完成，小坂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时，田中派出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为特使，率一班人于 9 月 17 日飞抵台北机场。

椎名的使命是说服台湾当局。他在台北市受到几百人的示威队伍的围攻，蒋介石佯称感冒，拒绝会见，椎名与沈昌焕“外长”和严家淦“副总统”等政要相继会谈，说明日本的困难处境，请求台湾当局谅解，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坚决反对”日本恢复同大陆的邦交。

椎名此行虽未能说服台湾当局，但对田中来说，已算是尽到了礼仪。同时，田中看到自民党内的不满大体已解决，便同中国商定于 9 月 21 日上午 10 时（东京时间 11 时）在北京和东京同时发表如下公告：“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地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 9 月 25—30 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以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发表了如下谈话：“田中总理访华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举行会谈，使长期以来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日中关系正常化。政府希望在日中之间建立起和平、友好的关系，成为好邻居。为此，首先必须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日中两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负有巨大责任，如果田中总理访华和日中首脑会谈的结果能在日中两国间奠定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将有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有助于世界和平。

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为了使我国同一衣带水且历史关系深远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成为通常的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是理应采取的措施。

政府在实行日中邦交正常化时，将充分考虑我国同各友好国家的关系。

田中总理访华时，大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将陪同前往，另有 49 名随行人员。

田中总理预定9月25—29日在北京逗留，29日离北京去上海访问，30日离上海回国。”

9月22日上午，田中比往常提前一小时召集内阁会议，决定访华期间由三木武夫任代理首相，中曾根康弘任代理外相，本名武任代理内阁官房长官。之后，田中拜访皇宫，就访华事上奏天皇，还走访前首相佐藤荣作、石桥湛山，召见前外相福田赳夫，要求他们对其访华给予“理解与合作”。

同日，田中还通过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向全国再次表明了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访华的决心。他说“要以国民舆论为背景，通过日中首脑会谈，打开恢复邦交的大门”；又说，“如果中国方面在首脑会谈中提出经济合作的要求，就要响应”，表示日本“不打算做外国人过去称呼的那种‘经济动物’，真正有助于整个中国的经济合作，才是可取的”。他还表示信念说，“我们全体亚洲人应当聚在一起，为了亚洲人而一起作出安排，一起加以贯彻执行，这样一个时代正在到来”。

同日晚上，田中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植村甲午郎、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永野重雄、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木川田一隆、日本经营者联盟代表理事樱田武等财界“维新会”（支持田中的财界组织）巨头聚会。田中在会上说，“日中邦交正常化存在着台湾这个难题，可我不能不去努力解决它。我估计访华归国后会有一些人提出种种批评，不过，我已经作好了精神准备”。

据日本报纸后来报道，田中在下决心访华时，曾对大平外相述怀道：“喂，大平君，我们搞这个问题，不知会怎样。反正人是要死的，要死就一块儿死吧，我是有这个准备的。”

23日，田中在东京一家饭店约见前首相岸信介，同他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在此之前，田中拜谒了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陵墓，向这位生前力主恢复日中邦交，并为日中民间友好往来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辈的在天之灵报告他即将访华的消息。

24日，田中在踏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旅途的前夕，为有意轻松一下，7时才起床，比平常整整晚了两个小时。他照例入浴后，简单地用过早餐，信步走到门前，仰望着半阴半晴的天空，自言自语道，“台风好像偏过去了”，显出放心的样子。他想到这些天为准备访华的劳累，不禁脱口说道，“今天可要好好休息一下……”

8时许，他穿上运动服，轻装走出家门，前往高尔夫球场。途中，他去另一位日中交流的先驱高碕达之助先生的陵墓献了香。他仁立墓前，表情严肃地注视墓碑，想到恢复日中邦交的重大使命如今担在自己肩上，心中涌起万千感慨。

田中来到小金井郊区俱乐部时，等候着他的一群记者立即围了上来。田中要求记者不要提起“中国”，说“今天不要那么吵闹”。但是，在进午餐时，他自己却憋不住提起话头，说：“报纸上说我只吃日本饭，那是瞎说。我什么都吃。但要带上梅子。”于是，关于访华的话题顿时热烈起来。“熟悉的地方很多，还是离得很近啊！”“在上海和周恩来总理一起吃饭吧”……他指着满是汗水的头，告诉记者，这次访华要带一把扇子，说“天气虽然凉爽，但头也许要冒汗的傍晚，田中刚回到东京目白台的家，十来个选民代表就赶来鼓励。田中咬紧嘴唇回答说：“一定努力。”

当天晚上，田中同夫人花子和女儿真纪子等全家人团聚，吃着肉卷和炖

菜。田中让他特别疼爱的小外孙雄一郎坐在自己身旁，用筷子夹菜喂他。看田中那副表情，他似乎忘了明天即将去干一番大事业。

但他心里到底还是装着一桩大事，推了饭碗，就伏案读书去了。这是他为访华阅读的书。这些书是：

《2001年的中国》韩素音著

《周恩来——中国幕后的杰出人物》许芥昱著

《中国经济入门通俗本——八亿人口的市场和经济结构》尾上悦三著

《周恩来谈日本》米谷健一郎编

《毛泽东，他的诗与人生》武田泰淳、竹内实著

《日中问题》营荣一等著

《开展中的革命外交》朝日新闻社编

讲座《中国》野原四郎等著

《中国之旅》本多胜一著

《在华日军》本多胜一著

《你好，中国话》香坂顺一、新井宝雄著

讲座《美中接近》R·斯卡拉比诺等著

《中国手册》岩村三千夫、斋藤秋男编

《中国要览》时事通讯社编

《中国指南》（编者不详）

据田中的秘书透露，一些日子以来，田中晚8时半就寝，凌晨1—2点钟就起床，趁着家人熟睡的时刻挑灯看书，一直读到4—5点钟，完全跟考大学的学生一样用功。他不仅设法了解中国情况，还了解毛主席、周总理和姬鹏飞外长的经历，甚至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举止特征也研究了一番。

田中出访中国，也忙坏了他62岁的妻子花子。多少天来，花子一直默默地为丈夫的出访作准备。田中的行李中，从喝的水、吃的米，到爬长城穿的胶鞋，样样都有。这也难怪，据说田中在国内游说竞选时，常常带上妻子做的饭团，而不吃当地的饭食。几个星期之前，田中在夏威夷也碰到过吃饭问题。当时，他同尼克松总统共进午餐，颇有气概地把美国食品吞下肚子，然后，赶紧回到下榻的饭店，吃一顿日本饭。准备水，当然也自有原因，据田中的助手说，田中爱出汗，从早到晚，每隔15分钟，就要喝上几杯冰水。

启程访华

9月25日，田中首相一行启程。

晨7时20分，田中离开目白台私邸。7时45分，他的座车驶抵停着专机的羽田机场第22号停机点。当田中首相走下车时，站在舷梯旁欢送的人群顿时爆发出欢呼声。身穿深蓝色西服的田中首相跟同行的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寒暄了一番，随后以他那种惯常的风度同站成一长串的大约350名朝野党国会议员握手或拍肩、挥手，笑眯眯地反复作简短的告别寒暄。

欢送的人群中，有代理首相三木武夫、自民党“三巨头”和各位政府阁僚，还有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书记长佐佐木良作等各在野党领导人，形成了超党派欢送的场面。在野党欢送首相访问外国，是1956年鸠山首相为日苏建交谈判而去莫斯科访问以来从未有过的场面。早日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是这些在野党的共同政策主张，并为

此做了大量促进工作。今天，他们看到田中首相终于踏上访华的旅程，想到他们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无不感到由衷地高兴。

东京时间 8 时 10 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乘坐的日航专机，带着日本人民恢复日中邦交的热切愿望起飞了。专机钻出阴霾密布的东京上空，向鹿儿岛方向飞去。

田中此行除有 51 名成员外，还有记者 80 人、电视技术人员 70 人、卫星地面站人员 24 人，这些记者和电视转播人员大部分都已先期到达北京。

飞机腾空不久，田中与大平相对而坐吃早餐。虽说田中不大吃西餐，离家前又吃过饭，但他今天的胃口却特别好，涂满黄油的面包一下就吃了 4 片，航空小姐端上来的红菜汤、煎肉饼、肉蛋卷、沙拉和果子冻、咖啡，很快都一扫而光。他边吃边说：“托昨天高尔夫球的福，浑身舒服极了！”

大平外相取笑着说：“你可真能吃啊！”

田中分辩说：“因为少许喝了一些白兰地，开了胃口，所以比平常吃得更多。”

吃得饱睡得香。田中首相吃完饭，果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大平却沉静地凭窗端坐，若有所思。人称“钝牛”的大平，既有“一事既决，宁死不回”的劲头，又是一位头脑致密、虑事周到的政务家。是他与田中共同作出了同中国复交的决断，并为田中此行作了具体周密的安排。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大平在上飞机之前，写下一份遗嘱：如果完不成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任务，誓不还家……

据大平的秘书、女婿森田一后来回忆说，大平写完这份遗嘱后，便把它放进书房里的保险柜，没有对任何人讲。当他从北京归来，才向志华子夫人谈起遗嘱事，并当场打开保险柜，取出遗嘱毁掉了。

在飞机上，大平想起自己的誓言，想到即将举行的历史性谈判，犹如千斤重担在肩。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心房不禁怦怦作跳。此时此刻，他心头上凝聚着一种隐忧：万一北京谈判出现枝节怎么办？满腔心思驱走了大平的倦意，更收起了遨游万里高空的闲情，抓紧分秒运筹起来。

专机越过波光粼粼的东海，飘荡的彩云向后退去。当飞越上海上空时，田中醒来了。

“啊，大陆真大呀！”首相看着大平和二阶堂的脸，兴奋地说，“终于来到了！”

然后，他拿出秘书官给他准备的一厚叠资料，悠然地说：“不是事到如今才当学生，也不是临阵磨枪啊。”然而，还是潜心翻阅了近一小时的资料。

当专机就要抵达北京时，田中来到记者座位前面，说，“当我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只要说‘我是田中角荣’，他就会明白的。因为同是东洋人嘛”，披露了他急于见到周总理的心情。

25 日清晨，迎接客人的北京，秋高气爽，气温是 18 。气象台报告全天“晴”，那女广播员悦耳的声音也像在祝福同日本恢复邦交似的，掀动着北京市民的心。“田中首相今日来访”成了人们的话题，大家都在等待着东邻使者的到来。

上午 11 时 30 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乘坐的道格拉斯 Det—8 型日航专机在北京机场着陆。飞机滑行时，一面中国国旗和一面日本国旗在驾驶舱外飘动。

机场上没有群众欢迎场面。在飞机旁迎接的是周总理，军委副主席、国

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等 50 多人。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的 11 名成员和他们的夫人也在场。

田中首相快步走下飞机的舷梯。欢迎他的周恩来总理同他使劲地握手。中日两国领导人在 70 年代第三个秋天握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历史瞬间啊！

五星红旗和旭日旗在机场上空飘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高奏两国国歌。日本国歌《君之代》在三四十年代，对亿万中国人民来说，是压迫的象征，而《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日战歌。在 70 年代的今天，两曲并奏，不禁令人感慨万端，深深感到时代的巨大变迁！

欢迎仪式完毕后，周总理陪贵宾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当汽车开进宾馆宽敞的院子，驶过红叶掩映的林荫和白菊盛开的花坛，停在 18 号楼门前时，穿着雪白上衣的服务员、厨师站在门口右边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进门时，细心的大平外相看到周总理同服务员、厨师一一握手，不禁发出赞叹：“这就是周恩来！”

在会客厅，周总理和田中首相边饮茶边漫谈。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田中首相开口问道：“这座房子大概造了 10 年左右吧？”周总理立即笑着答道：“1959 年建的，10 年多了。”田中首相又说：“日本也正在第一次造迎宾馆。”周总理问：“以前没有吗？”对此，田中首相作了说明：“用朝香宫殿下放东西的地方迎接客人。现在是把赤坂离宫的旧建筑物来一番大的改造，作迎宾馆用”，并热情地邀请周总理说：“迎宾馆造好后，请您做第一位客人。”周总理听懂了，不等译员译完就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说：“我感到很荣幸。”田中首相补充说：“规模虽小，却是模仿凡尔赛宫造的。”双方带着十分坦率的感情你问我答，第一次会面就这样顺利地开了头。

交谈中，周总理满面笑容，从容不迫，而田中首相讲话则正如日本人形容的，像连珠炮似的，确实很快。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彼此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次会谈

田中首相访华期间，同周总理共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

第一次会谈于 25 日下午 3 时至 4 时 45 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

当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等来到人民大会堂时，在门口迎候的有周总理、姬外长和外交部顾问廖承志等。合影留念后，他们一起走进安徽厅隔壁的会见厅，进行正式会谈前的会见。以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为中心，双方代表团在围成马蹄形的沙发上就座，而没有面对面就座，这是周总理的精心安排。周总理说：“这样坐有家庭式气氛。”

周总理首先向田中首相表示慰问，说：“没有休息就来这里，太辛苦了。”

首相答道：“在宾馆饮了美酒，略有醉意。”

周总理和在座的人都笑了。

接着，周总理问：“送给你的茅台酒好喝吧？”还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喝，喉咙不痛，也不上火，能消除疲劳，安定精神”，表示愿意送一些茅台酒给田中首相带回去。

田中说：“茅台酒虽然好喝，但度数太高，连续干杯受不了。”

周总理说：“你喝这酒没有问题。茅台酒是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家

乡贵州省的名产，长征时发现的。”

接着，周总理引用了田中就任首相以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发表的历次讲话，高度评价了田中首相的态度。

田中首相对日中两国过去有一段“不幸时期”表示遗憾，并表示决心说，“今后，日中两国要永远和平相处，不能重演过去的历史”。

田中首相以日本人民的名义，把 1000 株大山樱和 1000 株日本唐松树苗的礼单赠送给中国人民，并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了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画《春晓》，向周总理赠送了杉山宁的画《韵》。大平外相赠给周总理的是鸳鸯挂毯，赠给姬外长和廖顾问的是工艺品陶壶，赠给人大副委员长兼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的是图书《秘宝》。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赠给郭沫若一个工艺品花瓶“花纹”，赠给廖承志的是景泰蓝花瓶“黄玉菊花纹”，赠给韩念龙副外长的是景泰蓝花瓶“四君子”。

会见之后，两位首脑稍事休息。2 时 55 分，双方进入安徽厅开始第一次正式会谈。双方阐述了各自的基本立场和想法，一致表示，要通过谈判，一气呵成，一举恢复邦交。

会谈结束后，日方发言人二阶堂进向记者发表谈话称，“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双方以惊人的坦率态度，就各自的立场和想法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谈非常有意义。通过这次会谈，我得到的印象是，田中首相这次访华一定会取得成功”。

会谈给田中首相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就在会谈之后，他就接触周总理的感受，在一枚四方形厚纸笺上写下一句话：

躯如杨柳摇微风 心似巨岩碎大涛

在周总理的欢迎宴会上

25 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盛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

首相访华期间，北京和东京之间，设立了 8 条报社的专用电话线，还在北京建立了电视转播地面站，新闻记者下榻的民族饭店隔壁的民族文化宫建立了新闻中心。田中首相的活动，通过电视和记者的笔，及时地传到了日本。

6 时 30 分，田中首相一行到达。周总理等同客人们一一亲切地握手，合影留念，然后在乐曲声和闪光灯的亮光中并肩步入宴会厅。

主桌上，主人周总理的右边坐着田中首相，左边坐着大平外相，对面坐着二阶堂官房长官。日本客人都穿双排扣西服，气氛庄重。宴会厅长 100 米，宽 70 米，高 15 米，600 人欢聚一堂。

客人一入席，周总理就劝田中首相喝“茅台”，说：“这酒喝多少杯也不会上脸。”接着，亲自夹菜到田中前面的碟子里。田中回答说：“我喝两杯就醉了。”欢迎宴会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桌上的菜单是：冷盘，莼菜汤，红烧鱼翅，两吃大虾，川冬菜豆腐脑，酱爆烤鸭片，八宝饭，点心，水果。

酒宴方酣，爱出汗的田中首相额头已经挂上汗珠。他一会儿用毛巾擦汗，一会儿啪嗒啪嗒地摇扇子，又一次显出“庶民宰相”的风度。而大平外相则眯缝着眼睛微笑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钝牛”性格。

周总理致欢迎词，他指出，田中首相来访，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周总理说，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

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他强调应该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时，两国所有出席宴会的人一齐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倾听。周总理指出，“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他表示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周总理铿锵有力的声音震撼了整个大厅，他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讲话完毕，奏起了《君之代》，接着宾主干杯。周总理走向日方代表团成员坐的四张桌子，同每一个人都碰了杯。

一回到座席，田中首相就赞叹地说：“周总理真是海量啊！”周总理听后笑着回答说：“年轻时干杯干得更多。”席间，军乐队轮流演奏了日本和中国歌曲。日本歌曲，首先奏的是《樱花，樱花》，还演奏了田中首相家乡新潟县的《佐渡小调》、《越后狮子》和大平外相家乡香川县的歌曲《金毗罗船》，使客人感到十分亲切。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佐渡小调》刚开始演奏，周总理就问身边的田中首相：“是你家乡的民谣吧？”可是，田中首相却没听出来，等主旋律演奏出来之后，才说：“啊，是的。”第二天上午，田中首相同记者闲聊时，主动谈到此节，逗得大家笑了一场。

田中首相致答词。他的话开始不久，就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他承认，“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

他表示，他来北京是为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

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哪怕双方的立场和意见存在着一些小异，日中双方根据求大同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克服意见分歧，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田中首相这句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赋诗述怀

田中首相度过了在北京的第一个夜晚。次日，田中向身边的人透露其畅快的心情说：“昨晚睡得很舒服，我是个在什么地方都能睡得香的人。”

田中首相与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共进早餐。他把带来的紫菜、咸梅和酱汤粉等日本食品配以中国早点一起享用，兴致很高，嘴里说着“好吃，好吃”，突然诵出了一首汉诗：

国交途绝几星霜
修交再开秋将到
邻人眼温吾人迎
北京空晴秋气深。

田中兴高采烈地自夸说：“本人这种诗是做得挺高明的哟！”当天上午，二阶堂官房长官向日本记者发表了这首诗，介绍说：这首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首相在邦交正常化即将实现之前的心境，反映了中国方面款待之好和田中首相感动之深。

早餐之后，田中首相跟日本记者一同在庭院里散步。他看到一片片修剪得很整齐的海棠、白杨、洋槐和高耸的虎皮松，钦佩之至，

立时把话题转到北京市的道路建设上去，滔滔不绝地说，“北京街道两旁茂密的树木很美。给我的感觉是大家都在用心培育树木，还想了办法，一

下雨，让水存在根部。这真是一座绿色的城市”，“北京市的路灯，一边关掉，一边开着，这很节约，也很合理”。

当田中首相与记者应酬的时候，两国外长正在进行第一轮会谈。姬外长和大平外相就各种具体问题特别是结束战争状态的提法和台湾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可能正是因为大平外相在同中国方面谈，田中首相的表情非常悠然自在。首相深知外相的为人，对大平外相解决日中关系的决心也是十分了解的，据日本人士说，起用大平为外相，主要是为了顺利打开日中关系。田中内阁成立后，日本曾有一种说法：“内政田中，外交大平”，认为是“两驾马车”。

事实上，大平在田中内阁成立之前，就通过同中国早有来往的古井喜实议员与中国驻东京的人员进行了接触。田中首相执政之初，对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的步骤尚无定见时，大平外相出过许多主意，后来大量的准备工作，也主要是大平外相做的。

据大平外相的女婿、秘书森田一说，大平外相在担任池田内阁的外相时，对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已寄予很大关心。但他曾说过，实现邦交正常化应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考虑的问题。田中内阁成立时，他认为这个条件已经具备，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到来了。他是带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来中国的。来到中国以后，他也对下面的人说过，谈不出个圆满结果，宁肯延长停留时间，不达成协议不回国。田中首相有这么一位外相，当然既放心又感到轻松。

在恬静的宾馆庭园里，当记者问到对周总理的印象，田中首相说：“我通过书籍和报刊，多次见过周总理的面孔，所以，并不觉得是初次见面。”想到周总理在第一次会谈的气势，他接着说：“他是在革命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他还披露道：“周总理在昨晚的宴会上对我说，他在19岁时去过日本，在日本呆过两年。我是1918年出生的，总理正好比我大20岁。但周总理显得年轻，他的声音铿锵有力，精力充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会谈

9月26日下午，第二次首脑会谈在田中首相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厅举行。

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开口问道：“晚上睡好了吗？”

田中首相笑着答道：“睡得很好，因为环境非常之好。”

“晚上冷吗？”周总理接着问。

“不冷。昨天有点热，我是开了冷气睡的。”怕热的田中首相回答说。

周总理听后，说：“外边还是冷的哟。”

田中首相听了点点头。

“二阶堂先生怎么样？”周总理又问坐在田中首相左侧第二个位子上的二阶堂官房长官。

二阶堂答道：“晚上睡着了，所以什么也不知道。”

接着，田中首相带有解释意味地说：“昨晚在人大大会堂的宴会上，我一摇扇子马上映入电视，日方有人提醒我了呀！”

周总理安慰说：“不必介意，我也经常用扇子。”并让人取来一把杭州

产的漂亮扇子赠给他。

周总理的细心、周到，使田中首相为之感动。田中首相拿着这把画有梅花的扇子，一会儿插进衣兜里，一会儿又拿出来。翌日的日本报纸一齐报道了此事，赞扬说“周总理真不愧是一位大政治家”。

这次会谈是昨天第一次会谈的继续。双方同意恢复中日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

会谈中，针对田中首相昨晚在周总理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关于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的提法，周总理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麻烦”来表述，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日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表示，这个表述如果从汉语看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

会谈中，周总理还就中国放弃要求战争赔偿问题阐明了原则立场，批驳了日外务省条约局长的谬论。周总理指出，你们条约局长说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主张在这次联合声明中就不必再提赔偿问题了，这个说法使我们感到诧异。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关于中国放弃要求战争赔偿问题，周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还向日本朋友这样说过：战争赔偿最终是要人民来负担。中国人民饱尝过战争赔偿的苦头，庚子赔款直到中国解放也没有完全付清。中日建交了，既然两国要真正友好，我们就不能让日本人民反而增加经济负担，遭受中国人民曾长期吃过的苦头。中国人民、日本人民都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会谈中，田中首相在周总理就赔偿问题发言后表示，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

会谈结束后，田中首相把外务省官员召到自己的房间，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各位受过高等教育，是很有学问的。不要钻牛犄角尖，请你们提出一些能解决问题的见解来，责任由我负。”就这样，他把下级教训了一顿。

第二次首脑会谈结束不久，接着于5时在国宾馆举行了原定日程中未安排的第二次外长会谈，旨在根据刚刚结束的首脑会谈的精神，就联合声明前言的条文进行磋商。

这两场会谈结束后，日本记者根据二阶堂官房长官发布的消息，纷纷发回报道，称北京谈判正快速进展，进入了具体商定联合声明条文的阶段。

是日晚，日本各大通讯社争相报道说，经过两次首脑会谈和外长会谈，双方已就联合声明的下述7点内容达成协议：

- (1) 建立外交关系；
- (2) 邦交正常化的意义；
- (3)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日关系；
- (4) 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

- (5) 中国方面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 (6) 通过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 (7) 通过谈判签订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

报道称，通过双方迄今的会谈，已基本达成了邦交正常化的协议。

畅游万里长城

27日，田中首相一行趁会谈的间隙，驱车前往北京西北约64公里处的八达岭，游览了长城。对田中首相来说，万里长城和金字塔一样，“都是进小学后最先学到的外国事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行实现了他幼年时代的梦想。

9点20分，车队抵达长城脚下。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对田中首相来说，不登上顶端不算好汉。他以矫健的步伐，沿着将近三十度的陡坡，使劲地往上登攀。姬外长不时地劝他“慢点，慢点”，但过不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原来的速度。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气喘吁吁，落后了一大截。田中首相走过一个个相隔几十米远的烽火台，打破了只登到第三个烽火台的计划，一直登上了第四个烽火台。所以，日本和外国记者报道说，“田中远远超过了尼克松”，因为尼克松总统同年2月游览长城时只走到第三个台。有的说，这象征性地暗示了田中发展日中关系的决心。

站在长城上的田中首相，环视着连绵起伏的山峰，抒发感想说：“雄伟啊，实在是雄伟！因为它有6000公里，而且是全凭人力。为建设它，多少人流了汗。现在看到了，感到了人类的伟大，有了切身体会。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这位建筑师出身的首相还说：“他们为后代人发展了高度的几何学，为人类作出了贡献。”游长城时，田中只穿着西装，大平外相却套上了风衣。对大平外相来说，今日长城之游虽说也是平生之梦，但他只登上第一烽火台就停下脚步。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几乎全被“谈判”二字占据了。虽说双方已谈定实现邦交正常化，但联合声明尚未定稿，恢复邦交的大任有待完成。大平站在长城上，心绪纷繁。为寄托恢复邦交的一腔热情，他赋诗一首：

长城蜿蜒六千里，汲尽苍生苦汗泉。

始皇坚信城内泰，不知抵抗在民心。

山容城壁默不语，荣枯盛衰几如梦。

提及诗，还有一段趣话：游览长城之前，田中同大平约定赛赋汉诗。吃早餐时，田中问：“作出来了吗？”对大平发起了先发制人的进攻。对此，大平回敬说：“还没参观，怎能作？”又挖苦地说：“首相脑子里已经想好了。”首相不示弱地反击说：“大平先生早在从羽田机场起飞的飞机上就作出来啦。”

平时就以能吃自诩的大平外相，到了金风送爽是北京，食欲更大，看上去脸也稍稍胖了，红光满面。来长城之前的早餐，大平外相照样吃了很多。田中首相见了说：“真能吃啊！我无论如何也吃不了那么多啊。”外相回答说：“没办法，太好吃了，不能不吃。”首相说：“啊，真是来者不拒啊！”

在来北京的飞机上，大平外相曾说过：“要是吃胖了回去，夫人就会生气。所以，我要尽量注意。”可是，来北京这几天来，他似乎把这些话忘到脑后了。他吃得多，固然是因为中餐可口，也还因为每天绞尽脑汁，消耗很大。他的秘书森田一后来回忆说，在北京，“说是首脑会谈，实际上主要是

在周和大平之间举行的。具体问题，则是通过姬与大平会谈解决的。如参观长城那天，姬外长与大平外相往返时同坐一辆车，不少时间都被用作‘车中会谈’了”。

第三次会谈

27日 下午4时15分，中日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谈。

田中首相比预定时间稍迟了些，4时20分才到。田中兴致勃勃，说：“今天让我们看了万里长城等许多美好的地方。”周总理答：“中国有一句老话，‘不到长城非好汉’嘛！”全场人都笑了。

会谈前，周总理谈起了田中首相得意之作《日本列岛改造论》，很熟悉他说：“万里长城有6000公里长，而《改造论》计划修6000公里长的高速公路。”

田中首相听后，十分高兴，立即说道：“计划到1985年修建9000公里。日本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改造日本列岛有困难。今天，我看到了万里长城，更有信心，我想，改造是可能的。”

周总理边听边点头，并谈起了有关长城的历史：“开始，长城是一段一段地零散修的。在秦始皇时代连成整体，以后又进行了加工和修建。如果在现代修，那会修得更快。”

田中首相充满信心地说：“长城的历史表明，什么事只要人类想干，就能实现。我相信，现代中国还会创造出许多宏伟的工程，在技术上取得巨大的进展。”

正式会谈主要谈了国际问题，双方互相介绍了各自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

会谈结束后，日方发言人二阶堂向记者发表谈话。他说：首脑会谈在和睦的气氛中，就整个国际形势进行了交谈；关于两国间的问题，未必能说通过首脑会谈都达成了协议，但是，双方在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着会谈，正在接近一致。

会见毛泽东主席

9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双方从8时半开始，进行了一小时认真、友好的谈话。

这次会见的時間，对日方来说是一项临时安排。会见前半小时，周总理来到国宾馆拜访田中首相，请他们去见毛主席。

会见在毛主席住处一问四周摆满了书籍的会客室里进行。寒暄中，毛主席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日语，气氛活跃。话题从中日两国的交往史，谈到两国政府间打交道解决两国关系，从国际形势谈到中、美、苏、日关系，从中国史谈到日本的政治制度和选举，从日本天皇谈到中国唯一的天皇——唐朝第三代皇帝、武则天的丈夫高宗，从马克思主义谈到佛教和思想文化的传播，从四书五经谈到家庭，从北京风味菜、龙井茶谈到茅台酒，从读书谈到毛主席的幼年时代。

9 时半，会见结束。毛主席指着堆积如山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毛主席指着《楚辞集注》六卷说：“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周总理把它从书橱取下，送给了田中首相。田中首相紧握毛主席的手，不住地点头，说：“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那么，祝您健康长寿。”

毛主席一直把客人送到走廊中间。

会见结束后，二阶堂向记者吹风，破例地介绍了毛主席与田中首相的一些对话。二阶堂说，会见伊始，毛主席就风趣地说：“你们吵架吵完了吗？”

“不，不，谈得很融洽。”田中答道。

毛主席微笑了一下，说：“不打不相识啊。”

二阶堂还作了如下介绍：

毛：（指着在座的廖承志）他是在日本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中：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他如果参加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

毛：听说田中先生不喜欢吃西餐，在夏威夷吃的是日本饭菜。

北京的饭菜怎么样？

田中：哎呀，吃得太好啦，还喝了很多茅台酒。

毛：喝多了可不好啊！

田中：有 65 度……

毛：75 度哟，谁告诉错了吧。

毛：在日本要搞竞选，不容易呀。

田中：25 年里搞了 11 次选举。每次选举都得搞街头演说。

毛：可要当心啊。

田中：不跟选民握手，是很难取胜的。

毛：国会怎么样？

田中：很费神，一出差错，就得解散，进行大选。

毛：日本不容易呀。

二阶堂在介绍情况结束时说：“毛主席同日本代表田中首相握手，难道不意味着解决具有历史意义的课题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吗？”

日本新闻媒介在这次会见后，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方面安排田中首相同毛主席会见，说明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事实上已达成协议。

毛主席把 13 世纪出版的朱熹注释《楚辞集注》翻印本送给田中首相，引起了日本新闻界极大的兴趣，纷纷评论说，毛主席选送此书为礼物有三层意思：一是挑选中国古代的爱国诗人屈原和他的诗集来赞扬田中首相的爱国精神，用以告诉日本人民，田中首相正在完成的任务，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二是表示知道田中首相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对田中首相来华期间赋汉诗一事给予评价；三是表示赞赏田中首相在来中国之前对访日的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说过的一句话。据报道，当基辛格问田中为什么要急于访华时，田中明确答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

第四次会谈

第四次首脑会谈于 28 日下午举行。

周总理一坐下，就对大平外相说：“听说田中首相让大平外相作汉诗，作好了请让我拜读一下。”

大平外相听了，有点难为情地说：“不值得一看。”

周总理进而说：“不能那样说吧，你好像读过中国古典文学。”

外相更不好意思了，谦虚地说：“只不过是排列了一些汉字而已。”

大平外相的话引起一阵笑声。

接着，周总理又问二阶堂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先生怎么样？”

“我可没有这个本事。”二阶堂答道。

周总理又说：“听说田中首相书法好，你们两位也是这样吗？”

大平和二阶堂两个人急忙摆手否认。

谈到书法，周总理问田中首相：“明天联合声明签字，首相用毛笔还是钢笔？”

田中说：“用毛笔。”

周总理笑着说：“我被将了一军，我现在一般用铅笔和钢笔写字，不大用毛笔，”他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解释说，“如果用毛笔，必须悬起臂来写。我在延安时从马背上摔下来，这只右手负了伤，右臂就伸不直了”。

周总理接着说，“因右臂不能放直，照相时一般把手放在腰间，不了解情况的人说我摆架子，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挥一下手说，“打乒乓球也是左手好使”。

杂谈过后，双方就在外长一级进行磋商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最后达成了协议，并一致同意于 9 月 29 日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谈定联合声明之后，周总理对田中首相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接着，周总理引《论语》之句，题下“言必信，行必果”6 个大字，赠给田中首相。

田中首相接受后，也援引日本飞鸟时代的为政者圣德太子（574—622）的话，挥毫题了“信为万事之本”几个大字，郑重地回赠周总理，表达了他信守诺言、恪守联合声明的决心。

举行答谢宴会

9 月 28 日晚，田中举行答谢宴会。6 时半，宴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演奏的日本民谣和中国乐曲声中开始，宽敞的宴会厅里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田中首相的表情与刚抵达北京时迥然不同，其言谈举止都显出了完成邦交正常化使命后如释重负的轻松。

宴会主人田中首相登上讲坛致祝酒词，他强调“邦交正常化是走向明天的第一步”，表示要以这次访问为开端，进一步促进相互间的交流，用“友好的纽带”把日中两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不一会儿，周总理以有力的步伐登台祝酒。他对应邀参加宴会表示谢意，并强调指出田中首相访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应当归功于我们两国人民”，他代表中国人民，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周总理祝酒时，向分坐在五张桌子旁的日方代表一一碰杯，当他看到坐在大厅中央的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安田佳三，便大步走上前去，同他深情地干杯，对多年来为加强两国间来往、促进邦交正常化作了艰苦努力的日中备忘录贸易界的朋友表示感谢。

田中首相来华访问前夕，周总理曾会见并宴请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冈崎嘉平太、松本俊一、大久保任晴和安田佳三。当时，周总理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靠客观形势的发展，也是靠人的努力。这中间，你们各位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中国有句名言，叫做‘饮水不忘掘井人’，你们各位就是掘井人。”周总理在谈话中还高度评价了已故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高碓达之助以及藤山爱一郎、川崎秀二、竹山祐太郎等老朋友为促进恢复邦交所作的贡献。

田中首相的答谢宴会很丰盛，菜单中包括中国珍肴鱼翅。但对中国客人来说，最不寻常的菜是日本式土豆泥，还有田中首相家乡产的名酒“朝日山”。每位客人面前还摆放着一个特制的木匣，里面放着日本著名的九谷陶器大师松木佐一先生制作的酒杯，直径约6厘米，高约5厘米。这是田中首相送的礼物。席间，宾主频频举杯，对饮着芳香甘醇的日本酒，欢声笑语不绝。

宴会临近结束时，田中首相举起九谷陶杯说：“庆祝邦交正常化，用这样的杯子虽然见小，但多喝几杯，还是能喝很多的，请总理带回去吧。”

大平外相接着把话题引到今后两国关系上，意味深长地说：“开始时小，渐渐搞大吧！”

签署中日联合声明

9月29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发表了。声明庄严宣布从即日起结束两国间存在了20多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是日上午10时18分，中日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并排步入大厅，在一张铺着暗绿色台布、插着两国国旗的长桌前就座。姬外长和大平外相分别在周总理的左侧和田中首相的右侧就坐。他们身后并排站着两国代表团的成员。

周总理和田中首相首先在茶色封面的联合声明文本上签字，接着由姬外长和大平外相分别签字。交换后，先由外长、外相签字，再由总理、首相签字。

10时24分，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再次互换联合声明文本。两位领导人紧紧握手，共祝两国建交。站在他们后面的官员们热烈鼓掌。当两位领导人分别同对方官员握手时，穿雪白上衣的服务员端来了香槟酒。双方互相敬酒，一饮而尽。

这时，周总理高兴地说：“这样，就揭开了中日关系新的一页！”

田中首相也兴奋地说：“今天就到这里，不再有会了，痛痛快快地喝吧！”在场的人听了，一起大笑。

11时29分，仪式完毕。日方根据同中方的约定，由大平外相立即在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平严肃地宣布，由于两国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作为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所表

明的立场的重要补充，大平以极其明确的语言宣告废除日蒋条约。他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但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联合声明发表后，中国人民欢欣鼓舞，日本朝野热烈欢迎。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在联合声明发表后，立即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支持，指出“这项声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大大改变了历史潮流”。日本内阁会议迅速予以通过。社会、公明、民社等在野党、各日中友好团体、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对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和拥护。

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说，“29日，在日本各地欢迎日中建交的声音犹如洪水一般波澜壮阔地扩展着”，“街头电视机前人山人海”，“人们纵情欢呼‘好啊，好啊’”。

日本舆论界普遍欢迎日中建交，指出“日中建交为日中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它是本世纪的一个巨大事件”，同时评称，联合声明贯穿着“向前看”的态度，强调发展今后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日本舆论还注意到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条文，纷纷赞扬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民的真诚友好态度。

不少日本人士看到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条文后，感动地说，日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和人民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要真诚地对中国给予经济合作，有人则在报纸上建议日本政府给中国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广州的高速铁路，或建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以表示对中国的谢意。

联合声明发表的当天，日本舆论还就日本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对日本外交的意义发表评论，认为它使日本真正“结束了战后时期”，走上了“自主外交”的道路。

大平外相在谈及日中建交的意义时也指出：迄今为止，以为只要听从美国的吩咐就万事大吉，这种想法行不通了，时代变了，日本进入了必须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进行思索的时代。

上海一夜

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方代表团兴高采烈。当天中午，田中、大平跟随员们围坐在一起，拿出从日本带来的矿泉水、咸梅和佃煮，共进午餐。

在餐桌上，最健谈的仍是田中首相，他雅兴所至，津津有味地向在座的人披露了自己的一段趣史：老早以前，家乡新潟县一个镇子上有位美貌的姑娘。有一天，她突然失踪了。于是，人们传说一定是被田中拐跑了。田中听了这莫须有的“罪名”，泰然处之，高吟出一首绝句来：“丽花杨柳任折去，风光依然明媚也。”田中的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29日下午1时35分，田中首相一行结束了在北京的全部日程，由周总理、姬外长陪同，乘专机去上海访问。

在飞机上，周总理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相对而坐。片刻过后，疲劳了的田中首相便进入梦乡，鼾声如雷。

指日蒋条约。

用酱油加糖煮的小虾、小鱼。

下午3时40分，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当晚，上海市举行欢迎宴会。因中日两国已建交，宴会的气氛格外融洽、热烈。周总理向客人们祝酒说，“我希望同你们畅饮通宵，但是我想，我应该为你们的下次访问留有余地”。

大平外相在宴会上也显得非常轻松。据说他每次出国访问，都不希望夜间的宴会搞得太长，所以，往往指示随行的官员尽早结束。但今天却是个例外。他想到完成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大任，兴奋得难以自持，离开他的座位祝酒，一连喝了好几杯“茅台”。这对素不嗜酒，连喝几口啤酒都要脸红的大平外相来说，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在欢乐的宴会上，大平外相为日中关系的今天高兴，更为美好的明天祝福。想到两国今后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还要签订一系列协定，他高举酒杯同周总理、姬外长干杯，中国诗人李白的诗句油然浮现脑际：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席散回到下榻的锦江饭店以后，大平外相仍然很兴奋。他的秘书森田一开始还担心他的健康，在床边照看了好大一会儿，直到他安然入睡，才放心地离去。

9月30日上午9时30分，田中首相的专机满载着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起飞了，很快便钻入棉絮般的云层……

这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登上了回北京的飞机。他欣慰地说，“我们和日本是两千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

满载而归

田中一行于日本时间下午1时返抵东京羽田机场。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依次走下专机同前来欢迎的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副首相三木武夫、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自民党众议员古井喜实和田川诚一、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等朝野人士一一握手。还同前来迎接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及联络处其他人员热烈握手。

田中首相在桥本干事长致欢迎辞之后，向国民致辞。他致辞完毕，前来欢迎的约800名群众中爆发出“万岁”的欢呼声。

田中离开机场，驱车径直奔向皇宫，向天皇作归国汇报。然后，又前往自民党本部汇报。接着，在临时内阁会议上说明了谈判过程和结果。在这之后，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下午4时20分开始在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大会上报告访华成果，大会对田中访华的成果表示满意。

10月4、5两日，田中分别同社会、公明和民社等三个在野党的委员长会晤，向他们说明了建交谈判的情况，并就今后的政局运营交换了意见。

10月27日，第七十届临时国会开幕。翌日，田中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发表抱负演说，就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之所以能获得解决，是“由于在时代潮流中，有国民舆论的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他指出，由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日本的外交“扩展到世界规模”，这意味着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责任加重”，“负有对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应进一步作出贡献的义

务”。

11月8日，国会通过决议，庆贺日中邦交正常化，并表示要为加深日中两国的友好、亚洲的稳定及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其后，田中利用在外交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有利时机，于11月13日解散国会，12月10日进行大选，12月22日田中组成了他的第二届内阁。

守约信诺 巨大努力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田中遵循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了巨大努力，在下野之前，同中国政府签订了贸易、海运和航空等三个实务协定。值得称赞的是，田中、大平在同中国谈判签订航空协定的过程中，排除了来自自民党内和台湾当局的阻力，勇敢地捍卫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表示了他们维持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的决心。

1973年3月，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赴任时，田中首相请他带交周总理一封亲笔信，表明了自己对发展日中友好的信念，提出了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设想，并邀请周总理访问日本，这封信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阁下：

去年9月，应总理阁下的邀请，我和大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起访问贵国，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同总理阁下亲切会晤。尔来，已经过了半年的时光。我看到总理阁下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发挥着伟大的指导力量，日理万机，谨表祝贺。

日中联合声明发表前夕，总理阁下曾表示，日中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如果对两国的友好关系抱有信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曾说，日中两国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来对待两国间的问题。现在，两国互换大使，日中关系自去年秋天以来有了扎实的进展，证明了阁下和我的共同信念。

在当前的日中关系中，有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第九条签订各种实务协定以及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问题。我愿意通过这些磋商，扎实地扩大和巩固日中关系的基础。不言而喻，随着日中两国政府间实务关系的加深和关于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的协商的进行，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同意见和一些分歧，但我坚信，如果两国政府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去对待，就一定会进一步增进两国关系，使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牢固如山。

另外，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形势下，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两国间的基本立场也会有所不同。目前，国际形势正在走向缓和，各国进行自主选择的动向正在发展，为因应这种形势，我认为我国应尽量拓宽外交幅度。还有，目前的国际经济正处于转折时期，为使国民生活建立在更加稳定的基础上，在资源、贸易等方面，我国的方针是不仅同贵国实行合作，还要同其他各国进行超越社会制度的合作。我深信总理阁下一定会理解我国的这种基本立场和方针。

我回忆起半年前，我曾表示，邦交正常化是走向明天的第一步，愿在历史的潮流中开辟新的局面。我想与总理阁下亲切会晤，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国际形势及其趋势以及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为此，我再次邀请总理阁下来我国访问。

鉴于日中两国一衣带水，两国间的交流正向各领域发展，借此机会，我愿告诉阁下，我正在研究将来日中两国政府主要成员定期在北京和东京亲切

会晤一事，以创造加深相互理解的机会。

最后，我愿表示我的信念，日中两国政府今后恪守联合声明的精神，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而合作，是有益于日中两国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福利的。

就此搁笔，祝阁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角荣

昭和 48 年 3 月 29 日

遗憾的是，田中在信中表示的对周总理的邀请及关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愿望都未能实现。1973 年 9 月 10 日，周总理在给田中首相的复信中表示：“由于工作繁忙，暂且没有时间”，不能应邀访日，而想让姬鹏飞外长先去访问。实际上，周总理已经重病在身，又是在动乱的形势下，国内也离不开他。而不等十年动乱结束，周总理便辞世不归，终未踏上他青年时代曾留下足迹的东瀛国土。

关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事，由于《中日航空协定》签订半年之后，田中因金钱来路问题受到攻击，被迫下台，终未遂愿。当时的外相木村俊夫后来遗憾地说，“如果田中不下台，和平友好条约 1975 年 1 月就能缔结”。

所幸的是，发展中日友好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相互奉行的睦邻友好政策，不会因人事变动而改变。经过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 1978 年 8 月 12 日在北京签订，同年 10 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10 月 23 日，与福田赳夫首相互换了条约批准书，标志着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也正是田中所希望看到的。

莫斯科之行

为打开日苏关系僵局，迈进了克里姆林宫门槛。然而，此行的成果很快就被苏方抹掉了。

派大平探路

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加强了田中内阁的地位，也增强了田中推行“自主多边外交”的信心。田中力图抓住内外形势有利的时机，打开日苏关系，使1956年日苏建交时未解决的悬案——北方领土问题——早日解决，缔结日苏和约。

为此，田中首相派大平外相于1972年10月21—24日访苏，同苏方举行关于缔结日苏和约的第一轮谈判。太平访苏期间，分别与外长葛罗米柯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会谈双边关系时，主要谈了北方领土问题和西伯利亚开发问题。在领土问题上，大平强调归还北方四岛（指齿舞、色丹、择捉、国后岛）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前提条件。葛罗米柯同意在和约谈判中包括领土问题，但又强调“有关北方领土问题，苏联的原则立场是不能让步的”。

在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上，柯西金表示，“从地理上看，日本是最好的伙伴”，亟欲同日本合作。大平表示，欢迎正在进行的经济交流谈判，但又强调必须先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缔结和约，把日苏关系置于稳定的基础上。

由于日苏双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各执己见，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出于各自的需要，双方都为今后的和约谈判留有余地，双方同意于1973年在莫斯科继续举行外长会谈。

灵活做法有缘由

进入1973年，田中内阁因应苏联对日本的外交攻势，在不改变抗苏政策的大前提下，开始采取一些灵活的做法。

1月16日，大平外相在亚洲调查会为他举行的午餐会上说：“归还北方领土的谈判不应同日本和苏联之间的经济谈判联系起来”，“除了领土问题以外，必须为友谊和互利来促进日本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明确表示在日苏关系上采取“政经分离”的政策。

1月27日，田中在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强调“已走上轨道的两国关系在经济、文化领域里每年都取得稳步的发展。特别是关于西伯利亚的开发，打算为其实现而努力”。

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田中内阁也改而采取了又松又紧的做法，对苏保持“弹性压力”。1月27日，自民党和公明、民社等在野党在东京联合举行有1500人参加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大会。大平外相致电支持。内阁总理府总务副长官到会讲话。大会通过了决议和宣言。虽然这次大会的调门之高和规模之大都超过以往，但官方在宣传上却大加控制，致使一向标榜“有闻必录”的日本各大报对这次集会只字不提。

3月6日，田中致信勃列日涅夫，表示希望增进“友好关系”，尽早举行和约谈判，对开发西伯利亚抱“向前看”的态度，表示愿意进行“不间断

的对话”。

3月28日，田中接到勃列日涅夫复信，信中邀请田中访苏。田中立即表示同意。

田中首相急于打开日苏关系，主动采取接近苏联的步骤和灵活的做法，是出于其外交、内政和经济上的需要。

田中政权意识到，苏联是日本的邻国，为北方领土问题同苏联搞得太僵，对其搞“自主多边外交”不利。日苏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其扩大外交回旋余地，可以在日本的对中、对美关系中增加讨价还价的资本，也可以缓解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

谋求能源来源的多元化，改变日本石油过于依赖中、近东的状况，是田中政权对苏外交的另一个着眼点。

日本缺乏资源，主要原料依靠外国进口，1972年进口的原料占世界原料出口总额的27%，而石油资源几乎全部依靠进口，1972年的石油进口量达2.14亿吨。当时，日本通产省估计，至1980年，日本的石油进口量将达3.87亿吨，因此，计划通过独立开发来保证其中30%的需要（1972年仅为8%）。而苏联的资源丰富，据估计，秋明油田地区的石油储藏量有400亿吨，另外，还有大量天然气、煤、铜和木材等资源。为对付日后的世界资源争夺战，田中指望西伯利亚成为日本石油和木材的稳定供应基地之一。

田中对苏采取灵活态度，同当时日美矛盾加剧有直接联系。田中企图以日苏缓和为筹码，提高日本在同美国进行经济谈判中的地位。

当时，日本经济的迅速膨胀，使战后形成的日美经济关系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其标志之一是，日美贸易由日本方面的大量逆差变为顺差，1972年日对美出超已达40多亿美元。为此，美国一再压日本让步，以改变日美贸易的不平衡状况。1973年1月14—15日在檀香山举行的日美经济合作委员会会议上，美方代表又强烈提出“为矫正日美贸易的不平衡”，日本“应采取激动人心的措施”。

1月19日，美驻日大使英格索尔约见大平外相时说：“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高涨，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以此要挟日本迅速采取让步措施。接着，美国总统顾问埃伯利去东京同田中内阁的官员会谈，以强硬的态度压日本政府将日元升值，以求削弱日本的出口势头。6月，日美经济委员会又重点讨论了如何解决贸易自由化和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使日美经济贸易摩擦空前激化。

田中着力开展对苏外交，还有其内政上的原因。

田中上台后，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发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他上台后第十个月，即1973年4月，东京的零售物价指数比历史上最高的上年同期上升10.1%，其中有64种消费品的价格上涨20%以上。这种状况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在野党的指责，社会舆论的批评也很强烈，致使日中建交引起的“田中热”有所冷却。据《朝日新闻》的民意测验，1973年4月，田中内阁的支持率已从1972年8月的62%降为27%。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内以福田赳夫为中心的反对派趁机活跃。田中通过缓和日苏关系，谋求在外交上继续打开局面，以转移国内视线，提高其威望，稳定其政权。

日苏关系的接近，也是美苏关系缓和的结果。当时，美苏关系继60年代初的第一次缓和之后，正出现第二次缓和，使处于美苏关系延长线上的日苏关系的改善有了可能。这对田中内阁来说，当然是一个开展“自主多边外交”

的大好机会。

亲赴莫斯科

1973年10月7日，田中首相偕大平外相等在访问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后，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开始了对苏联的正式访问。

这次访问是日本政府首脑17年来对苏联的首次访问。1956年10月，日本首相鸠山一郎访苏，同苏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举行会谈，签署了《日本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宣言》，宣言宣布：结束日苏战争状态，双方互派大使，互不干涉内政，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立即交还被扣押在苏联的日本人，苏联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双方签署的渔业条约和海难救助协定生效。此外，还特别谈到了领土问题。双方同意“两国在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之后，继续进行关于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苏方表示，在和约缔结之后，把齿舞群岛和色丹岛归还日本。但由于日方强烈要求归还国后、择捉两岛，终未达成协议。这样，鸠山访苏虽然恢复了日苏外交关系，但却留下了领土悬案。

但是，1960年1月日美安保条约修改后，苏联在北方领土上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苏方通知日本，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出现了不可能交还齿舞、色丹岛的新情况，只有在日苏和约缔结和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日本之后，才能交还。后来，苏联索性不承认日苏间存在领土争端，声称“领土问题已经解决”，直到1972年1月苏外长葛罗米柯访日时为止。因此，田中首相这次访苏能否在政府首脑之间重新确认日苏之间有领土悬案，并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他是个严峻的考验。

田中十分明白此行的分量。他出访前作了充分的准备。他通过自民党的活动，使国会作出了要求收回北方领土的决议，并促进了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国民运动的高涨。

田中在访苏之前，首先访问了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取得了英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支持，并听取了法国和联邦德国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

谈判桌上的较量

田中访苏期间，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了四次会谈，大平外相与苏外长葛罗米柯进行了一次协商。

田中访苏之前，苏联即为会谈定了调子，想把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问题作为主要议题，但会谈一开始，日方就提出了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田中在8日上午举行的第一次最高首脑会谈中，直接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强调，“归还北方四岛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必要前提”。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时，又提议讨论北方四岛问题，强调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不能再拖的问题”。在8日晚举行的宴会上，田中公开强调，欲缔结和约，就必须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悬案”。

由于苏方不同意，田中在9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同大平外相一起，又一次提出了将北方四岛作为议题的要求。当晚，田中在宴会上讲话时更明确指出，日苏间的“最大悬案”是“领土问题”，但苏联还是不答应。

三次会谈，双方立场僵持，气氛紧张。勃列日涅夫和田中两个人时而站

起，时而坐下，勃列日涅夫拍着桌子，唾沫四溅，田中则大声还击。由于会谈气氛不好，原定于9日下午举行的第四次会谈取消，苏方还突然取消了勃列日涅夫出席田中答谢宴会的安排。

田中为压苏就范，竟下定决心不惜谈判破裂的决心，他通过下属官员转告苏方：“如果做了最大的努力之后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就不要发表联合声明了。”

田中的压力在10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谈（原定的第五次会谈）中总算显出了效果，苏方被迫同意北方领土问题是“应该通过缔结和约解决的悬案”。而且，将这个问题通过如下表述写进了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双方认识到，解决第二次大战以来的各项悬案，缔结和平条约，将对建立两国间真正的友好关系作出贡献，并就有关和平条约的内容进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在1974年适当的时候继续进行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关于经济合作和开发西伯利亚问题，苏联为了取得进展，在会谈中作了两个小时的说明。由于双方都需要，联合声明称：“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加强经济合作，包括开发西伯利亚天然资源的合作。”但是，田中出于安全和外交上的考虑，并未真正下定与苏联进行合作的决心。他拒绝了苏联关于签订日苏长期经济合作协定的要求，并坚持把民间谈判作为政府间合作的前提。在田中的坚持下，联合声明仅称，“两国政府将促进实现这种经济合作，鼓励日本公司同苏有关机构订立合同，促进它们正常地和及时地履行这些合同”。考虑到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和减少风险，田中还针对苏方只希望与日本单独合作的意图，迫使苏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入“日苏两国在上述各个领域内，特别是在开发西伯利亚天然资源方面进行的经济合作，并不排除第三国的参加”的内容。

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会谈中苏方设想的重要议题，但田中坚持不解决北方四岛，就不讨论亚安体系的立场，强调即使领土获得解决，为实现这一设想也须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和美国参加。结果，联合声明中只字未提亚安体系，而说双方认为，“在尊重亚洲国家独立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亚洲国家自身的努力，是对亚洲和平和稳定的重大贡献”。

不牢靠的成果

访问结束前，田中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极力宣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成果。田中说，会谈触及了这个“在迄今1/4世纪里甚至没有被当作议题的困难问题”，他“理所当然地明确陈述了日本的意向”，“这个问题是日苏间最大的问题，这一点得到了理解。这个问题应当作为缔结和约谈判的议题，解决得越早越好。日本不准备再等25年才归还北方四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无助于发展两国关系和国际关系”。

大平外相在归国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把北方领土问题纳入具体谈判的场所，获得成功”，但又说这次访问“未能完全找到解决领土问题的线索”。

田中这次访问，虽然在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发展，但他敢于抗苏的强硬态度，博得了国内好评。日本财界巨头特别称赞田中在领土问题上表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政敌福田赳夫也对田中对苏的“勇敢、积极”的态度表示赞赏。日本新闻界评称，苏方从不承认存在北方领土问题

到被迫同意“第二次大战以来的各项悬案”中包括北方领土问题，是田中对苏外交的一大成就。

然而，田中没有料到，至 70 年代后期，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态度又转趋强硬，从 1973 年田中访苏时发表的日苏联合声明的立场上后退了。

针对这种情况，日外务省当局向报界透露了田中当时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部分记录，以求佐证。记录是这样的：

田中：可以确认各项悬案中最重要的是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吧？

勃列日涅夫： a 。

田中：那就确认喽。

勃列日涅夫： a。

但苏联方面并不承认上述内容。于是，田中访苏的“成就”被抹掉了。日方当然也不会同意。田中下台后，历届内阁仍坚持要求苏联回到 1973 年田中—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基点上，至今不变。从此不难看出，田中访苏，为日本后来的对苏外交敷设了道路。

a, 俄语词语，意为“是”、“对”。

东奔西走

为拓展经济、资源外交，四出奔波，耗费了不少精力，但效果甚微，还踩了老虎的尾巴……

频繁的出访

田中执政期间，为开展其自主多边外交，除访华、访苏外，还有：

1972年8月访美，与尼克松总统在夏威夷举行会谈；

1973年7月访美，与尼克松会谈；

1973年9—10月，访苏前先行访法，与蓬皮杜总统会谈；访英，与希思首相会谈；访问联邦德国，与勃兰特总理会谈；

1974年1月访菲，与马科斯总统会谈；访泰，与讪耶·探玛塞总理会谈；访新加坡，与李光耀总理会谈；访马来西亚，与拉扎克总理会谈；访印尼，与苏哈托总统会谈；

1974年8月，访问南朝鲜；

1974年9月访墨，同埃切维利亚总统会谈；访巴西，同埃内斯托·盖泽尔总统会谈；访美，同福特总统会谈；访加拿大，同特鲁多总理会谈；

1974年10—11月访新西兰，同罗林总理会谈；访澳，同惠特拉姆总理会谈；访缅，同奈温总统会谈。

田中一系列出访活动，旨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的情况下，谋求巩固和加强其经济大国地位，在政治上，在不伤害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争取一些自主权，以适应世界的多极化趋势。

尤其应该看到，石油危机爆发后，资源小国、贸易立国的日本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日本的能源形势极为紧张，日本迫于形势实行能源来源多元化政策。因此，在资源和商品市场上，都需要作相应的政策调整，以缓解日本同不少国家的尖锐矛盾和创造稳定的资源进口和商品出口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田中外交的经济外交色彩十分浓厚。

田中对西欧的访问是1962年11月池田勇人首相访问以来的第一次。60年代日欧之间的贸易量不大。70年代后，彼此之间在货币和贸易上的关系迅速密切起来，经济摩擦出现。为此，田中访问西欧，其寻求理解、加强合作的意图十分明显。除此之外，田中还企图利用这个机会，确立日本独自の能源来源渠道，这从田中同西欧各国首脑的会谈内容中看得很清楚。

田中访法时，达成的主要经济合作协议有：推进共同开发石油资源的合作；共同开发在第三国的铀矿；研究签订日法海运协定。尤为重要的是，田中表示希望引进法国采用的浓缩铀的气扩散方式，得到蓬皮杜总统的同意。

田中访英期间，就日英联合开发北海油田同希思首相达成了原则性协议。

其后，田中访问联邦德国，为研究双方在提供天然资源和能源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成立资源联合委员会，同勃兰特总理取得了一致意见。

田中对东南亚各国的访问，其经济意图也十分明显。当时，日本的经济扩张在东南亚表现得最为明显。田中此行，一方面为了缓解因经济扩张引起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旨在进一步强化同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田中访问印尼期间，通过提供液化天然气成套设备和在建设石油基地、建设水库等方面的

合作，取得从印尼稳定供应石油等资源的报偿。

然而，田中对东盟各国的访问并不顺利，他在各地都遇到了激烈的反日示威。尤其是在印尼，群众高呼“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经济动物见鬼去吧”等口号，使田中一行十分难堪，以至于田中回国时，不得不用印尼空军的直升飞机把他送到机场。

东盟各国人民的反应，给田中上了一课。他回国后，立即指示重新研究日本对东盟国家的经济政策。后来，他在强调变民间企业主导为政府主导，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还强调“要进行文化、医疗、青年等方面的交流。而且，这些交流也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而不能一厢情愿地去搞”。

石油危机后的反思

经历了 1973 年的石油危机后，田中怎样看待日本所处的环境？他的对策又是什么呢？这可从他 1974 年 1 月 21 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找到答案。他说：“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站起来，完成了复兴经济、自立经济和国际经济‘三级跳’式的发展，现在，作为主要工业国家之一员，在国际上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但是，“今后的资源、能源形势，从数量和价格方面来说，都是很严峻的”，“政府要摆脱迄今那种偏重于石油的能源体系，促进原子能的开发利用，重新看待开发水力、煤炭等国内资源的可能性，还要以长远的眼光，大力推进太阳能等丰富而无公害的新能源利用技术的开发研究”。“与此同时，资源、能源的回收、再生利用工作和向省资源型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作，也要一并进行。”

田中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越发纷繁多样，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在摸索建立新的秩序，我国所处的环境之复杂和严峻，是战后以来不曾有过的。我继访美、中、西欧和苏联之后，最近又访问了亚洲五国，这是为了看清楚我国外交应采取的方针和我国对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

“在访问期间，我切身感受到当地对我国同亚洲各国的关系，以及对我国企业的经济活动的不满和批评。”“正确地把握国际协调的含义，并将此体现在国家的政策和每个国民的行动上，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容易。1 亿日本人作为单一民族在岛国中生活，既没有人种的对立，也没有宗教和语言的纷争，得以将其能量专注于复兴和建设上。这种情况，一方面可以认为是优越性，同时又产生了另一面，即在国际协调乃至与外国的交往上，仍然有很多值得反省和向别国学习的地方。日本在战败之后，致力于从废墟上复兴经济，采取了封闭性的追求国家利益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经济复兴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天经地义。但是，在国际上行不通，而且还很可能成为祸根。在‘人’的方面，我是这样呼吁大家要重新估量自己的，在‘物’的方面，通过访问时与各国首脑的会谈，我更加感到，我国与亚洲各国是互补关系。我国需要亚洲各国的帮助，亚洲各国为建设各自的国家，也对我国的合作寄予莫大的期待。为响应各国的期待，我国必须进一步改变包括提高政府开发援助质量在内的对外援助政策。”

田中接着说：“为确保资源，政府在国内致力于改变经济的结构，以适应资源供应有限的新事态；对外，则为确保资源的稳定供给和来源的多元化而锐意努力，但是，这些努力还不足以适应中东战争后出现的新情况。我国希望早日实现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并正在为此尽最大努力。”

田中还指出，“推进关于联合开发资源和研究新能源等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关于这些问题，去年我在同各国首脑会谈时，也已进行了积极而具体的对话。

“同美国的牢固的相互信赖关系，是我国展开多边外交的基础。为此，政府不仅大幅度地改善了同美国的贸易收支显著不平衡的状况，而且，为保证世界经济的发展，正为增进两国间互利的贸易经济关系，力求贸易扩大平衡而进一步努力。

“同欧洲之间，虽然存在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但还不能说有密切的具体合作关系。去年访欧的结果，在广泛的领域里，大大促进和加强了同各国的对话。今后，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我国外交的范围。”

在这次国会之后，田中继续开展他的经济、资源外交。1974年9月，他访问了墨西哥、巴西和加拿大，就开发墨西哥的原油、开发亚马孙河流域和开发西加拿大的塔尔桑多，与各国首脑取得了一致意见。进而，田中于同年10—11月访问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缅甸，就开发天然气和确保铀资源问题，同对方达成了协议。

为了解田中开展经济、资源外交的动机，不妨再引用1974年3月27日他在日本广播协会（NHK）综合电视台上讲的一段话。

他说：“70年代，在美苏两个阵营仅仅是军事问题占很大比重的世界上，作为东西方关系的新接点，又出现了经济问题、技术合作问题，进而是资源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是两国之间所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我国虽被称为经济大国，但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缺乏，作为经济动力的资源几乎全部依赖国外。想到这些，我对我国的将来，总抱有一种不安。中东各国在资源问题上开始表现出自我保护色彩。如何使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在保持协调的情况下稳定地供应，能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在开发资源时如何能考虑到世界的利益，而不是只考虑本国的利益，最根本的是保持一个和平和繁荣的国际社会，使国际关系协调，对我国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因此，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至关重要。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对国外搞开发合作是另有所谋的，而不是仅仅考虑到获得资源。”

收效甚微 后果严重

田中执政期间，虽然为开展经济、资源外交四处奔波，花费了不少精力，但效果甚微。究其原因，当然与他的政权中途夭折有关，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由于他在1974年底就下台了，他在当年施政演说中提出的许多方针及其后提出的设想，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田中的做法并不是美国所欢迎的。以资源外交而论，田中的基本想法是摆脱单纯依赖美国所控制的国际石油资本，并在中东外交上独树一帜，这意味着修正战后日美关系的轨道，尝试走自立之路。对此，美国当然不能漠然视之。这从美国政府高官当时不断对田中政权的自主政策发出警告的事实，不难窥出美方的心境。至于后来使田中遭受致命打击的洛克希德案件是否属美国对田中的报复，日本舆论界议论纷坛，说法不一，至今仍无定论。但洛克希德案发难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岂不发人深思？

壮志未酬

风云莫测，前途多舛，从政 25 年的心血结晶——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中途夭折。

宏愿美意

《日本列岛改造论》（以下简称《改造论》）是田中问鼎首相宝座的对内政策设想。它发表于 1972 年 6 月，当时正是自民党内几雄争夺下届政权火花四溅的时候。《改造论》发表时，田中为阐明其意图，写了这样一篇“代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世界各国的近代经济发展史表明，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大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是通过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人口的流通，即通过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中实现的。人们从农村流入城市，追求高收入和方便的生活潮流，成为构筑今日现代文明的动力。日本也不例外。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国的工业化是与城市化成比例发展的。

“然而，由于昭和 30 年代（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至 60 年代前半期）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和人口过度地向东京、大阪等太平洋沿岸地区集中，终于形成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一方面，庞大的城市恰似一个坩埚，因盛得过多而发生故障，人们挣扎、焦灼；另一方面，农村则因青年减少而使人口老龄化，正在失去发展的动力。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使许多人只好蜷缩在狭小的公寓里，而享受不到上山追逐野兔、到河边钓鱼的乐趣。这样下去，欲将日本民族的优秀资质和传统传给子孙后代，将是很困难的。

“以明治百年史为一个阶段来看，人口和产业集中于城市，已经从有利变为有弊。现在国民的迫切要求是，同时消灭过密和过疏的弊病，以便将来能够在美丽而舒适的国土上，高枕无忧地过富裕的生活。为此，就要在整个日本列岛大胆改变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中的潮流，把民族的活力和日本经济的余力引向全国，实行工业的重新布局，充分运用知识和智慧，建设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形成信息通讯网络。以此作为杠杆，就一定会消灭城市和乡村、外日本和里日本的差别。

“另外，日本能否在开放的国际经济社会中和平地生存，并继续走国际协调的道路，可以说取决于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积极改革。从这种意义上说，唯有日本列岛的改造，才是今后内政的头等重要课题。我将在全国推广产业、文化、自然相融合的区域社会，为实现让所有的人都能为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的日本社会而竭尽全力。”

25 载的心血结晶

《日本列岛改造论》虽是田中在竞选中作为政策纲领提出的，但并非是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从政 25 年的心血结晶。

《改造论》发表前，田中反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研究，并积累了实践经验。《改造论》发表前，田中于 1968 年发表了《城市政策大纲》。这是一

外日本指太平洋沿岸地区，里日本指日本海沿岸地区。

篇为解决城市和土地问题而提出的纲领性文件，阐明了解决的原则、办法和前景，是《改造论》的蓝本。

实际上，田中的上述思想始于战后初期。1947年4月，初次当选为众议员的田中，参加了国土计划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于1948年改组为建设委员会，并于1949年10月设立了地方综合开发小委员会，田中担任了小委员长。

田中当时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地方综合开发计划应作为综合国土计划的一个环节来规划，要从全局出发，制定各地的开发计划，而决不能从各地自给自足出发。另外，各地的开发计划，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综合考虑各种资源的统一利用，即治山、治水、灌溉、水运、发电、交通，进而要考虑它将对生产、社会及文化等领域产生的影响，并要通过计划的实施，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制定计划时，要包括农村计划，要充分考虑给农村以文化，而不要只偏向于城市”。

田中在上述报告中阐发的思想，可谓《改造论》的“根”。

从法律角度看，在田中作为地方综合开发小委员会小委员长提出上述报告之后，《国土综合开发法》（1950）和《电源开发促进法》（1952）应运而生。这两个法律的制定，使《改造论》初具雏形。

接着，田中又作为小委员长带头制定了《道路法》及有关实施法（1952年制定，1953年公布）。以田中为中心制定的《关于道路整備费的财源等临时措施法》也是1953年通过的。

在法律完备的基础上，《道路整備五年计划》于1956年开始实施，它使日本的高速公路、基干公路和生活公路迅速发展起来。修筑道路的费用在其后15年内增加了100倍以上，实现了道路修筑费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人称“战后日本经济的增长始于道路的建设”，指的就是这个。

在此前后，田中还热心促成了作为《改造论》前提的议员立法。1950年制定的《首都建设法》，1956年发展为《首都圈整備法》，根据同样设想，后来又制定了《近畿圈整備法》和《中部圈整備法》。

另外，基于与《北海道开发法》（1950）的同样考虑，又相继制定了《东北开发促进法》（1957）、《九州地方开发促进法》（1959）以及《四国地方开发促进法》、《北陆地方开发促进法》。

为在全国范围内使工业得到均衡的、良性的发展，还制定了《低发展地区工业发展促进法》（1961）、《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1962）和《工业整備特区整備促进法》（1964）。

欲发展工业，保证水资源是一大前提。为此，田中带头促成了《河川法》的修改（1951）。在此基础上，1964年该法又进行了全面的修改。1960年前后，田中担任自民党水资源对策特别委员长，其间，作为政府的提案，制定了《水资源开发促进法》，继之，又制定了《水资源开发公团法》、《治水特别会计法》。

这些立法是日本从战败的乱摊子上建成今日日本的法律保证。田中的《改造论》可从这些立法本身寻其原型。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法律是在田中的设想和努力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些法律是：《中部圈开发整備法》（1966）、《国土开发干线公路建设法》（1966）、《城市计划法》（1967）、《城市再发展法》（1969）、《全国新干线铁道整備法》（1970）、《汽车重量税法》（1971）、《汽车重量让与税法》（1971）、

《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1971）、《工业重新布局促进法》（1972）、《工业重新布局产煤地区振兴事业团法》（1972）。

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走上高速发展轨道，经过十余年的工夫，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于东京、大阪等太平洋沿岸地区，以至出现了过密过疏的严重问题。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人、物、钱过密，而农山渔村年轻人大量流入城市，留下了老年人，失去了生产的能力。1963年底再度担任大藏大臣的田中，鉴于这种情况，对采访他的新闻记者吐露说，“有一天，我要制定一个改造日本列岛的计划”。

《日本列岛改造论》的蓝本

由于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问题日益突出，1965年以后，朝野政党都把城市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提了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于1967年3月16日成立了自民党城市政策调查会，田中任会长，共有87名众、参议员参加。

调查会成立那天，田中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将城市政策与国土政策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办法和展望前景。

田中指出：“城市问题现在是政治的焦点，国民的课题。人口、产业、文化向城市过度集中的结果，地价飞涨，住宅不足，交通恶化，各种公害正破坏着居民的生活。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今后20年内，总人口的75%将集中于太平洋沿岸地区，从国民经济的发展看，将进入不能漠然置之的阶段。”

他说，“城市政策调查会的使命是，从正面提出这个课题，找到解决的线索，并付诸实施”。

田中指出：“人口向城市集中，是世界性倾向，我国战后，这种倾向比其他国家突出。究其原因，看来在于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名义下，以东京、大阪为中心进行了集中投资。集中投资的确带来了我国的发展和繁荣，但事实表明，它对现在的国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已经不起高效投资作用了。

“现在，已经到了针对全国性的城市化倾向，来考虑真正有效投资的时候了。”

田中指出：“作为考虑具体的城市政策的前提，所需要的是，首先要明确目的，并探索手段。要在对未来作出预测的情况下，着手改变现状。必须有符合实际的问题意识，全面改变思维。

“其一，为解决局部，要看全局。过密和过疏是问题的两个方面。改造城市和发展地方现在是同义语。劳动人口正潮水般地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与粮食的国内自给相关联，保证和稳定用于再生产的劳动力，是农业面临的严重问题。

“为同时解决过密和过疏的问题，必须根据我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人口众多的先天特点，反其道而用之，考虑均衡的国土综合发展计划。改造城市，要在解决眼前问题的同时，着眼于二三十年之后国家建设的布局，而不能漫无目的地进行。

“其二，应舍弃陈旧的有效投资观念，建立新的先行投资观念。交通拥挤则筑路，水不足则修水库。但是，一旦路修好了，交通便利了，人口、车

辆、工厂也越来越向城市集中，这是经济规律。按这种方式继续下去，修的路和水库再多也不够用，只能越来越被动。在东京都的公共投资中，筑路所占的用地费和补偿费的比例为全国平均（41%）的两倍多，最高的达93%。

“这样下去，不仅不能减税，而且要增税。在有效投资的名义下不断增加的投资，明显地已达到极限。明治维新之后，北海道修了铁路，虽然这条铁路现在仍为赤字，但却带动了人口的增加，明治4年北海道仅有4万人，而现在超过了500万。

“在改造城市、发展地方时，现在需要的是，要有一个立足于先行投资观念的、大而新的经济帐，而不能只打眼前的小算盘。

“其三，为推进改造城市、改造国土的政策，不仅要依靠国家的财力，而且要积极地利用民间的力量。为改造城市和发展地方可动员的社会资本，远远超过政府的财力。改造城市和发展地方是全民的大业，只有政府、地方自治体、企业和个人一起上，才能实现。

“为此，应采取措施，使民间资金能主动地参加这个大业。

“其四，作为决定改造城市方向的前提，应树立‘公共福利’的新理念。所谓‘公共福利’，意味着国民或地区居民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应该作出让步，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虽然宪法规定私权神圣不可侵犯，但有时候也得用新的眼光去解释它。

“尤其是关于土地这种公共性很强的财产，为了‘公共福利’，做出一些限制性规定也是不得已的。社会上应有这种新的共识。土地已经不是商品。

“城市改造的目标，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一言以蔽之，是为了建设舒适的居住环境，空气清新，阳光充足，绿化好，上下班方便，使居民们能感到生活的乐趣。我们有充分的经济力量、勤劳精神和高度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

“作为城市改造的范例，有伦敦的新城法、汉堡的城市复兴、意大利建设大量的工人住宅，等等，但从国土改造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看，真正取得效果的甚少。”

田中接着说：“与此相关，在城市改造上，我想指出一二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在过密地区谋求建筑物高层化时，现行法律原则上限制建筑物的高度，但是，这个法律应该修改，以允许某些特定地区建筑四层以上的建筑物。现行法制的特点是，若非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或公库、公团，就不能享受减免税的待遇和征购土地。为此，尽管强调要精简机构，但是又不得不成立必要的公库、公团。

“法律应对官、公、法人和个人一视同仁，只要它立的项目符合政策，就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有这样，法律的目的才能达到。

“总而言之，改造城市、改造国土的前途是险峻而困难的，不是仅靠政府和一个政党的力量就能做到的，需要结集在野党及民间的智慧和力量。”

田中最后说：“为了建设生活舒适的日本，执政党与在野党、政府与民间，应超越各自的利害，携起手来，共同前进。我相信，通过对未来的挑战，伟大的黎明一定会光临日本列岛。”

这个被社会上称为“田中调查会”的自民党城市政策调查会成立之后，首先听取了政府各有关部门及地方自治体对其管辖的城市的现状、展望及对策的汇报，广泛地征求了各界有识之士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城市政策调查会于7月28日发表了《会长意见》、《项目别意见》、《省厅别意见》等三个文件。这就是《城市政策大纲》的中心内容。

其后，调查会又设置基本问题、大城市问题、地区问题和财政金融问题等四个小组，进行深入的投资、讨论。以此为基础，又设置了策定城市政策的基本方向和政策的起草委员会。该起草委员会1968年2月开始工作，至5月22日，决定了《城市政策大纲》。5月底，这份《大纲》获得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审议会和总务会的同意，成为自民党的正式文件。其间，城市政策调查会召开了25次全体会议，9次正副会长会议，18次小组会，18次起草委员会会议，在1年零2个月的时间里，共开了70次会议。

田中主持制定的这个《城市政策大纲》洋洋6万言，它详细地搜集了各种有关资料，确定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分前言，城市政策的基本方向，土地政策，大城市政策，地方发展的方向，财政、金融政策等六个部分，充分显示了田中的见识，表明了他的政策主张。这就是他后来发表的《日本列岛改造论》的蓝本。

重弹惊世

1972年6月20日出版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在《城市政策大纲》的框架上，加进了具体的内容，把一个抽象的政策纲领，变成一个具体的“处方笺”，成为实现田中从政以来一直怀抱的理想的计划。

《改造论》分六个部分，前有代序，后有结束语。

第一部分为“我的设想”，说明了国土改造计划制订经过和世界形势的新趋向，强调“日本今后的出路，一言以蔽之，只有‘和平’与‘福利’的一条坦途。对外，要坚定战后25年来贯彻始终的和平国家的生存方式，在与国际社会的协调融洽之中，寻求发展之路。对内，则改变迄今一直奉行的生产第一主义和出口第一的政策，而以国民的福利为中心，积累公共投资，按先进国家的标准提高社会保险水平，等等，要求国民经济取得平衡的发展”。

第二部分为“明治百年。国土维新”，以大量事实和数字阐明了产业、人口集中于城市的利和弊，特别指出，战后通过经济高速发展产生了过密过疏的严重弊端：32%的人口居住在1%的国土上（1970）；东京大气污染超过安全许可量，水污染加剧；电力奇缺；大城市行车速度缓慢，早晚拥挤时降为每小时9公里；东京居民人均公园面积仅为1.2平方米；东京闹区，木板房子密集，5小时可付之一炬；东京住房拥挤，斗室容身；农村人口不断外流，农业面临崩溃。

第三部分为“实现和平与福利的经济增长”，认为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内外形势虽发生了急剧变化，但今后仍能发展，强调产业结构将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并强调“今后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必须将经济发展所获得的经济力量，积极有效地用于国民的福利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对内，“以福利为动力，搞长期的积极财政”，创造“以福利推动发展，以发展保证福利”的良性循环前景；对外，要使日本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并“应公正地倾听南半球国家要求重新进行合理的国际分工的呼声，与多数发展中的国家平等互惠，探索共同繁荣的道路。把增长的经济力量广泛地用于援助南半球的国家”，“尤其是对亚洲国家，必须深刻反省

过去只追求本国利益的倾向，采取真正有益于对方的援助方式，并且细致而真诚地付诸实施”。

第四部分为“改变人与经济的流向”，强调要同时解决过密和过疏问题，“必须果断地扭转产业、人口、文化都过分集中于大城市的倾向”，要依靠工业，开发地方，将发展重点转移到地方上去。为此，应重新进行工业布局，将过度集中于太平洋沿岸一带的钢铁、有色金属、炼油、石油化学、电子等基础工业转移到日本列岛的东北和西南地区；将电子工业、医疗器材、住宅器材、精密机械等内陆型工业转向农村，发展积雪和寒冷地区的工业。

要“制定环境保护措施”，使地区开发和克服公害并举，建设“没有公害的工业基地”，实现“工厂区公园化”。

强调“进行工业重新布局的关键，在于形成高速交通体系”，要在全国内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三座连接本州与四国的大桥，完善空运体系，修建工业港和运输港。

第五部分为“城市改造与地方开发”，强调要“调整城市机能”，将那些不一定需要建立在城市的工厂、大学、研究机关，分散到地方去，而大城市要作为国际性活动和国际信息的枢纽，发挥作用；要先行建设连接全国各地的信息网络；要“在全国各地建设100个人口为25万的地方核心城市”，并“将其作为农工商三位一体的发展地方经济的据点”，其具体方法，（1）充实和加强初具规模的地方小城市，将其市区向外扩大，在郊区建设工厂区，形成一个同市区

具有有机联系的区域。（2）将邻近几个村镇合并，组成一个新市区，在它周围选地建设工厂区。还可考虑建设所谓“专业城市”，即使其成为某项产业的集中地。

强调“农村的利益即城市的利益”。要“工农一体，复兴现代农村”。为此，要实行综合农业政策，“将农业收入提高到相当于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水平”；认为“在有限的土地上，为保证高产高收入，就要组织少数精锐力量，搞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和先进的机械化，搞投资数目大、生产量多的农业”；认为“关键在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要保护优质农田”，“要制定必要的立法”，防止良田转为其他用途；要建设新农村、山村、渔村，理想的农村应是：农业经营规模、农田单位都要搞大型化；选果场、磨米场都使用先进的机器；从收货到包装都自动化；用卡车向外运送新鲜农产品；村里有食品加工厂和冷冻厂，还有机械修配厂，有商店街；一排排新住宅明亮清洁，有上下水道、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附近有门诊所或医院；有托儿所；农村划到城市内，作为地方城市的一部分，或通过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将农村和城市连接起来；在农村建立起有趣的农艺园区，作为城市居民休闲场所，还可在农艺园附近开设牧场、钓鱼池、高尔夫球场。

强调进行城市改造，“必须使人口不超过该城市现有的人口，否则效果不大”：指出在改造城市时，最低限度的条件是“保证居民的安全和生活环境的舒适”，为此，要将平面城市改造为立体城市。城市立体化的目的“不在于大楼高层化”，而是利用高层化后腾出的许多空地，将它用于公共福利。为此，“必须大力利用宝贵的城市空间，并在大城市修建大规模的地下街和地下沟。为了城市的立体化，要限制低层建筑，要放宽马路，首都中心必须布下密密的地铁网，还要修建放射性的高速铁路，将住宅区和首都中心、次中心等直接联系起来。

强调解决住房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和地方自治体要“优先取得土地”，取得的方式不一定是收买，也可以利用地租方式租用，盖起房子后，廉价租给居民。

第六部分为“禁止和因势利导”，指出要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就该把重点放在税制的政策性调整上，对过密地区和公害多发地区内的工厂要加重其税收负担，对在非太平洋沿岸地区新建的企业和转移到那里的企业，除了采取长期免征其固定资产税等特别措施外，还要实行补贴。

强调城市改造和地方开发要确立官民协调路线，通过利息、税制等手段吸收民间企业参加国土改造；政府应明确自己所要担负的事，并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至于其他工作，要采取政府与民间协作或合办的办法，或者委托给民间，对它进行适当的控制和扶助”。

第七部分为“结束语”，强调日本今后“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而是“全力以赴地进行国内改革”，使日本“行进在文明的最前列”。

田中表示，“我将把我的后半生献给这一事业，从而在整个日本，建设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美好理想的社会”。

田中就任首相后，履行前诺，立即着手从行政和法律上为实现《改造论》设想作准备。

但是，出乎田中意料的事态接踵而至，地价飞涨，引起物价急剧上升，石油危机后，通货膨胀加剧，日本经济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结束，《日本列岛改造论》不得不搁置起来。田中的经济政策破产了，其政权的地位也因此动摇了。

命运暗转

被迫下马，又卷入一场官司。雄心未混，力图东山再起，但终未走出危机。

政权夭折

1974年12月9日，田中角荣辞去首相职务，田中的政治命运暗转。

因石油危机诱发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是田中内阁的致命伤，而田中丑闻是他倒台的导火线。

10月，在日本颇有影响的杂志《文艺春秋》11月号（提前出版）出了一个揭露田中角荣的金钱来源和男女关系的特辑。杂志在全国发行之后，引起巨大反响，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在议论田中的金钱来源以及田中跟他的选举后援会负责人“越山会女王”佐藤昭的艳闻。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班子，正式着手整“田中问题”的材料。从10月底开始，政治情势的演变失常，谁都觉得田中政权前途多舛。

为了渡过政局难关，田中于11月11日改组了他的内阁。此举虽使主派三派的地位略有加强，但各种矛盾继续激化，广大人民群众对田中的不满爆发，19日举行了有355万人参加的秋季大罢工，“打倒田中内阁”成为一个主要口号。社会舆论纷纷攻击田中改组内阁是“转移国民视线”的“小动作”。各在野党也达成协议，要在即将召开的临时国会上采取一致行动，追究物价问题和田中丑闻，并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以福田为代表的自民党内反对派扬言要掀起倒阁运动，逼迫田中下台。

11月下旬，政局的变化对田中更加不利，田中下台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自民党内支持田中的人也都劝田中早日辞职，以保存实力，免得“遍体鳞伤”，连田中派内一度主张硬顶的二阶堂进、竹下登等骨干，也感到难渡临时国会这一关，认为田中下台已是大势所趋。

田中鉴于大势已去，终于在11月26日宣布，他已接待完来访的美国总统福特，决定辞职。是日上午9时半，田中把推名副总裁、二阶堂干事长、铃木（善幸）总务会长、山中（正则）政调会长召到首相官邸，向他们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当时，田中还请内阁官房长官竹下登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读了他的“决心书”。

“决心书”称：“我执政2年零4个多月期间，铭记着决断与实行的口号，为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为国民生活的稳定与提高，竭尽了全力。

“最近政局的混乱，发端于与我个人相关的问题不少，我作为国政的最高责任者，痛感政治和道义的责任。

“我精赤条条地离开乡下以后，终日无休，没命地干到了今天。想到此，我也有些感慨。但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既然招致了社会的误解，我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是不明不德之所至，感到非常痛苦。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说明真相，得到国民的理解。

“现在，国之内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堆积如山。政治是须臾也停滞不得的。我之所以严肃而泰然地宣布自己的进退，原因就在于此。

“遥想我国的前程，如经受一夜倾盆大雨之洗礼，我心澄耳清。

“自由民主党应早日选出新的代表，团结一致，打开困难局面，不辜负

国民的期待。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决心为国为民进一步献身。”

洛案事发·身陷囹圄

田中离开首相职位后，作为执政党最大派系的领袖，并没有放弃政治活动。他每天早晨5时半起床，6时看电视新闻，并把报纸浏览一遍，7时开始接待来访的客人。每天上午10时之前，田中几乎都要与几十名来客应酬，下午大多是到他的竞选组织越山会办事处去。

1976年元旦那天，700多位来自政界、财界、官界以及他家乡的客人纷至沓来，涌进田中公馆，给田中拜年。1月7日，田中派举行新年庆祝会，田中在会上作了抨击三木武夫现政权的发言，表示了推翻三木政权的决心。

就在这个时候，震惊日本国内外的洛克希德案爆了出來。

2月4日，美国参议院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揭发了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商和军火商之一——洛克希德公司——通过行贿手段，向全日本航空公司推销三星式客机一事。消息传出，日本新闻传播媒介立即开始报道。由于全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引进三星式客机的时间，正好是在1972年田中、尼克松会谈之后不久，怀疑的目光立即转向了田中。

2月6日，洛克希德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科奇安作证说，日本的大政商小佐野贤治与此案有关。而田中曾公开说过，小佐野和他是“刎颈之交”，从而进一步引起了在野党和新闻界的怀疑，认为这“又是田中的财源之一”。三木首相立即下令彻底调查。

面对人们的怀疑和田中派内部出现的动摇气氛，田中表示，他“没有做过于心无愧的事”。至3月底，他亲自动笔写了一份“辩解书”，并印成了一本11页的小册子。4月2日，田中带着小册子出席了田中派议员的临时大会。他把小册子分发给大家，并郑重其事地宣读了一遍。他念道，“现在，围绕洛克希德问题，有种种臆测到处乱传，令人感到十分遗憾，但真相一定会大白。我对我自己，内心里感到自豪……”

田中在这番表白中，谈到了他与尼克松在夏威夷的会谈、引进三星式客机、购入第二代反潜巡逻机、他与小佐野的关系以及他的金钱来源，坚持说他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清白的。

最后，田中念道，“在战后漫长的30年的时间里，我们担负了处理国家政务的困难工作，建立了今天我们这样的国家。现在，我们应当在这些成绩与荣誉的基础上，把全体党员团结在一起，争取不断地前进”。

4月24日，田中乘上“时代8号”特别快车，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列车到家乡长冈车站，拥挤在车站内外的几千名群众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万岁”声。从长冈站到刈羽郡西山町旧居，沿途40分钟的路上，一直都是挥舞小旗前来欢迎的人群，旧居门前，则是一片旗海。

田中从家乡返回东京之后，自民党内倒阁的气氛日浓，一场以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为中心的幕后谋略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怀有强烈的反三木意图的田中和大平派相继决定支持椎名的活动。

可是，这次活动没有取得突破，时间已进入了6月。与拖拖拉拉的政局相对照，围绕洛克希德案的气氛却突然紧张起来。6月22日，终于开始捕人了。到7月19日，共逮捕了全日本航空公司和丸红公司等的13个人。7月27日，田中也被捕了。

田中并不知道，当洛克希德案被揭发之后，东京地方检察厅和外务省即派密使去华盛顿，通过外交途径从美国方面弄到了涉嫌洛克希德案的名单和有关材料。此后，东京地方检察厅据此继续进行侦查，取得了可以公审田中的证据，认定田中犯罪的嫌疑是：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在他任首相期间，从九红公司的桧山等人手中，4次接受洛克希德公司的现金共5亿日元，因而须按违反外汇法问罪。

7月27日晨7时27分，一辆黑色的“塞德里克”牌小轿车飞快地驶入东京地方检察厅办公大楼门前，田中在特侦部的松田检察官和特侦资料课田山课长的监护下走下车。他身穿深色西服，衣领上佩戴着国会议员的徽章，打着淡青色横纹的领带。他在照相机的镁光中，向记者们轻轻地举了两三次手，但表情紧张。

约两个小时之后，根据逮捕令被捕的田中被移交到东京小菅拘留所。

拘留所的生活，对田中来说，是时隔28年之后的第二次体验。1947年，片山内阁在美军占领当局支持下，提出《煤矿国家管理法》，要实行煤矿国有化，田中当时作为民主党的议员，在国会上表示反对。后来，认为田中有受贿嫌疑，将他逮捕，两年多以后才宣判无罪。

但第二次体验不能与当年的情况同日而语。上一次，田中是刚当选议员一年的“新兵”，而这次是在他爬上了首相宝座，并在历届首相中史无前例地获得近70%国民支持之后的大摔跤。而且，这是一次没有预告的逮捕。田中被关进拘留所之后，才让人送去手纸、牙刷、牙膏和衬衣等用品，可见其“准备不足”达到何种程度。

田中的单人监房不足5平方米，内有一个带抽水马桶和洗脸池的卫生间，墙上有一个铁格子窗，跟一般尚未判决的犯人完全一样。因为是夏天，床上只有一条薄被和一条毛毯。为了防止自杀，领带、皮带、手表、鞋子等统统被暂时没收了。田中过着不打领带、不系腰带、拖着凉鞋的生活，折扇对于爱出汗的田中是必不可少的，但不允许他带进来，只给了他一把公用的团扇。

与其他嫌疑犯不同的是，每天的审讯在拘留所内的另一幢建筑里进行，所以，不用给他戴手铐。

田中在拘留所里，每天除了长时间地受审外，既不能读报，也不能听广播，生活是很无聊的。但他没有愁眉苦脸，也没有急躁。早晚叫号点名时，他总是回答一声“有”，看守反映他“态度好”。

田中在第一次受审时，当着检察长的面，给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和田中派会长西村英一写了退党和退出田中派的申请报告，然后把这两份报告装进信封，委托检察长直接送交自民党本部和田中派组织七日会。

申请报告说，“鉴于本人现实之处境……”田中在政界有30年的经历，他很清楚，自民党和七日会一定会因他被捕而感到头痛，他不能连累他们。但关于关键的5亿日元的嫌疑，他面对检察当局的审讯，始终坚持说：“关于5亿日元，本人一无所知。”

总之，在他的意识中，丝毫不认为自己犯了罪。在狱中，田中想了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最使他懊悔不已的是，两年前因金钱来源问题下台时，把政权交给了三木武夫。后来，他非常遗憾地对许多人说：“那是一次失败。我被三木捣了鬼，吃了三木的亏。”这对他是不能忍受的。

他不能后退。他发誓一定要争取无罪，恢复自己的政治生命。

8月16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以受托受贿罪和违反外汇法罪对田中起诉。起诉的事实是：田中在担任首相期间，洛克希德公司和九红公司希望让全日本航空公司进口三星式客机，田中接受了这一请求和委托，利用总理大臣的职权，指挥运输大臣，决定进口三星式客机。以后，根据事前的商定，接受了5亿日元现金。

田中在被捕的时候，仅有违反外汇法的嫌疑，而在起诉阶段，又加上了“受托受贿”这样一个严重的“实质犯罪”。这对田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担任过总理大臣的人，因涉嫌任职期间受贿而被起诉，而且，因此把总理大臣的职权范围提到法庭上去讨论，这在日本的政治史和审判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但是，田中究竟进行了什么活动，田中本人对起诉事实作了哪些供述，检察当局认为“有碍于公审”，一概未加公布。

翌日，即8月17日下午，田中拿出2亿日元保释金，获得保释。

当天下午，田中乘坐他平常爱坐的黑色“道奇”牌轿车回到目白台家中。他精神很好，见到田中派议员和家乡的选民代表，立即谈笑起来。

雄心未泯

田中被保释出狱后，到田中家慰问的人络绎不绝。田中受到鼓舞，对未来表现出信心。不过，从此深居简出，连田中派办事处也不去了。他很清楚，自己到哪里都会惹人眼目。

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这个消息在田中的脑海里引起了种种回忆。他与毛泽东握手、会晤，与周恩来会谈，恢复了日中邦交。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是他发挥了“决断与实行”能力的伟大事业。按照他的心情，想立即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去吊唁。但为了避开记者的眼睛，6天之后——9月15日，他才悄然去了中国大使馆。这是他被保释后的第一次外出。田中向陈楚大使表示了哀悼之意。大使赞扬田中说，“您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田中听了非常感动。

9月21日临时国会开会那天，田中到国会露了一下面。但只在大门口办完出席会议的手续，并未进会场。

自此以后，田中除偶尔去他的办事处之外，就不大露面了。为了避免遭到记者的围攻，他也不外出打高尔夫球了，在目白台公馆一角拉了一个球网，用打球来弥补运动的不足。

他还利用接待来客的余暇，读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并开始写回忆录。

田中鉴于他获保释后，田中派内要求七日会与田中划清界限的呼声日益强烈，决定离开七日会，以免影响田中派议员的选举。

但是，田中仍然雄心未泯，他准备“斗争”下去，首先是通过议员选举的洗礼，争取政治上的“清白”。田中曾说过，“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国民的审判是最重要的审判，被国民选中了，那比法律的判决更重要”。

田中的另一目标是，进行法庭斗争，争取在法律上也获得“清白”。

远方来客

1978年10月22日下午4点20分，一架尾翼上漆有红五星的三叉戟军用专机在东京羽田机场徐徐降落。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及夫人卓琳，还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及夫人经普椿、外交部长黄华及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在前来迎接的日本外相园田直的陪同下依次走下舷梯，开始了为期八天的日本之行。邓小平此行的目的是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

为了体现“饮水不忘掘井人”和“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的精神，邓小平在紧张的访问日程中抽出时间，于24日上午专程往访了前首相田中角荣这位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朋友。当时田中是获保释在家候审。邓小平专程往访他，格外引起日本舆论界的强烈反响。上午9点17分，邓小平在廖承志、黄华、韩念龙和驻日大使符浩陪同下，乘车来到东京目白台的田中私邸时，守候在大门口的众多记者们首先摄取了这一历史性镜头，并迅速发出了消息，不少记者评论赞扬中国人重情义、不忘旧友的传统东方美德。

为了保证中国领导人的安全，当天，日本警视厅出动了约8000名警察在田中私邸周围执勤，特别是在私邸正门附近，每隔5米就站着一名警察，形成了一道森严的安全防线。

邓小平来访的消息，使田中万分激动。从清晨起，田中就在门口不断出出进进，心神不定，生怕错过了在大门口迎接邓小平的机会。40多名田中派国会议员也一大早赶到田中家里。当邓小平下车后同田中在齐呼“欢迎”的“田中军团”面前走过时，那情景真像阅兵式一样壮观。

在会客室里，田中同邓小平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邓小平说：“我们这次前来日本访问，一方面是为了互换条约批准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过去为两国（的友谊）作出努力的老朋友表示感谢。我们始终怀着感谢的心情记着田中先生担任首相时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田中对邓小平来看望他一再表示感谢，并说：“您的这次来访，是日中关系的新起点，所以受到全日本国民的欢迎。我等了6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田中还动情地说：“我见到您，心情就同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会谈时一样。”田中这话可能勾起了邓小平对往事的回忆。他顿了一下之后，略带遗憾地说：“那时，我在离北京很远的地方，没能见到您。”

对于田中一再表示的感谢，邓小平深情地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老朋友是不会忘记的，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感情。今天我们就是同老朋友叙旧。邓小平还邀请田中和在座的田中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再次访问中国。

随后，田中及其家人陪同邓小平一行走到美丽的庭院，在草坪上合影留念。这是一座典型的日本庭院，几棵苍松中夹着一片丹红的枫叶，池塘水声潺潺，锦鲤在池中欢快地嬉游。田中的女儿真纪子向客人介绍说，这些锦鲤都是她父亲从各国搜集来的，每条价值100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合5560美元，田中还在自家的庭院里举行了派对，请中国客人品尝了他精心准备的象征吉祥的日本名肴——鲷鱼和龙虾，并邀客人频频举杯，并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接着，田中陪同邓小平一行走过庭院，去观赏一棵名叫“雪椿”的山茶花。这是田中在日中建交后栽的纪念树，现在已经长到两米多高了，每至隆冬季节，做雪花开，分外艳丽。

会晤时，邓小平向田中赠送了一套中国茶具和文房四宝。在砚台的背面，

镌刻着周恩来青年时代东渡日本时写下的著名诗篇手迹：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作为回赠，田中则向邓小平、廖承志、黄华、韩念龙、符浩等人的夫人分别赠送了介绍插花艺术的书——《传统之美》。

邓小平的来访给身处逆境的田中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回忆，邓小平那人格的力量更使田中为之倾倒。他事后向记者谈了许多深刻的印象。最后他说：“邓小平先生很富有幽默感”，“要是日本人也有幽默感，那就好了”，流露出对邓小平的仰慕心情。

法庭上的抗争

田中捕获保释后，聘请一些知名的法律专家组成大型律师团为之辩护，始终否认有受贿 5 亿日元的事实。可是，由于在审讯中，同案的全日本航空公司董事长若狭等被告作了不利于田中的供词与证词，田中当时的秘书榎本也一度承认曾亲手替田中接受 5 亿日元贿款，尽管这些人后来又都翻供，检察当局仍坚持追查。

1981 年春，田中的律师团发起“反攻”，说在榎本被控接取贿款的时间里，有证据说明榎本正在与人会晤，因此，构成“不在现场证明”，案情审理乃转而而对田中有利，一时“田中无罪”之说颇占上风。

但到 10 月，事态突变。在第 146 次审判时，榎本前妻作证说，榎本曾亲口告诉过她替田中拿过钱，并说榎本已将其任首相秘书期间的记事本等证物销毁。

11 月，法院以伪证罪将田中的好友小佐野贤治判了刑。1982 年 1 月，又以违反外汇法罪对全日本航空公司董事长若狭等人判了刑。至此，拉开了判决田中的序幕。

田中面对上述形势，步步为营，顽强抵抗。田中的律师团一方面主张田中无罪，一方面设法拖延判决日期。

但是，终于抵挡不住，东京地方法院于 1983 年 10 月 12 日开庭审判，判决田中有期徒刑 4 年，缓期执行，并追缴其受贿金 5 亿日元。

法院判决田中有罪的理由是：

(1) 滥用职权。田中身为首相，竟指示运输相命令全日本航空公司购买洛克希德公司三星式客机，这等于田中本人指示全日本航空公司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的飞机。

(2) 受贿 5 亿日元，田中在 1973 年 8 月到 1974 年 3 月，曾 4 次通过丸红公司收取洛克希德公司 5 亿日元的贿款。因此，被告辩称其秘书榎本没有收取此项贿款的说法不能成立。

(3) 丸红公司的引诱。1972 年 8 月 23 日，前丸红公司总裁桧山拜访田中私宅，请田中帮忙将三星式客机卖给全日本航空公司。当桧山许诺给 5 亿日元作酬金后，田中答应帮忙。

(4) 缓刑理由。田中任职期间，严重辜负了国民的信任，但法院方面感念田中在担任内阁成员与首相期间的建树，特准予缓刑。这样，田中在法庭休庭后两小时，便获释了。

依据日本法律，实行三审制，一审、二审判决后，均可上诉。其间，田中仍不失其议员身份，且仍可竞选议员。所以，一审判决后，田中仍坚持说：

“我打算努力履行国会议员的职务，我会再奋斗10年。”

大选得票史上最高

1983年10月12日，田中被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有罪，引起日本政界的强烈震荡，在野党拒绝审议中曾根内阁向国会提出的一项议案，借机攻击自民党的腐败，并逼迫田中辞去众议员。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中曾根首相不得不宣布解散国会，决定于12月18日举行大选。这次大选，对田中来说，当然是个严峻的考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接受“国民的审判”，其结果如何，将决定田中的政治生命。

12月3日是竞选活动开始的法定日期。12月2日下午，田中带领一班人马，浩浩荡荡地回到他的选区——故乡新潟。他在大雪纷飞中抵达长冈车站，受到500多支持者的热烈欢迎。

12月3日上午，田中在长冈市区发表竞选演说。他面对2000多选民，意味深长地说，“我从28岁就当众议员，连续当选了14次，现在65岁，但我还可以干下去。目前（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74岁，我还不会死”。

然后，田中谈及洛克希德案。他说，“正如大家所知，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这件事情，麻烦了你们，打扰了你们。然而，我仍在上诉中，我相信会有可喜的结果。我与此案无关”。

接着，他说，“我也是血肉之躯，我遭受舆论界6年多的攻击，并不是无动于衷，但是，我所做的事情，并非为了一己的私利，虽不无受缚的耻辱感，可作为一个政治家，我要尽我的职责，并无切腹自杀之意”。

田中发表演说后，于当天下午乘火车回东京了。他对自己再次当选众议员非常有把握。他的竞选后援组织越山会会员达10万之众，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会员遍布选区各个角落。他们对田中一直感恩戴德不尽。在二次大战后饥饿贫困的年代，新潟人民燃烧着“致富”的愿望。田中在年轻时代的政治活动中，时时刻刻为实现乡亲们的愿望而奋斗。

这种利用地缘和乡情关系而获得支持的例子，在日本全国各地的政治家中都有，只是越山会格外突出。越山会比其他政治集团强大的原因，是因为产生了像田中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田中虽然官做得越来越大，却没有忘记故乡，而且愈为故乡效劳。因此，故乡的人为了报答田中的恩情，一直忠实地支持田中。现在，田中被判刑，越山会有危机感，从而更加热烈地支持田中，对这次选举战全力以赴。

除越山会外，田中的选区里还产生了一些支持他的小组织，如以青年人为中心的思考田中角荣和乡土之会以及由中年男女组成的明日会等。这些组织都是为了给田中拉浮动票而组成的。

田中的竞选劲敌是曾获日本文学奖“直木奖”的天才作家野坂昭如，53岁，他的父亲曾当过新潟县副知事。为了击败田中角荣，野坂以辞去参议员为赌注来新潟三区参加竞选。他把矛头直接对准田中，声称要“改变田中型政治”，“结束田中的政治生命”。

另外两个对田中挑战的是自民党两位比他年轻的现任众议员；一个是中曾根派的渡边秀央（49岁），另一个是无派系的委井新（50岁）。他俩都不直接批评田中，只是唏嘘洛克希德案之后，政坛上应有“新老交替”，这个选区的领导权，应交给他们，同时，要有“清廉的政治”。

经过 15 天激战后，为日本全国瞩目的新潟三区选举结果揭晓。选民怀着“对田中的英雄崇拜心理”和“怕田中失落的同情心理”，纷纷投票支持田中。结果，田中得到日本选举史上最高的 220761 票，赢得了绝对胜利。渡边和委井虽也分别当选连任，但前者只获 47118 票，后者只获 40913 票，远远落在田中后头，而野坂仅获 28045 票，约为田中得票的 1 / 8，凄凄惨惨地败下阵来。这次选举中，新潟三区共有 9 人出马竞选，另外 8 人的得票加起来约为 25 万张，也就是说，田中一个人几乎囊括了该选区将近一半的选票。

田中当选的消息一传出，“万岁”的欢呼声在选区内四起，他的支持者们欢腾雀跃。田中欣喜万分，他说，“这个票数于三天前就估计到了，结果只有 300 张票的误差而已”，显示出其“选举神手”的本领。

田中向选民致感谢词。他郑重他说：“我度过了 38 年的政治生涯，当选了 15 次议员，由衷地感谢大家。在狂风暴雨中，我感激国民的呼声，在我有生之年，一定会报答你们。我心中铭记着：我担负着很重大的责任。”

1986 年 7 月，日本又一次举行大选。尽管同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田中有罪，但由于同样的原因，田中再次当选。

“首相制造商”

田中下台之后 10 余年期间，虽一直吃官司，并被迫退出自民党，但直到 1987 年 7 月田中派公开分裂之前，他凭借其势力和影响，一直操纵着日本政治。

10 余年来，田中权势显赫，影响很大。他居住的目白台公馆被称为“目白台宫殿”、“另一个自民党总部和另一个首相府”。在整床三木内阁，支持大平、铃木执政，扶植中曾根上台等自民党历次权力争斗中，田中和田中派都起了决定性作用。田中因而被称作“首相制造商”。政府和自民党受其操纵固不待言，连在野党也在他的“威力射程之内”。他下台后，前往田中府拜访的大小政客络绎不绝，连不少外国政治家访日时也前往拜会。为接待来客，田中在院里特地修建了一个可容纳 200 多人的接待室。

他党羽众多，财源充足。下台后，田中派非但没有分化解体，反而不断膨胀，由下台之初的 75 人，扩大到 123 人（1985 年 2 月田中病倒前），田中派因此被称作“田中军团”，在自民党各派中首屈一指。由于田中实力如此雄厚，他自然控制了自民党，从而控制了国会，控制了日本政治。田中派人数如此众多，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田中有充足的资金。田中掌握的越山会、政治经济调查会、财经调查会，都是为他筹集政治资金的组织。据日本报刊报道，田中还有私产达 2000 — 3000 亿日元，每年可坐收净利 200 亿日元。

他地盘稳固，威信犹存。首先，田中有巩固的选举地盘。他的后援团体越山会有 33 个支部，9 . 8 万名会员，单靠他们的选票，田中在选举中就可稳操胜券。

10 余年来，田中虽被洛克希德案搞得名声不佳，被指为“金权政治的代表”，也有不少人认为“证据确凿，理应判罪”。但在日本国内，有不少人认为，它虽是一场官司，但实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案发当初，继田中之后上台的三木首相指示检察当局彻底追查，是为了“排除政敌”。一般群众中也有人认为田中鸣不平，认为在“政治家于这种事的并不是田中一人，单把他判罪是不公平的”。有人说，“即便是（田中）先生拿了这笔钱，也不是

为了肥私，是要为国家花的”。包括统治集团一些人物在内的某些人欣赏他的才干，认为他“仍是一个有为的政治家”，甚至期望他“东山再起”。

祸起萧墙

田中本人自然更有“东山再起”之心。为此，10余年来，他一直把持田中派权力不放，压制本派实力人物竹下登接班和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致使派内矛盾日趋激化。1985年2月，竹下不顾田中的反对，在其亲家、派内实力人物金丸信支持下，公开组织了有40人参加的创政会，在田中派内另立山头。就在矛盾激化之际，田中患脑血栓病倒，二阶堂作为田中派会长，全面掌管派内事务，但二阶堂势单力薄，难以驾驭竹下及其创政会势力，而田中一直重病缠身，不能视事，也难于左右派内局势。

1986年7月，自民党在众、参议两院同时选举中取得空前胜利，党内各派势力都有增加，其中以田中派增加最多，膨胀为142人的大派，但竹下的势力占百人左右。这次选举后，中曾根首相改组内阁，田中派有8人入阁任大臣，其中竹下势力占5人，竹下本人也出任自民党干事长之要职，其地位和影响进一步增加。

以此为背景，随着中曾根的任期临近结束，自民党内各派代表人物围绕争夺下届总裁和首相宝座的帷幕拉开。竹下于1987年7月4日公然从田中派内拉出113名议员，另立门户，成立竹下派。田中派从此分裂，田中操纵日本政局的作用也从此戏剧性地结束了。

重访北京

时空流转，往事难忘却。相隔 20 载，田中偕全家又来到了紫禁城……

家族旅行

1992 年 8 月 27 日，田中角荣前首相偕夫人和家属重访北京。20 年前，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后，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力排众议，作出重大政治决断，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主席，并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田中从政界引退后，长期患病，加之官司缠身，与外界鲜有接触，甬说新闻记者，就连原属“田中军团”的国会议员们也几乎被拒之门外。但田中的家门一直对中国客人敞开着。中国的领导人、中国驻日使节多次去探望他，重温旧谊。田中先生也非常珍视他同中国的友好交往。他常忆起 1972 年 9 月访问北京的经历，非常怀念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当年参加中日复交工作的各位朋友，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和中国的变化也很关心。1992 年初看到有关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报道后，他十分激动，萌发了再次访华的念头，表示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年头访华的愿望。很快，田中先生接到了中日友协的盛情邀请，他高兴得流下了热泪。

田中前首相是把这次北京之行作为一次家族访问安排的。他婉拒了几位国会议员随行的请求，只同意山下元利一位政治家陪同前来北京，而其他的成员全是他的家属及医师、护士、警卫、秘书。田中先生觉得，这样做更能表达一个离开公职的人对中国的友好亲情。

8 月 27 日，田中前首相一行乘日航包机飞抵北京。从机场去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前来欢迎他的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在车里向他介绍沿途的市容变化，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认真地听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窗外面，显露出旧地重游的怀旧和激动的表情。

田中一行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 12 号楼。他和他的全家对主人热情、周到的安排感到十分满意。钓鱼台国宾馆是田中先生熟悉的地方。时隔 20 年旧地重游，感到分外亲切，也很兴奋。在那里下榻，恍若置身梦境。

8 月 28 日上午，中日复交时的外交部长姬鹏飞和夫人许寒冰到田中先生下榻处来看望田中先生一行。宾主进行了非常亲切、友好的交谈。

姬鹏飞对田中的来访表示衷心欢迎，称赞田中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谈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大历史意义，对田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敬佩。

田中先生因半身不遂，言语不清，由其女儿田中真纪子代为致谢说：20 年前，日本对中国还很不了解，父亲访华成功，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才使日本人民第一次了解中国。而当时通过电视看到的正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这次父亲重访中国，见到的第一位老朋友就是姬鹏飞先生，感到非常高兴。

田中先生对女儿的谢词很满意，他高兴地提议以茶代酒干杯，表示感谢。

赴宴大会堂

8月28日下午，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田中角荣和夫人一行。

李鹏总理热情地欢迎田中前首相一行。他说，我代表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欢迎田中角荣先生一行的来访。田中先生对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恢复和发展中日友谊，在日本有许多老前辈作出了贡献，其中您的贡献最大。中国人非常讲情义，谁做了好事，大家都不会忘记。中国有句古语“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今天正是以这种心情欢迎、接待先生的。

接着，田中真纪子代表她的父亲致词，并由真纪子的长子田中雄一郎译成中文。

田中在致词中说：1972年我54岁时作为日本国总理作出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我这次前来贵国访问就是想亲自确认当年的决断的正确性。

20年来，我一直关注着日中关系的发展。回顾20年前的国际舆论和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当时许多人认为恢复日中邦交为时尚早。我受到来自自民党内的强烈反对。但是，我毫不犹豫。因为我认为，超越不同的政治制度实现人类幸福，自己负责作出政治决断，这就是政治家的使命，正因为这样，20年前的9月，我豁出性命，飞离了羽田机场。我至今仍然坚信，恢复日中邦交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我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虽是初次见面，但我为毛主席渊博的知识、周总理高尚的人品所倾倒，深受感动。这次重访北京，不能与这两位伟人相会，感到无限悲痛和莫大的遗憾。毛主席的慈祥面容和周总理的音容笑貌至今铭记在我的脑海里。今年我的年龄和当年周总理的年龄相同，无奈见不到他了。这次山下元

利前防卫厅长官和我一家七口及随行人员都受到热情款待，感到十分光荣。在此，我对历届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给予我的热情鼓励表示衷心感谢。作为这次访华的礼物，我带来了50辆轮椅送给中国的残疾人。建设美好的未来，需要对过去有正确的认识，祝愿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对此，李鹏总理说：田中先生的这番话充满激情，不仅是对往事的美好回忆，而且展示了中日关系的未来，听后我非常感动。

当晚，李鹏总理和夫人设宴款待田中前首相一行，宾主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频频举杯，互致美好的祝愿。席间，田中真纪子还告诉李鹏总理，她父亲听说天皇确定访华的报道后十分高兴，希望此行大大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李鹏总理回忆起他1989年访日时会见天皇陛下的情景，表示十分重视并热情期待着天皇陛下的来访。

8月28日下午，田中前首相还高兴地会见了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

重逢中南海

8月29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亲切会见田中角荣前首相一行。

江总书记首先转达了邓小平同志对田中前首相的亲切问候。他说，今年4月我访问日本时，在东京与田中角荣先生见过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才4个月的时间，我们又在北京重逢，从心里感到高兴。特别是今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见到您就不由然地想起您的功绩。

接着，江总书记向田中前首相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和中日经贸合作的前景。他说，田中先生此次相隔20年来访，虽然逗留时间不长，但可以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

田中的女儿田中真纪子代表其父对江总书记拨冗会见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请江总书记转达其父对邓小平同志的问候和谢意。她说，这次在北京同江总书记第二次见面，倍感亲切。父亲每想起 20 年前的事就非常激动。他虽然已从政界引退，但对中国仍很关心。邓小平先生视察深圳、大连等地的消息见报后，他用左手拿着剪刀把有关报道剪下来。今年正月，杨振亚大使来我家作客时，邀请我父亲访华。当时，父亲还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信心不足。今年 4 月，江总书记访日时亲自邀请父亲在健康允许时访华，父亲才下决心。时隔 20 年，重访北京，感到十分幸福。

田中角荣先生向江总书记赠送了今年 4 月访日期间看望他的影集。

江总书记表示感谢，并引用两句熟语“人生何处不相逢”、“故人重逢分外高兴”表达对田中先生来访的欢迎，祝愿他访问圆满成功。

相聚钓鱼台

8 月 30 日上午，一批老朋友到钓鱼台国宾馆看望田中角荣先生。他们是赵朴初、经普椿、黄华、韩念龙、符浩、张香山、陈楚、韩叙、孙平化、赵诒、陆维钊等。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参与了 20 年前中日建交谈判的具体工作或出席过建交时的活动，如今共同回忆美好的往事，分外亲切。一直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赵诒同志遵照邓颖超同志生前的嘱咐，将一支周总理用过的毛笔赠给田中先生。她说，今年 6 月，田中真纪子来京时，我向邓颖超同志报告说田中角荣先生要来访华，她听后十分高兴，认为田中先生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希望能在北京见面。她如果由于健康原因不能见面的话，也要把周总理用过的这支笔送给田中先生作纪念。

田中真纪子代表父亲表示深切感谢，并说，父亲听到邓颖超先生逝世的消息时，难过得流下眼泪。表示准备将这支珍贵的毛笔和毛主席当年赠送给父亲的《楚辞集注》一起放在田中纪念馆里。

留下爱心一片

8 月 30 日下午，田中角荣先生把他特意从日本带来的 50 辆轮椅赠给中国残疾人基金会主席邓朴方同志，以表达他对中国残疾人的一片爱心。

邓朴方同志对田中先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友好情谊表示由衷感谢。他说，田中先生是中国人民敬佩的老朋友，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田中角荣先生。这次田中先生重访中国，我们很高兴，街头巷尾也都在议论，大家都对先生的来访表示欢迎。

接着，邓朴方同志将一帧邓小平同志签名的 1978 年他访日时与田中的合影赠给田中先生。田中真纪子高兴地说：“这是这一次我父亲访华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1978 年邓小平先生访日时专程来我家看望父亲，父亲一直铭记在心。从此之后，只要报纸上有关于邓小平先生的报道，他都要剪下来保存。”

谈到田中想拜访邓小平同志时，邓朴方同志说：朋友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父亲也非常理解。他身体很好，但他下决心不见外国朋友，这主要是希望年轻的一代承担更多的工作，也是培养年轻人的意思。这虽然有许多遗憾，我们还是尊重他的意愿，请田中先生谅解。父亲对田中先生十分尊重，对先

生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不仅在正式场合这么讲，在家里聊天时也这么讲。

田中角荣先生及其一行这次访华期间还怀着浓厚的兴趣游览了颐和园、亚运村、王府井大街和天坛公园。

8月31日，田中先生一行怀着非常满意的心情乘日航包机回国。

人们不曾料到，这竟是田中先生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盖棺论定

自民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党葬，朝野同声称赞他是日本战后一大政治家。

1993年12月16日下午2时零4分，田中角荣在东京病逝，终年75岁。

噩耗传出，日本列岛为之一震。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国会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朝野政党首脑等政界要人和其他各界头面人物纷纷前往田中私邸吊唁致哀。日本新闻媒介异常迅速地作出反应，争相进行大量报道，并从各个角度对田中的政治生涯作出评论。总的认为田中虽功过兼有，但不失为日本战后一位有决断力的大政治家，各新闻机构不约而同地肯定了田中为恢复中日邦交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强调这是他担任首相期间的主要功绩。东京六家电视台还播放了各自的记者在街头采访的实况，一些普通群众也都认为，田中作为庶民宰相，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尤其在重建中日关系方面，功不可没。

田中逝世的消息也立即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应。中国驻日本国大使徐敦信当晚向田中家属发出唁电。翌日，徐大使前往田中私邸，向田中家属致哀，并向田中的女儿、众议院议员田中真纪子转交了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姬鹏飞前外长、唐家璇副外长、张香山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和陈楚、符浩、宋之光、章曙、杨振亚等五位前驻日大使16日发出的唁电。

江泽民主席的唁电说：

惊悉田中角荣先生不幸逝世，深感痛惜。

田中先生作为日本著名政治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尊敬和信赖。

田中先生的逝世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由田中先生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开创的中日友好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相信田中先生会含笑于九泉。

谨对田中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先生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李鹏总理的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对田中角荣的逝世致以深切哀悼，称“田中先生是日本著名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二十一年前，田中先生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胆略，毅然作出恢复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决断，同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为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缅怀先生的业绩，为实现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崇高目标继续作出不懈努力”。

中国政府还决定：徐敦信大使出席田中角荣葬礼；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作为田中先生的老朋友赴日参加田中先生的葬礼；驻日使馆以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和姬鹏飞前外长的名义送花圈。

田中角荣曾任党首的自由民主党从田中本人的政治资历和他对日本战后政治的巨大影响考虑，决定于12月25日为田中举行党葬。田中角荣的葬礼在东京青山葬仪所举行。那天下午1时许，当驻日使馆公使衔参赞王毅和我（驻日使馆政务参赞）陪同徐敦信大使到达葬礼会场时，会场内外已是人山人海，只见宽阔的会场和广场都挤满了身穿黑色丧礼服的人群，花圈一直排到大路旁。后来从报上得知，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士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些

外国使节，总共不下一万人。

当我们被引进会场内落座不久，葬礼隆重开始。按日本的传统做法，首先是做法事，然后是由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首相细川护熙、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参议院议长原文兵卫致悼词。他们众口一词，高度评价了田中当年为恢复日中邦交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徐敦信大使是在葬礼上致悼词的唯一外国使节。他代表中国政府对田中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田中先生 1972 年排除各种困难，毅然作出政治决断，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功绩。

在田中家属致谢词之后，参加葬礼的人依次仁立在田中遗像前鞠躬进香，并同田中的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当我随同徐大使走出会场时，看到广场上的葬礼参加者还在冬日的阳光下静静地排着长队，等候着进入会场向田中先生作最后的告别。在返回使馆的路上，我想，人们常说“盖棺论定”，这么隆重的葬礼和葬礼上的悼词，便是对田中先生最好的人生评语了。

田中波澜起伏的人生结束了，但时间在分分秒秒地延续，历史发展本身不会留有丝毫的断层。田中生前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开创的中日关系新纪元将一直向前延伸，人们会世代代缅怀他的功绩。

再版后记

去年秋天，突然接到李宁小姐从杭州寄来的信，告诉我《田中角荣》拟改版重印，问我有无修改补充。

当时，我刚刚结束为期6年的驻日使馆工作回国不久。李小姐这封热情的信使我想起了这本8年前写的小书，不禁觉得时光流逝得太快，免不了生出几多感慨。

8年来，星移斗转，世界发生了本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国家在世界格局大变动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巍然屹立，如飞龙腾升，创出举世瞩目的辉煌。这些，我可能比一直生活在国内的人有更深感受。因为东京毕竟是一个世界信息中心，它对世界的风云变幻反应极为灵敏，它对我国的动静，由于地缘因素，也格外地关注。可以说，日本的传播媒介无日不报道有关中国的事情。尽管有个外国新闻评论家揶揄“日本关于外国情况的报道，其准确度只有30%”，但只要善于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仍不难从潮水般的信息里捕捉到形势的真实发展、变化。驻日期间，天天读当地的报纸，日日看当地的电视新闻，6年下来，觉得日本舆论对中国的腔调变了。概言之，是少了几分傲慢，多了几分赞许，甚至带上了一些敬畏。尤其是后一二年，更是如此。显然，这是由于它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开始强大起来的现实和看到以后会更加强大的前景。

在我回国前夕，有位日本友人甚至对我说：“贵国发展真快……以后北京会是中心，东京要变成地方城市了。”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说这番话时，心情是很复杂的。当时，我是比较冷静的。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不会听到一句赞词就手舞足蹈，更不至于得意忘形。但是，这句话过后引起了深深的思考。我了解这位朋友的为人，我并不认为他说的是一句廉价的恭维话。退一步说，即便是，若在十年八年之前，他也不会恭维出这句话来。我想，这就叫“存在决定意识”吧。这也使我想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老话，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对于中国自身的变化，一个中国人的感知度，未必能赶上一个外国人，觉得有时候也需要借助外国人的眼睛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也许这样更能认识到她的巨大进步和玫瑰色的远景。我以为，这是我这次客居日本一个不小的收获。

谈及收获，当然不能在这里一一列述出来。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讲。这就是，这次驻日期间，我同田中角荣先生和他的家属都有了直接的接触，增加了我对田中先生的了解。

记得我刚到日本不久，就同我国以画梅著称的画家王成喜先生一起去田中府上造访过。后来，陪同杨振亚大使和唐家璇公使先后两次去看望病中的田中先生。当时，田中先生身处逆境，脑血栓后遗症未除，常年闭门不出，也轻易不接待客人，成了一个秘密的存在，连日本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无从知道他的情况。中国的使节能进入他的家门，并受到先生亲切的接待，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我们每次去，都受到田中全家的欢迎。当我们走进客厅的时候，总是看到田中先生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为了表示郑重的欢迎，病中的田中先生穿起了正装。他右手不便，就用左手同我们握手，语言不清，就请其女儿真纪子代劳。宾主之间，促膝交谈，其情其景，令我终生难忘。

打那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同田中先生的爱女、后来当了大臣的田中真纪子女士也多有交往。有事时，一个电话就可以到众议院议员会馆去见她。记得有一次她还把她写的关于她父亲的书赠给我。至于在其他交际场合，如古井喜实先生以日中友好会馆会长身份在历史悠久的八芳园设宴款待中国客人，日本众、参两院欢宴我人大代表团等，都与田中女士进行过亲切的交谈，与田中女士的丈夫、国会众议员田中直纪也晤谈多次。这一对夫妻身出豪门，地位显贵，按中国的说法，是高干子弟，但至少在我同他们的接触中，感到他们还是很平易近人的。应该说，他们对我的工作提供了许多热情的帮助，我是很感谢的。

正是由于同田中先生及其家属有过直接交往，当我听到田中先生逝世的消息时，很是震惊，想到一年多以前见他时的情景，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几天之后，我陪同徐敦信大使参加田中先生的葬礼，站在他的遗像前，凝望他的笑貌，总觉得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鉴于田中角荣先生已经逝世，笔者趁该书再版之际，增写了部分内容，主要是他从政界引退后与中国交往的情况和他逝世后各方面对他的评价，这样做是为了使广大读者对田中先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我国，人称“盖棺才能论定”，在日本，同样如此。因此，笔者以为，向读者介绍海内外对田中的“论定”是必要的。

王泰平
于北京朝阳门

参考书目举要

日文著作

- 私 履历书
我的履历书 田中角荣著
日本经济新闻社 1972 年第 7 版。
- 田中角荣伝
田中角荣传 户川猪佐武著
鹤书房 1972 年版。
- 人间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其人 马弓良彦著
钻石社 1972 年版。
- 田中角荣猛语录
田中角荣的人生语录
户川猪佐武编写
昭文社 1972 年版。
- 大臣日记
大臣日记 田中角荣著
新潟日报事业社 1972 年版。
- 田中角荣 三 日
田中角荣 300 天
柳田邦男著
载于日本《文艺春秋》杂志 1976 年 12 月号
- 田中角荣大军团 101 人
田中角荣大军团 101 人
北门政士著
山手书房 1981 年版。
- 1982 年 田中角荣
1982 年的田中角荣
北门政士著
山手书房 1981 年版。
- 宰相 妻
宰相之妻 今井久夫著
《月刊笔》杂志社 1982 年版。
- 田中角荣 上日本人
田中角荣与日本人
宫城音弥等著
山手书房 1982 年版。
- 田中角荣复权待望论
田中角荣复权在望论
砂边功著
青年书馆 1982 年版。

田中角荣 政权抗争

田中角荣与政权抗争

户川猪佐武著

讲谈社 1982 年版。

田中政权·八八六日

日中政权 886 天

中野士朗著

行政问题研究所 1982 年版。

有罪·田中角荣

— 裁判分析匕田中崩壊 遇程

田中角荣有罪

洛克希德案审判分析与田中身败名裂之经过

笔坂秀世著

东研出版社 1983 年版。

”·越山会

越山会

新潟日报社编

新潟日报事业社 1983 年版。

田中角荣战国史

田中角荣战国史

中村庆一郎著

商业出版社 1985 年版。

田中角荣 死

田中角荣不死

蜷川真夫著

山手书房版。

政治家田中角荣

政治家田中角荣

早坂茂三著

中央公论社 1987 年版。

